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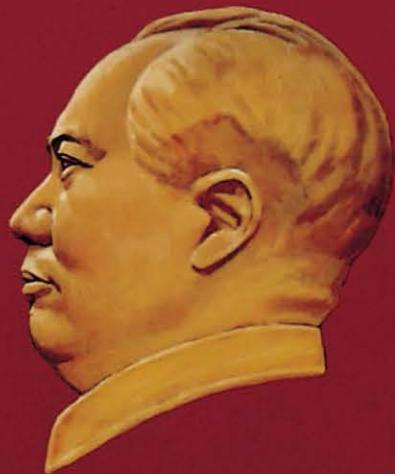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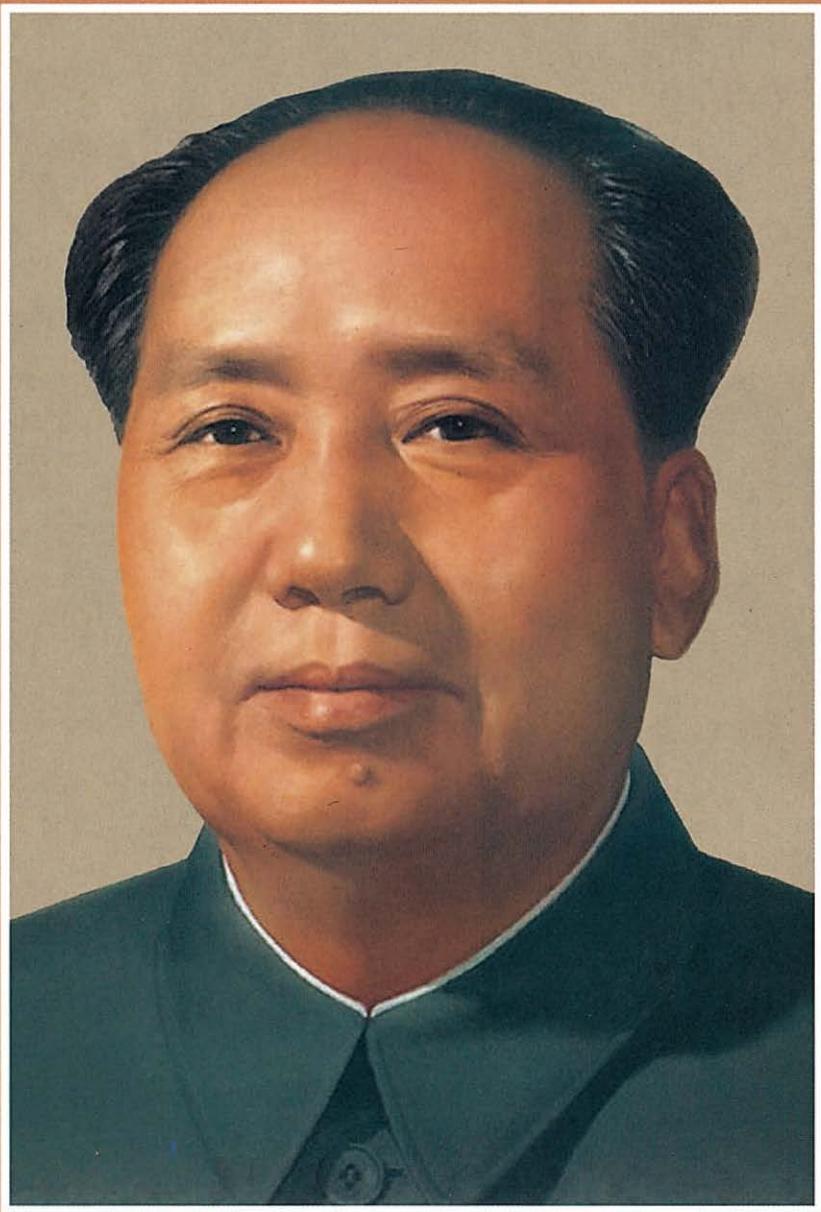
9 789881 290700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在马明方关于西北各省讨论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
(1955年10月23日)	
必须认真克服“左”的偏向，使肃反运动健康发展	…2
(1955年10月23日)	
关于成立上海警备区的批语	…3
(1955年10月23日)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4
(1955年10月27日)	
关于召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的批语	…10
(1955年10月28日)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11
(1955年10月29日)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22
(1955年10月)	
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	…25
(1955年11月1日)	
关于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进行军事训练问题的批语	…28
(1955年11月1日)	
关于组建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批语	…29
(1955年11月1日)	

在陈嘉庚来信上的批语	30
(1955年11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的电报	31
(1955年11月6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 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批语和修改	33
(1955年11月14日、17日)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 信件和对决议草案的修改	36
(1955年11月)	
给黄炎培的信	43
(1955年11月17日)	
对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45
(1955年11月22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	48
(1955年11月24日)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	50
(1955年11月24日)	
给周世钊的信	53
(1955年11月24日)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55
(1955年11月26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	56
(1955年11月26日)	

在中央关于传达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58
(1955年11月27日)	
关于西藏贸易等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59
(1955年11月28日)	
关于朱德、聂荣臻访问民主德国、苏联时应注意事项的批语	61
(1955年11月28日)	
中央答复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的电报	62
(1955年11月30日)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提纲	64
(1955年11月)	
对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的修改	65
(1955年11月)	
为工程兵积极分子会议题词	66
(1955年11月)	
在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纪普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68
(1955年12月3日)	
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电报的复电	70
(1955年12月4日)	
在一份反映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情况严重的材料上的批语	72
(1955年12月4日)	
在中央十人小组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中加写的话	73
(1955年12月6日)	
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	74
(1955年12月6日)	

为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题词	77
(1955年12月6日)	
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批语	79
(1955年12月7日)	
给翟作军的信	80
(1955年12月12日)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82
(1955年12月16日)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85
(1955年12月21日)	
我们的愿望是使中泰两国友好	90
(1955年12月21日、1956年2月10日)	
为江汉桥题名	94
(1955年12月)	
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95
(1955年12月26日)	
关于元旦社论和准备召开部分省委书记会议等问题的信	97
(1955年12月30日)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99
(1955年12月)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记录稿)	100
(1955年)	
五律·看山	103
(1955年)	
七绝·莫干山	106
(1955年)	

七绝·五云山	108
(1955年)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	113
(1956年1月7日至9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20
(1956年1月10日)	
给齐吉树的信.....	134
(1956年1月14日)	
关于控制高级社发展数目的批语.....	140
(1956年1月19日)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的号召.....	144
(1956年1月20日)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145
(1956年1月20日)	
对达赖喇嘛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154
(1956年1月21日)	
对班禅额尔德尼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155
(1956年1月21日)	
关于注意研究解决小学教师待遇低等问题的批语.....	156
(1956年1月21日、4月11日)	
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	158
(1956年1月22日)	
写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后面的一些文字.....	161
(1956年1月)	

对廖鲁言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	164
(1956年1月25日)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166
(1956年1月25日)	
关于发表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问题的批语	169
(1956年1月26日)	
给宋庆龄的信	170
(1956年1月26日)	
给黄宗緝的信	173
(1956年1月26日)	
给许志行的信	175
(1956年1月26日)	
对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76
(1956年1月28日)	
关于建立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批语	181
(1956年1月28日)	
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的修改	182
(1956年1月)	
关于检查同苏联专家、顾问关系的批语	187
(1956年1月30日)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189
(1956年)	
关于建立空军学院的批语	190
(1956年2月5日)	
和藏族人士的谈话	191
(1956年2月12日)	

在汪东兴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
(1956年2月13日)	
给刘松林的信	197
(1956年2月14日)	
吊唁杨树达逝世的电报	199
(1956年2月16日)	
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	200
(1956年2月19日)	
转发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211
(1956年2月19日、20日)	
关于派团赴苏联远东军区参观演习的批语	213
(1956年2月24日)	
关于发表郭沫若访日诗篇的批语	214
(1956年2月24日)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215
(1956年2月)	
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	217
(1956年3月3日、5日、7日)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21
(1956年3月4日)	
在听取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224
(1956年3月6日)	
在听取交通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227
(1956年3月8日)	
关于撤回驻越南军事总顾问改派武官的批语	230
(1956年3月12日)	

毛泽东等吊唁贝鲁特逝世的电报	231
(1956年3月13日)	
和长征、艾地的谈话	233
(1956年3月14日)	
关于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	237
(1956年3月17日)	
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拉科西的信	238
(1956年3月28日)	
对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的批语和修改	239
(1956年3月30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的批语	241
(1956年3月30日)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	245
(1956年4月2日、4日)	
对彭德怀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的批语	253
(1956年4月2日)	
同意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福州两军区的批语	254
(1956年4月4日)	
接受丹麦大使格瑞杰生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255
(1956年4月10日)	
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	257
(1956年4月10日)	
对中央就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259
(1956年4月11日)	
关于请中宣部讨论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的批语	261
(1956年4月18日)	

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的谈话纪要.....	262
(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电报.....	271
(1956年4月20日)	
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272
(1956年4月20日)	
给毛宇居的信.....	273
(1956年4月20日)	
给毛笔珠的信.....	274
(1956年4月20日)	
给毛泽荣的信.....	275
(1956年4月20日)	
论十大关系.....	277
(1956年4月25日)	
颁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的命令.....	299
(1956年4月25日)	
倡议实行火葬.....	300
(1956年4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302
(1956年4月28日)	
给贺果的信.....	311
(1956年4月29日)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12
(1956年4月29日)	
减少国防费用多搞些经济建设.....	319
(1956年4月)	

关于斯大林问题.....	326
(1956年4月、10月)	
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	327
(1956年4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329
(1956年5月2日)	
中央转发中央代表团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332
(1956年5月8日)	
公布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名额等问题的决定的命令.....	336
(1956年5月12日)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337
(1956年5月14日)	
写在湖北省财贸工作汇报提纲后面的文字.....	340
(1956年5月)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344
(1956年5月20日)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	353
(1956年6月8日)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356
(1956年6月13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357
(1956年6月14日)	
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一处带原则性修改的批语	359
(1956年6月22日)	

接受罗马尼亚大使尼古拉·乔洛尤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362
(1956年6月28日)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363
(1956年6月28日)	
关于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	365
(1956年6月30日)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	366
(1956年6月)	
水调歌头·游泳	368
(1956年6月)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电报	374
(1956年7月9日)	
关于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 会组织条例的命令	376
(1956年7月9日)	
关于国庆阅兵问题的批语	377
(1956年7月13日)	
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	378
(1956年7月14日)	
对中央转发王观澜关于江浙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	388
(1956年7月22日)	
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	390
(1956年7月22日)	
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的批语	396
(1956年7月23日)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398
(1956年8月、9月)	
给曹云芳的信	426
(1956年8月11日)	
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批语	428
(1956年8月)	
给达赖喇嘛的信	429
(1956年8月18日)	
亚非国家要团结起来，保证和平与独立	431
(1956年8月21日)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433
(1956年8月22日)	
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442
(1956年8月24日)	
在欢迎老挝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453
(1956年8月25日)	
对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稿的批语	454
(1956年8月27日)	
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456
(1956年8月29日)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458
(1956年8月)	
对彭德怀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460
(1956年8月30日)	
对李立三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462
(1956年8月30日)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463
(1956年8月30日)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批语	475
(1956年8月、9月)	
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的批语	477
(1956年8月、9月)	
毛泽东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	479
(1956年9月)	
关于修改和颁发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的批语	480
(1956年9月5日、12日)	
对陈绍禹不能参加党的八大的电报的批语	482
(1956年9月10日)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	483
(1956年9月10日)	
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	493
(1956年9月13日)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497
(1956年9月13日)	

在马明方^[1]关于西北各省讨论 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5年10月23日)

刘、周、陈、邓^[2]阅，退毛。

第二页末数行所提问题^[3]，请小平、陈云同志注意。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1]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马明方1955年10月20日关于西北各省座谈讨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第二页末提出的两个问题：一、陕西省提出，训练办社干部的经费不够用，要求中央财政部批准在地方财政节余中开支。二、各省反映，现在下面的工作很忙，希望中央各部的会议能够有所控制。

必须认真克服“左”的偏向， 使肃反运动健康发展^[1]

(1955年10月23日)

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得到健康的发展。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5年10月23日转发卫生部五人小组关于检查中直第四医院肃反运动中所犯“左”倾错误与无组织无纪律错误给国家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并中央十人小组的报告的批语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关于成立上海警备区的批语^[1]

(1955年10月23日)

周、朱、邓^[2]阅，退彭照办。^[3]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10月21日报告的批语。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的报告说：鉴于上海地区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便于平时警备和战时指挥，拟成立上海警备区。其任务是：平时负责上海地区警备治安、部队训练和国防工程构筑；战时统率上海地区部队保卫上海。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1]

(1955年10月27日)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1] 这是毛泽东和工商界代表的谈话。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当然不好，但是因为现在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要是说私营工商业者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我不相信，有些只有百把万元（相当于现在百把元）的就算了，不要尽搞。共产党员中也有贪污百把块钱的，也算了，还算好人。共产党也不是那样干净，政府中管钱的也有少数人还有贪污。

从社会上说，总是做好事的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多，错误只是部分的。要有这个估计，不要总是抬不起头。但不要出去吹没有问题，你们可多说些缺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

因此，我想劝一些人，每个大中城市有那么几十个、百把两百个觉悟比较高的核心人物，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拥护共产^[1]，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

农民搞合作化，对于私有制总有些恋恋不舍。《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一个城市有少数核心人物思想先搞通，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委员有三百人左右，各省各市还有一批会员，合起来就有好几万人。在这些人中间争取

[1] 本篇所说的“共产”，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国有化。

一批人，早点建立决心，不是立即共产，而是作思想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对地主，在一定时期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改变成分后才可恢复公民权，加入合作社，那时就不叫地主而叫农民。对地主来说，这事实上是解放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总共三千万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总之，要逐行逐业安排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大家都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我看这是好事。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1]。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

[1] 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1]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用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刚才胡子昂^[2]副主任说，公私合营企业中有把女老板当家属不安排工作的事。我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现在还只是开始，真正平等要到社会主义，几十年以后。妇女中有极大的潜在劳动力还没有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才有发挥的机会。歧视妇女、不重视妇女的事，要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改掉。在中国，妇女有三亿人口，妇女问题一定要安排好，要同男子同工同酬，在合作社、工厂都要一样。妇女要争取到正当地位好困难，因此要一有机会就说，要统筹安排，同工同酬。

[1] 参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恩格斯说：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贫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2] 胡子昂（1897—1991），重庆市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1955年10月，由著名电影人、国会议员普拉卡普尔率领的印度电影代表团访华。27日，毛泽东会见了印度电影代表团。图为卡普尔向毛泽东献花环。



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接见印度电影代表团。



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接见印度电影代表团。

关于召集资本主义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的批语

(1955年10月28日)

彭真、邓小平^[1]同志：

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2]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上午八时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5年10月29日)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了许多，我来补充讲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早两天跟有些朋友说过的。

总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说趋势如何？我们早几个星期开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也有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前途如何？趋势如何？这个问题，在全国广大的人群中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国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

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本来，对前途问题，我们的宪法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在去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过，关于五年计划等各种文件也都讲过。为什么还是经常发生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地位的人，对改变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地会发生不晓得明天怎么样的问题。说完全不晓得？也不是。晓得一点，但是问题还是发生，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不好的，每天难过日子。旧社会就是那样子，无论哪个阶级，自己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在被统治之下的，他们得不到什么权利，命运操纵在人家手里。统治阶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国民党政府，它也是不安的。我们有一个一定的发展方向，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把握，应该是心安的。但是对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且要经常讲。如果不经常讲，今天安了，明天又可能不安。比如讲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要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我们跟国民党那个时候完全不同，我们的事业很宽广，每年都发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已经在长期革命中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

革命战争时候，就是找不到许多人，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找了许多人坐到这里来开会。那时候，国民党不许可嘛，他们不赞成我们，讲共产党许多坏话，说什么共产党不像样子，头，就不只一个，有三个头，样子也很难看，一句话，是坏透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民党拿这种话到处讲，讲得许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那个时候，要找人谈，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困难。现在证明，建立了统一战线对我们有帮助，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坚持下去，宪法上已经作了规定。

总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发展，与国民党的事业一天天地缩小相反。现在我们的事业，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负，包括国内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设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应该安下心来。我总劝朋友们，经过你们再劝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不要发愁，开始会有困难的。比如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否妥当等等，会有些问题发生。但是经过商量，经过考虑，经过调查研究，总可以实事求是地求得解决的。这样，大家就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

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工商业改造的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听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学习的组织，我们很高兴。参加学习的人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要有几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人。这一点是不是可能呢？应该是可能的。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方针、政策，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达到全国有几千人。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我曾经同一些朋友说过，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要共产^[1]了，不是这个意

[1] 本篇所说的“共产”，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

思，而是说准备共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这个东西是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的，曾被蒋介石说得很不好。最近几年情况虽然变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动荡不安。由一种制度变为另一种制度，他们势必不安，因为还在变嘛；变了以后，在一个时期他们还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旧制度的残余还在脑筋里面存在着。新制度的宣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工商界的人中间也会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更觉悟些，有些人不觉悟些，甚至最后还有一些顽固分子。资产阶级连他们的家属，大概有七百万人左右。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小商小贩、独立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厂的工人），有两千几百万人。两者合计有三千万人左右。面对这么一个大队伍，应该有一个整个的宣传教育计划。有许多工商界的朋友提意见说，五年计划报告中间关于宣传教育方面提得不够。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过去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全面规划。今天到会的有政府许多部门的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你们就没有管这个事嘛。而且，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据我们看，经过这几年，整个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作这样一个总的估计，我看是合乎事实的，是需要的。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基本的估计，我们就不能建立信心，工商界本身会没有信心，向他们进行工作的人也会没有信心，感到横直是不能改造嘛，横直是没有希望嘛，那个私有制无论如何拔不掉嘛，根挖不掉嘛！那有什么办法呢？白费力气，搞了五六年了，成绩没有，或者有也很少，

总而言之，搞社会主义改造，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路线错了。是不是能这么说呢？我看，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说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经济建设、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买公债等方面一点好事没有做，一点成绩都没有呢？我看，不能这么说，也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对整个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不然就没有信心，下文就不好办，而且那种说法根本不合事实，因为这几年确实是有成绩的。当然肯定成绩并不是抹煞缺点，是会有缺点的。是缺点就说是缺点，缺点有多少就说多少。这就叫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我们不要那个不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片面的分析方法。不实事求是就是主观主义，片面分析就站不住脚。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地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

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企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一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通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五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分，才给他

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是要当一当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1]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再谈谈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方法可以好一些，也可以差一些。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

[1] 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当然，领导者不止我们这几个人了，在座的都是领导者，许多人都是人民代表、副市长、工商联委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你们都有责任。你看，归根到底又把问题搞到你们身上来了。当然，我也是要担负一点责任，不担负也不行啰！我们大家都不要承担责任，共同负责，这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嘛。

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有核心才能有领导，才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

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周恩来：是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的。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要做好事，这是一个原则。我跟许多朋友谈过，做好事越多越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有名誉。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替人民做好事越多，工作成绩越好，得到人民的嘉奖就应该越多，不会成反比例的。总不能说，立了功了，还得倒霉。不是那么一个趋势，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说不通的，人家是不服的。定下这么一个标准，就可以鼓励人们上进，鼓励做更多的好事，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会有参差不齐。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农民也是这样，他加入合作社也要经过多少次考虑，经过家庭商量，想加入又不想加入，搞过几次以后，才下决心。你说，工商界就没有三番五次的考虑，不开家庭会议、同业会议商量？我们最后要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这条路上，不再动摇。要逐步引到那一步，首先就要先有先进分子不动摇，然后逐渐使更多的人把怀疑、犹豫、动摇减少。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

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会有困难的，也一定会有破坏的。有的地方搞合作化，曾死了一些牛，猪也减少了，出现了“三叫”：人叫、猪叫、牛叫。合作化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才能够做到“三不叫”。要“三不叫”，就要人有饭吃，猪和牛也要有东西吃。对你们工商界就不好提这个“三不叫”了，人不叫是要的，但机器不好不叫。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七律·和周世钊^[1]同志

(1955年10月)

春江浩荡暂徘徊，
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
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2]谈笑人依旧，
域外鸡虫事可哀。^[3]
莫叹韶华^[4]容易逝，
卅年仍到赫曦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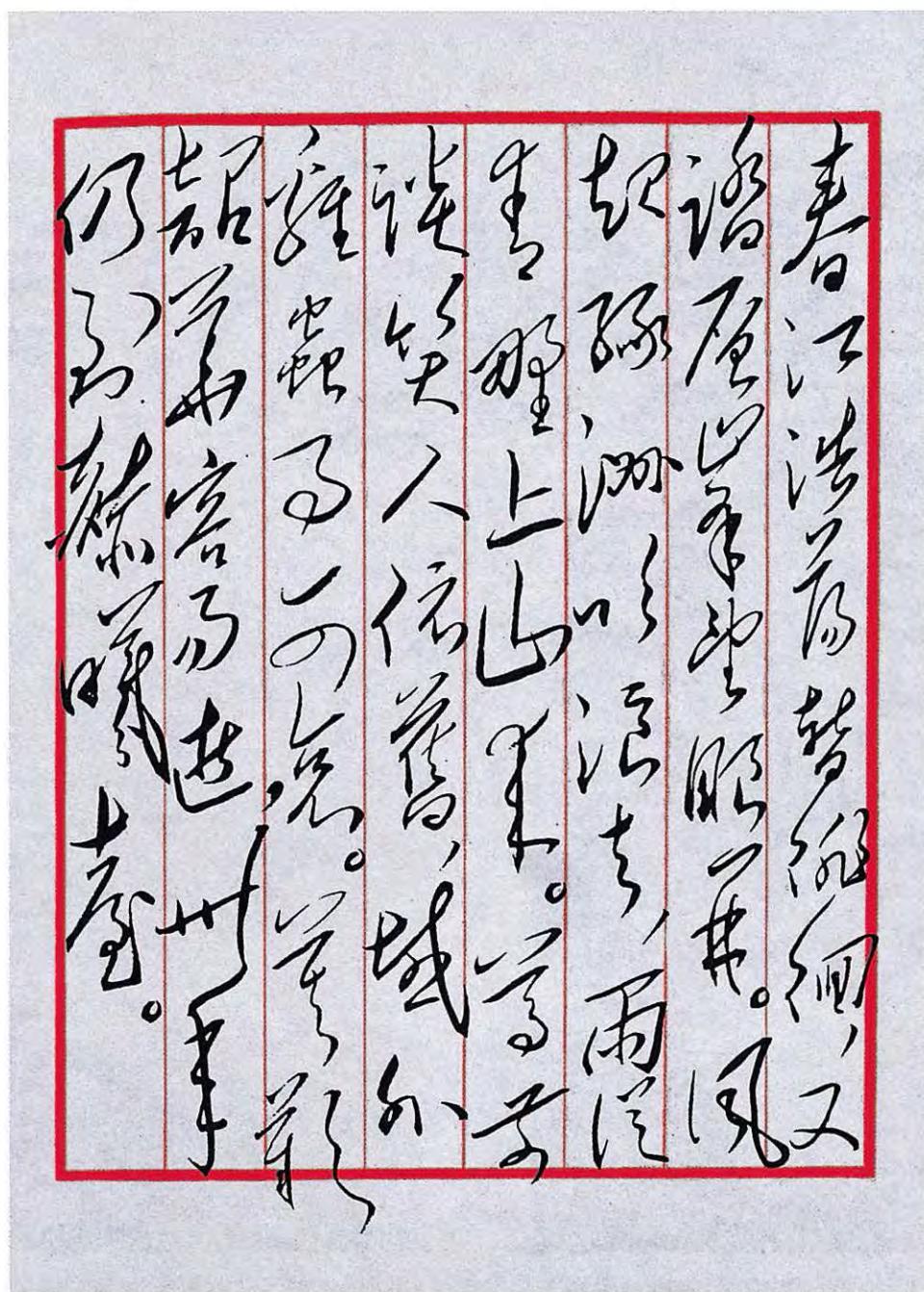
[1]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尊前，尊同樽，酒杯。尊前，酒席前。

[3] 域外鸡虫事可哀，国际间的某些事件像鸡虫得失一样渺小，人们为这些小事而勾心斗角是可悲的。这里所指的具体内容待考。唐杜甫《缚鸡行》：“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4] 韶华，美好的年华，指人的青年时代。

[5] 赫曦台，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岳麓书院。朱熹曾称岳麓山顶为赫曦，后因称山上的台为赫曦台。清代因山上的台已毁，将原“赫曦台”匾额悬于岳麓书院“前台”，由此前台更名赫曦台。赫曦，光明盛大的样子。



毛泽东手书《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1955年10月30日，毛泽东和贺龙一起观看中国足球队同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的比赛。图为毛泽东等在赛后接见全体运动员。

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 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1]

(1955年11月1日)

—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两个报告中，特别是山东的报告中，有许多新的意见，值得各地注意。这两省（还有云南贵州和其他若干省份），由于在中央召集的今年五月十七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即在夏季（六、七、八月）做了准备工作（山东的准备时间较短，是一个缺点），所以它们在秋季的头两个月（九月和十月）即完成了一年的发展计划，它们准备在今后五个月内（今年十一月至明年三月），结合粮食三定、统购统销等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大力完成整顿合作社的工作，这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机关，建立和健全劳动组织，做好生产规划，做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金等项问题上的互利安排，制定社章，做好冬耕冬种（在南方）和积肥等项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

作，以利明春的生产。在这个季节安排问题上，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只要夏季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妥帖，秋季的建社并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即可以完成。秋季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冬春两季，都可以做整社工作和其他工作。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好好地安排一九五六六年的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

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二

即送刘、邓先阅，再送周、朱、陈、谭震林、子恢、鲁言即阅后，发。发后另印如前示。

关于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 进行军事训练问题的批语^[1]

(1955年11月1日)

退军委照办。^[2]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8月8日报告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根据兵役法规定，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应当进行军事训练，以便使学生养成必要的军事生活习惯和纪律观念，同时经过学校的军事训练，为军队培养一批预备役军官，特别是预备役技术军官，这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防建设都有很大好处，是国防建设不可缺少的工作。报告对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进行军事训练的原则及具体实施方案作了说明。

关于组建军事法院 和军事检察院的批语^[1]

(1955年11月1日)

退军委照办。^[2]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8月8日报告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为在军队系统开展违法案件的审判工作和开展检察监督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组建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报告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权限和军队各级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的组织与干部任命提出建议。

在陈嘉庚^[1]来信上的批语

(1955年11月1日)

周总理：

此件^[2]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1]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嘉庚1955年10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此次访问西北，于9月中旬再访延安，途经黄陵县时，顺便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院中历代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坟如鳞。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至今未派人看管。保护山陵标语虽有，但徒有其名。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荒废，抑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三十八周年的电报

(1955年11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致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以万分欢欣的心情祝贺兄弟般的苏联人民过去一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进一步增强了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鼓舞着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和进步而斗争的信心。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一年来，苏联政府为着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最近苏联政府就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裁减军备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等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

苏联政府所作的这些努力。

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坚强团结，对促进两国的共同繁荣和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着日益巨大的作用。中苏两国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和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愿中苏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日益发展和巩固！

我们伟大的盟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六日 北京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 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工作》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1月14日、17日)

—

可以照此发表。为了说清楚问题，在“第二”中加了几句^[1]。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

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

[1] 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由适当的人加以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须知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也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只要不是懒汉，只要是愿意诚恳地工作的人，就永远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因此，一切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应该认清这个前途，不但不要徘徊瞻顾，而且要主动地奔赴这个前途，这就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就不至于皇皇无主，不至于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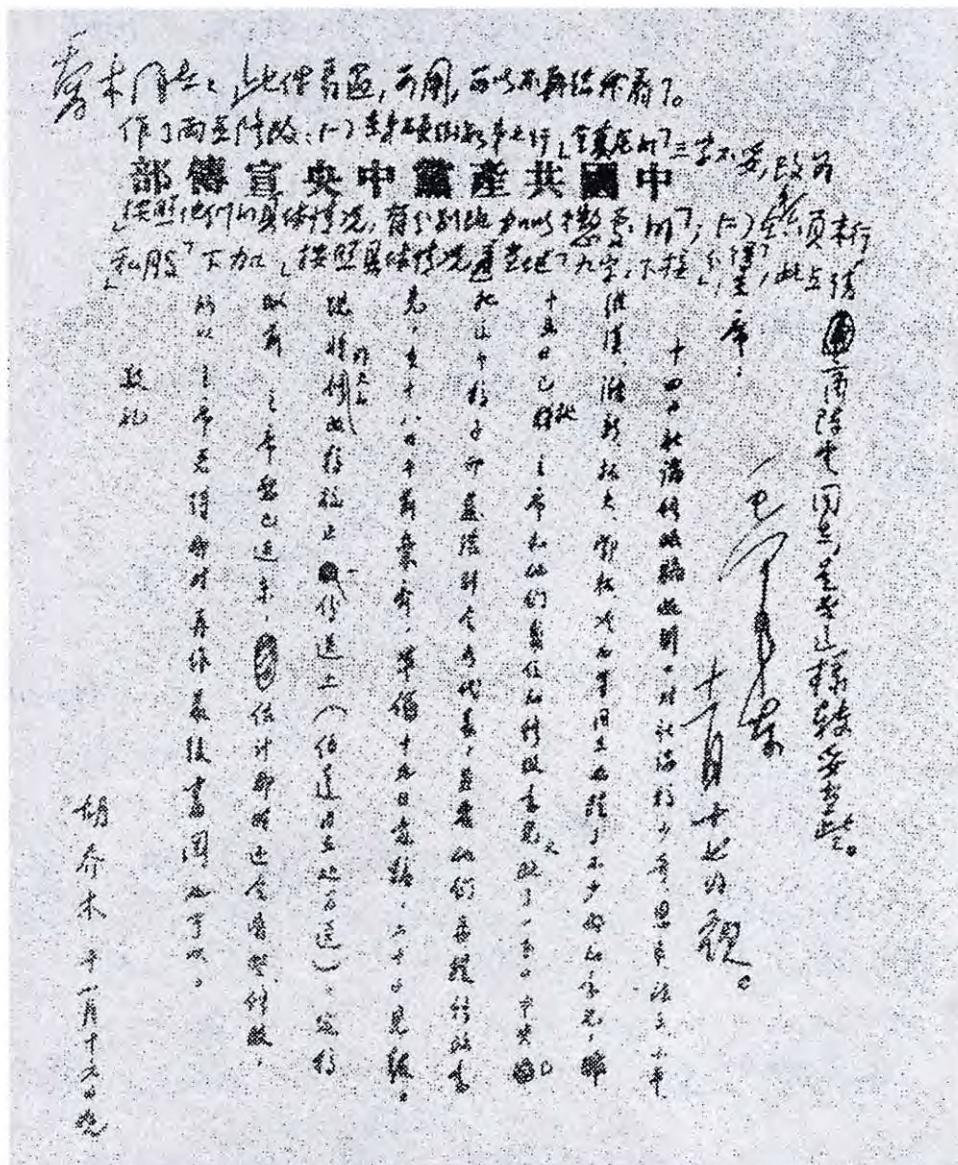
三

乔木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一）在第五页倒数第七行“镇压的”三字不妥，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在第六页末行，“私股”下加“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九字，下接“分得”，此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夜



胡乔木关于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修改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批语的手稿。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信件 和对决议草案的修改^[1]

(1955年11月)

—

少奇、小平^[2]同志：

送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十三份，请予审阅处理。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3]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

[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主要有七段，即本篇三至九，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

[2] 少奇，即刘少奇，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这时他们和毛泽东一起在杭州。

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1]。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估计明年一年，即可达到全国基本上初级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户入社，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的问题，我召集了九个省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四时

二

小平、尚昆^[2]同志：

此件请将题目下括弧内的几句话^[3]加上，即付排，先打清样七份，于本日下午分送刘、周、朱、陈云、彭真^[4]、小平及我（送前

[1]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后，追认为正式决议。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写的说明，即本篇三。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标出修改的地方)，再看一次，即可印发。

毛泽东

十一月廿九日上午二时

三

这个文件曾经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

四

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

五

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

六

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采取赎买政策，是可以允许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我们的赎办法，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如果以10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20亿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

七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八

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两种教育方法。三反五反的群众斗争，是一种教育方法，但是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当着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给予他们这样一次重大的从外部强加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教育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已经基本上被打垮，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就创造了一个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教育方法的条件，这就是采用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引导资本家内部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加强对于资本家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了解时事和国家的政策，了解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出路。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根据许多地方已有的经验，由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再加上我们加强组织资本家本身的学习，就有可能促使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步缩小，并且大大减少许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因此，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

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九

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后，有些同志依然没有从三反五反斗争中取得教训，右的偏向还是存在的，有些同志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丧失党的立场，同化于资本家，例如上海民用药厂和铅笔一厂所发生的一类事件，各地都可能找到一些例子。这是很不好的，必须教育他们，加以纠正。并且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就要“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只是企图用“挤垮”的简单方法去回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任务，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在实质上却

是右的。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消极的偏向。不是放弃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而是应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不是放任自流，若即若离，“敬鬼神而远之”，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提出一整套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宣传教育的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尽可能广大地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改造。这样做，反而可以较快地减少资本家的疑虑，把他们的心大体上安定下来，从而能够有秩序地加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会不遇到许多资本家的动摇、犹豫、埋怨、以及少数人的抵抗。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上述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将会削弱他们的动摇和抵抗，抽逃资金等项违法事件也将会减少。同时，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又对一切同资本家接触的党员加强教育和监督，党内右倾的危险性也将较易于防止，被腐蚀的党员可能反而要少些。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一定会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起动员的作用，会使一切最顽固的资本家陷于孤立，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

给黄炎培的信

(1955年11月17日)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1]收到。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讨论的经验^[2]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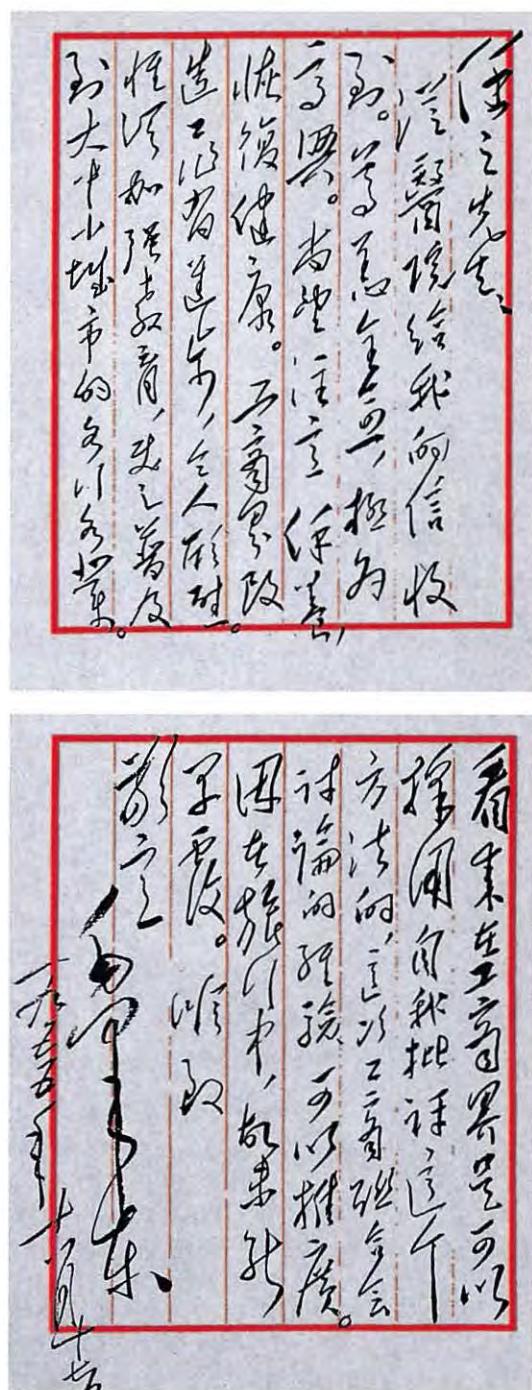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 指黄炎培1955年11月5日从北京医院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报告了他做前列腺手术后基本痊愈的情况，并说：由于住院，很遗憾地没有能经受怀仁堂主席的指示，然已从传达中知悉大概。我以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丰收，不能看作1955年“天”的恩赐，而必须承认是农民和农民领导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合作组织、改进技术等，特别是一致的极度兴奋的工作情绪，这些都是“人”，不是“天”。农业增产，轻工业会相伴而增产，只有在生产激增，人们心情高度兴奋的时候，才有可能进一步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2] 指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对李维汉^[1]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问题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1月22日)

—

即送李维汉同志：

此件^[2]可用。有一些修改^[3]，请你考虑是否可用。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下午十时半

—

经济部门不问政治工作，政治部门不问经济工作，或者彼此各不相谋地去作。这样，是不利于改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改造资产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李维汉1955年11月21日向毛泽东报送的准备在中央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发言稿。

[3] 即本篇二至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阶级分子的。

三

在公私合营形式上的企业改造，首先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企业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企业了。既已合营了之后，即转入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造，即是经营管理方法上社会主义路线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开头一定期间内，这是合营企业中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

四

我们又必须耐心地教育资本家和资方实职人员，帮助他们逐步地认识两种制度和两种方法的好坏优劣，批判和抛弃旧的（即资本主义的），站到新的（即社会主义的）这方面来。这样，他们在企业合营的时候过了一关，又在这时过了一关。过了这两关之后，改造他们的问题就会更加顺利了。

五

落后分子固然受反动分子（即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影响，但他们主要地要看中间分子的态度，如果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左转了，落后分子觉得自己快要孤立无援，也得勉强跟上去，我们应当使他们逐步地离开反动分子。

六

反动分子不仅是可以孤立的，而且也是可以分化的。反动分子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应当分别处理。

七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接受改造是由于大势所趋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所决定的，有一小部分人还一定要抵抗。

八

总结六年来改造工作的成绩，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九

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加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项斗争方式。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5年11月24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形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馀事请问张国华^[2]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祝你健康、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给班禅额尔德尼^[1]的信

(1955年11月24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

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此复。

顺祝
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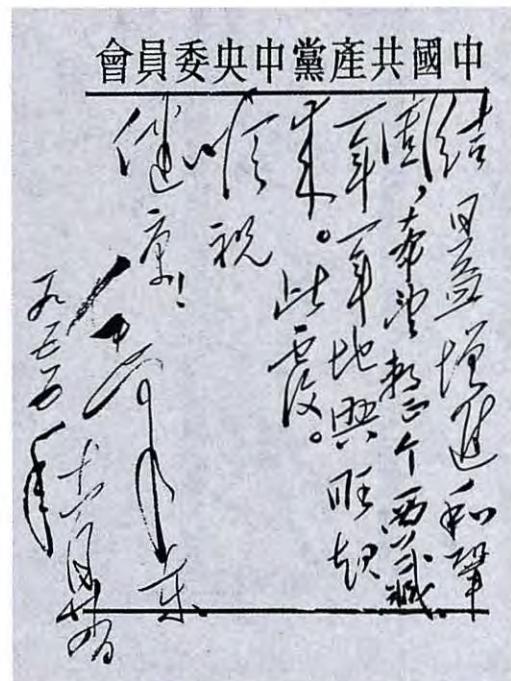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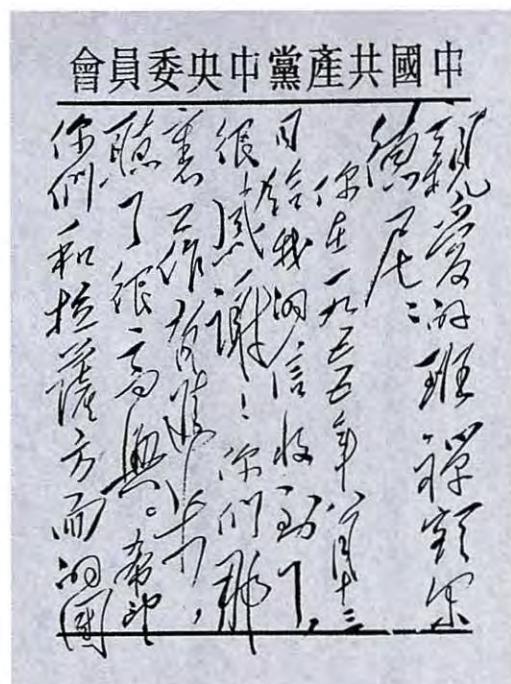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致班禅额尔德尼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班禅额尔德尼信的手稿。

给周世钊^[1]的信

(1955年11月24日)

惇元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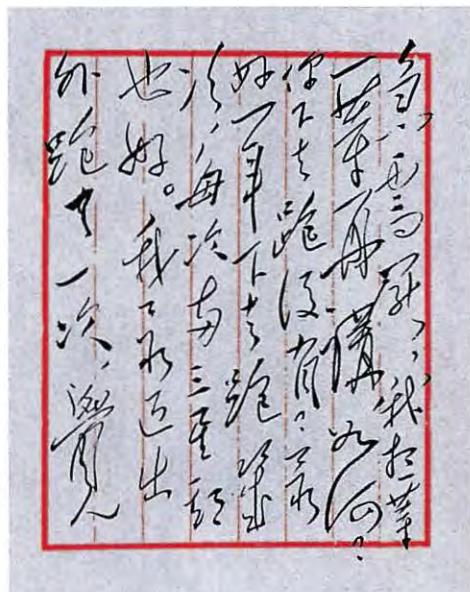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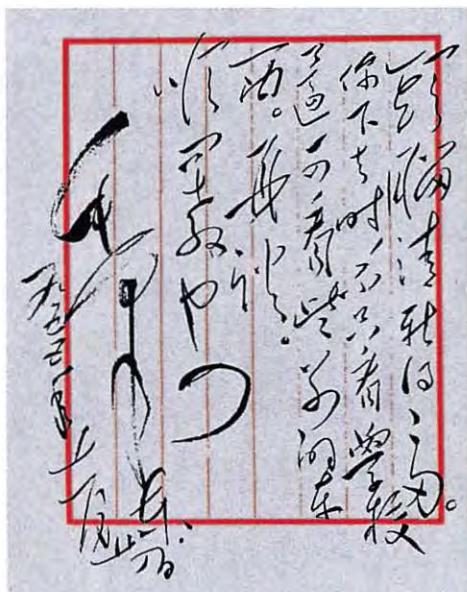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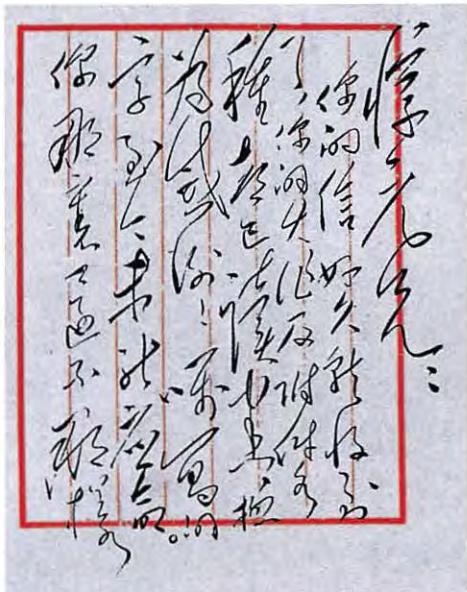
你的信好久就收到了，你的大作及附件各种都已读悉，极为感谢！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吧，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再谈。

顺问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5年11月26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约·布·铁托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莫萨·皮雅杰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同志：

值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中、南两国人民过去在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自从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还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祝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 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

(1955年11月26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当阿尔巴尼亚人民获得解放十一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政府致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十一年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捍卫祖国独立和创造繁荣幸福的新生活方面已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成就感到欢欣，并且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团结在我们两国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1955年，毛泽东接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团长贝哈尔·什图拉。

在中央关于传达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 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1955年11月27日)

(四) 在十二月下半月内，你们要召开一次关于研究改善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会议，准备派人出席在明年一月十日左右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意见和材料。此事将另有通知。

(五) 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本，日内即可送给你们。

关于西藏贸易等问题 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1955年11月28日)

刘、周、陈、小平、李先念、李维汉^[1]同志：

和张国华^[2]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似应实行他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去后，粮价涨了几倍，茶价涨了两倍，百货也涨了百分之六十，这对西藏人民是很不利的，长此下去，什么改革都谈不到，最后可能引起失败。因为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办法。西藏面积很大，地质形成较全国许多地方为晚，很可能有极大的地下蕴藏，有待将来开发，目前赔一点钱，将来会补偿的。此事请陈云、先念、小平研究一下，在张国华走前，在书记处一谈。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附件^[1]请一阅。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八日

阅后退毛。

[1] 指中共中央拟发的关于西藏目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稿。

关于朱德、聂荣臻^[1]访问民主德国、 苏联时应注意事项的批语^[2]

(1955年11月28日)

刘、周、朱、陈、邓^[3]、聂荣臻阅，退毛。

朱德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去德、苏，在谈话时请加注意，不要涉及具体事项的承诺，如对方涉及，应推出两国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去商谈。此件所说情况，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11月26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施托夫来信，提出向中国供应光学、医疗等仪器问题，看来信意思，可能是为这些产品在中国找市场。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答复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 问题的两个报告的电报

(1955年11月30日)

甘肃省委，并告青海、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热河省委，及其他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看了甘肃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关于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小了一点。你们说“目前全省积极要求入社的农民，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左右，加上已经入社的农户，则达百分之五十左右”，但是你们在第五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计划，则要到一九五六年才让“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百分之三十”，这是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的。你们应当改变这个计划，将已经积极要求入社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就在今冬明春分两批吸收入社，连同已入社的农户，共达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你们就主动了，明年秋冬再来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上合作化了。这样做对于用全面规划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是很有利的。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各省计算，除福建、热河尚未查明，湖南据说只能于今冬明春完成合作化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以外，其余十六个省，合作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多数的省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少数的省也可以

中央答复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的电报

于『于』今冬明春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他们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根据青海省委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报告，那里已经入社和酝酿入社的农户已达百分之五十，还有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可能。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你们的意见如何，请你们和各地委联系加以研究，电告为盼。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问题的提纲^[1]

(1955年11月)

- (一) 思想落后于实际。
- (二) 全面规划(各个矛盾侧面)。
- (三) 向资本家学习(又教他, 又向他学习)。
- (四) 两面性是否有变化。
- (五) 上海一封信。
- (六) 对工人和工作人员的教育, 然后去教资本家(资本家现在有了主动)。
- (七) 领导小组和政协的学习委员会。
- (八) 市镇以上的会议。
- (九) 对知识分子的会议。
- (十) 自我批评。

[1] 这十条提纲, 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李维汉送毛泽东参阅的国务院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1955年11月24日关于全国500人以上私营工厂合营情况的统计表上。

对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 指示草案的修改^[1]

(1955年11月)

为了进一步展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出一批核心分子。每个大城市应当有几百个这样的核心分子，每个中小城市也要有几十个或者几个这样的核心分子。这些核心分子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他们逐步地不怕共产了，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关心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切实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和困难，经过他们去团结私营工商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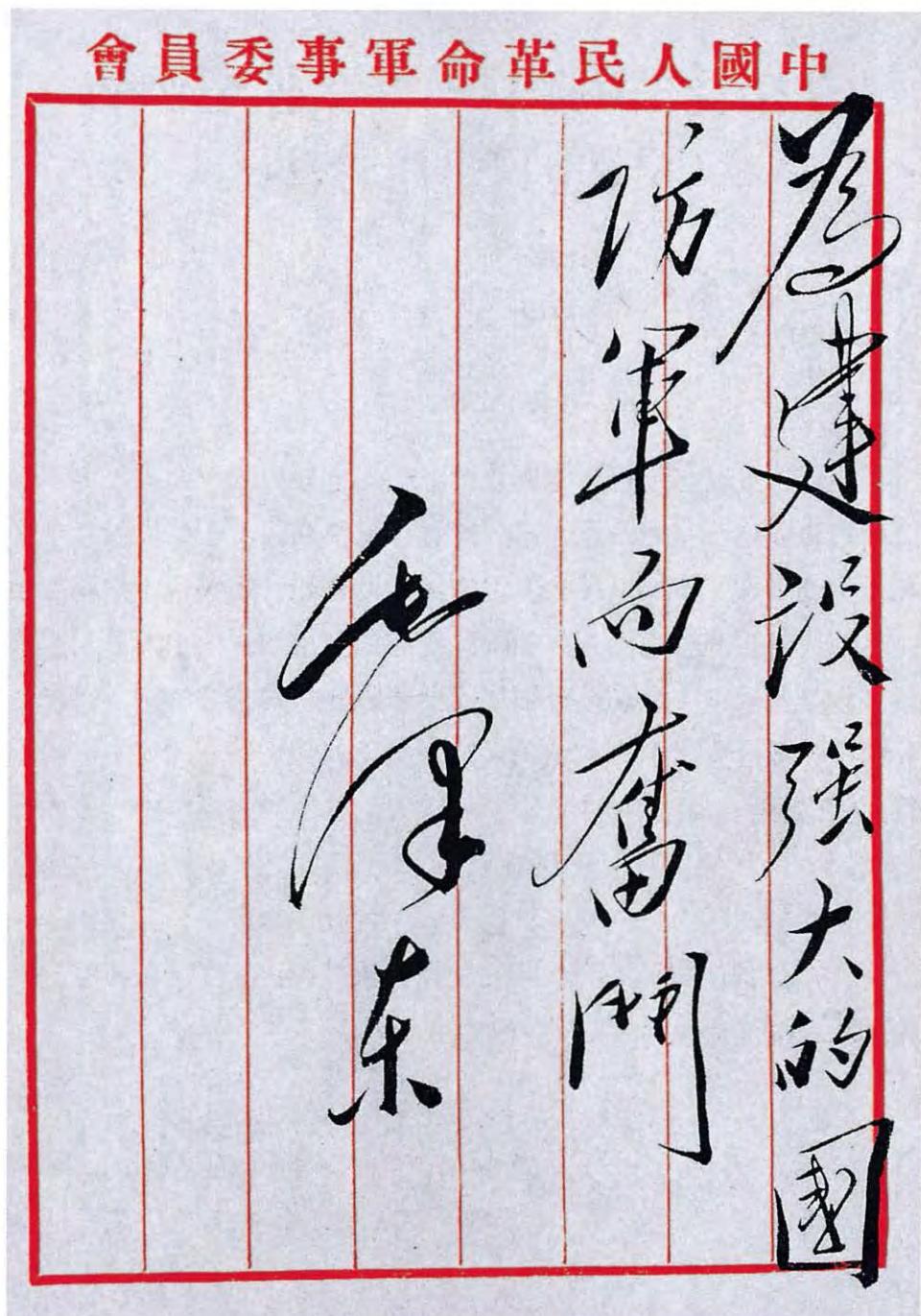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为工程兵积极分子会议题词

(1955年11月)

为建设强大的国防〈防〉军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工程兵积极分子会议的题词。

在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纪普纳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5年12月3日)

毛泽东主席在致答词中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德国和平统一以及在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全德和平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和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我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德国人民争取德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德国人民将继续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几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亲密合作，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全面合作和兄弟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也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1955年12月11日，毛泽东向来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格罗提渥举杯敬酒。

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 发展速度问题的电报的复电

(1955年12月4日)

—

甘肃省委，并告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日的电报^[1]收到。像甘肃那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见，今冬明春分作两批，共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多一点，如果不勉强，则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多一点也可以，再多就可能不适合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再一个浪潮达到占农户百分之八十左右，那就很好。你们说“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数字太大，以控制在百

[1] 指中共甘肃省委1955年12月2日关于全省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中央11月30日对我省农业合作化规划速度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确实是小了，这说明我们的领导仍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现决定于12月5日召开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准备来一次重新规划。根据目前各地合作化进展的实际情况看，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入社农户数发展到占总农户的75%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不但数量要多，而且质量要好。

分之四十左右、或五十左右为宜。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

—

刘、周、朱、陈、彭真、小平、子恢^[1]即阅，尚昆^[2]办。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一份反映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 情况严重的材料上的批语

(1955年12月4日)

陈云^[1]同志：

此件中江苏一条消息^[2]请看一下。这个问题，请在研究曾希圣^[3]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全面地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回答曾希圣并告各地的电报，能在一星期内外，写好发出就好。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新华社1955年12月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三九期上刊载的《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现象严重》的消息。其中说，江苏省各地宰杀耕牛数字惊人，省畜产公司今年以来收购的牛皮比去年增加50%。据了解，这些耕牛中，有许多还能耕种。各地滥杀耕牛的原因是：一、农业合作社在处理耕牛入社问题上对老牛、小牛的报酬压得过低。二、对宰杀耕牛的审批制度执行不严格，很多地区经兽医检查后由区文书盖章就可以宰杀。三、价格政策有毛病，死牛比活牛的价钱还高。

[3]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在中央十人小组关于 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 通知稿中加写的话

(1955年12月6日)

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市党委、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

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

(1955年12月6日)

“左”比右好，不对；右比“左”好，也不对。有些人思想落后在实际后边，头上没有角，没有斗争性。两条道路斗争，不进行批评，批评不尖锐，怕批评，怕丢选票，均右倾之表现，党内有反之必要。农村部经验主义右倾，六中全会作了批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是严重问题。资本主义改造、镇反、合作化均如此。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过去农业落后于工业，十七条出来后赶上了，压迫工业进步，如初级社，三四年不提高，不利的。五九年可能会实现社会主义。十七条思想反保守主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基本措施、先进经验，半年前不考虑，现在变了，出现了极大变化，极大的生产力，像发现新大陆，大陆本存在，看不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五七年百分之九十，手工业也要快，计划太少了。五七年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工商业国有化原说六二年，也许提前。合营了，变国营又不难了，合作化十八年改为十年，证明落后实际。群众潜力极大，可多办事，应该反右倾反保守，提前完成改造。建议，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改掉“大约”“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语气。可争取的争取，如订货要求提早，利用在休战期间，加快速度，完成总任务。这就是“八大”思想。如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战场好办。赶快搞极有利，要打台口好打，但完

成建设任务则困难，要加快，各项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较短时期得到较好成绩。办得到有条件，群众要求，办得多而好，即稳步前进。过去反盲目冒进出毛病，反掉群众干部的积极性，不对的。扫盲，反冒进反掉了，正气不升，邪气高涨，干部群众均没劲。这样问题：中央未能及早提出，是中央失职。群众说：“跟共产党走，没错。”大方向说没错，但具体说，我们错了，群众也跟错了。前进有几条路，上中下三策。

比较正确的合理的路线即站在前头，鼓舞群众前进，而非站在后边泼冷水。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成绩，按这，即稳步前进。按常规办事，时间长、工作少，即保守路线。要克服，有两种方法：全面规划，接近群众，非坐在办公室想办法，要接近群众找出新事物、新经验、先进经验推广。不一定捉麻雀好多才知肝胆。知浙、皖可快合作化，即知全国可搞。保守主义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抓先进的，批评落后的，发现新的生产力、群众潜力，这是一个领导法则，是领导方法，才能说服人。坐办公室，不接近群众，不抓先进的，不行。公事要办，但只办公事是不行的，出去跑也要抓先进的，不能只搞落后的回来。一个负责人七至十周，接近群众。办公室式，只能是常规法。先进经验是要突出常规的。客观事物，天天突破，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是前进规律。平衡了不可改变的观点是不对的，不平衡中抓先进的，带动其他，才能前进。不怕突破、出矛盾。永远太太平平必出错误。冲破而又求平，才是辩证法。这才能鼓舞群众积极性，提早社会主义建设，快、多、好，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稳步前进。

我国和苏联比较：(1) 我国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经验，三次革命战争的演习，经验极其丰富。胜利前，各个方面均有经验，左右好

几次，很快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是新起家，十月革命，无军，无政，党员少）。（2）我国有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之助。（3）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劳。不合作化，农民无出路。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到社会主义，不要老比苏联。我三个五年即可搞二千四百万吨钢，就比苏快。现在是两翼高涨，主体可能落后。两翼易骄，但最易骄者为工业，首先是重工业。鞍钢即有骄。很可能国家社会主义化了，但非工业化（比例不过六十，体系未建立），可否让农民等一下？那是不行的。农民社会主义化，并不妨害工业化，不能让他们等。两翼工作作了严格的检查。此外，对工业问题，也应作一次严格的检查，也按期过大运动。财经、贸易、文教均要检查。八大作一次总结性的检查，这就是中心问题。反保守、右倾、消极、骄傲，发现先进经验，改变领导方法，做到又快又好。动员群众批评，自我批评，克服保守主义，做出来更多成绩，全党准备，全国人民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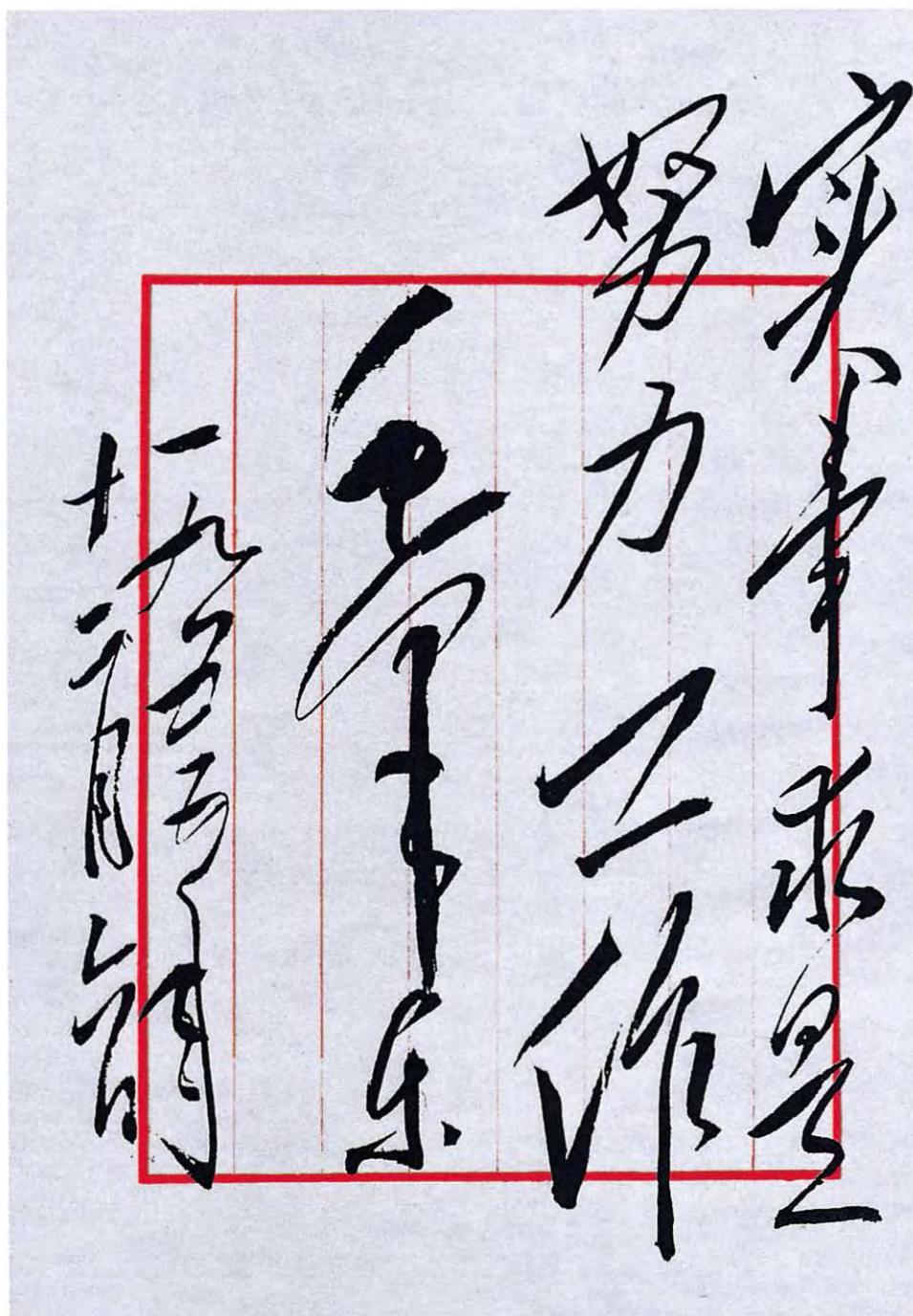
为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题词

(1955年12月6日)

实事求是，努力工作。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毛泽东为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的题词。

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批语^[1]

(1955年12月7日)

同意。^[2]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12月1日报告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遵照主席在1953年关于军事系统每年应召开一次全军性的高级干部会议，以讨论工作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根据目前军队建设情况，军委准备在1956年1月底或2月初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拟集中讨论作战方针和具体规划，并总结1955年的军事训练和肃反工作，布置1956年的军事训练和肃反工作，研究授予预备役军官的勋章、奖章和军衔，紧缩机关编制、节减人员和统一军语等工作。报告还说：几年来，全国的军事建设工作，基本上是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行和布置的。但是由于这一方针还没有在全军高级干部中进行深入讨论，所以大家对这一方针的认识和理解尚不一致，对作战有关的工作亦未作全面规划。因此，深入讨论一次，求得在全军最主要的干部中统一认识，使大家能够在统一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全面规划各项工作，是很需要的。同时，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大家对于国防工业的建设，对于新军种、兵种的建设已逐步能够掌握。因此，现在来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条件也比较成熟了。

给翟作军^[1]的信

(1955年12月12日)

作军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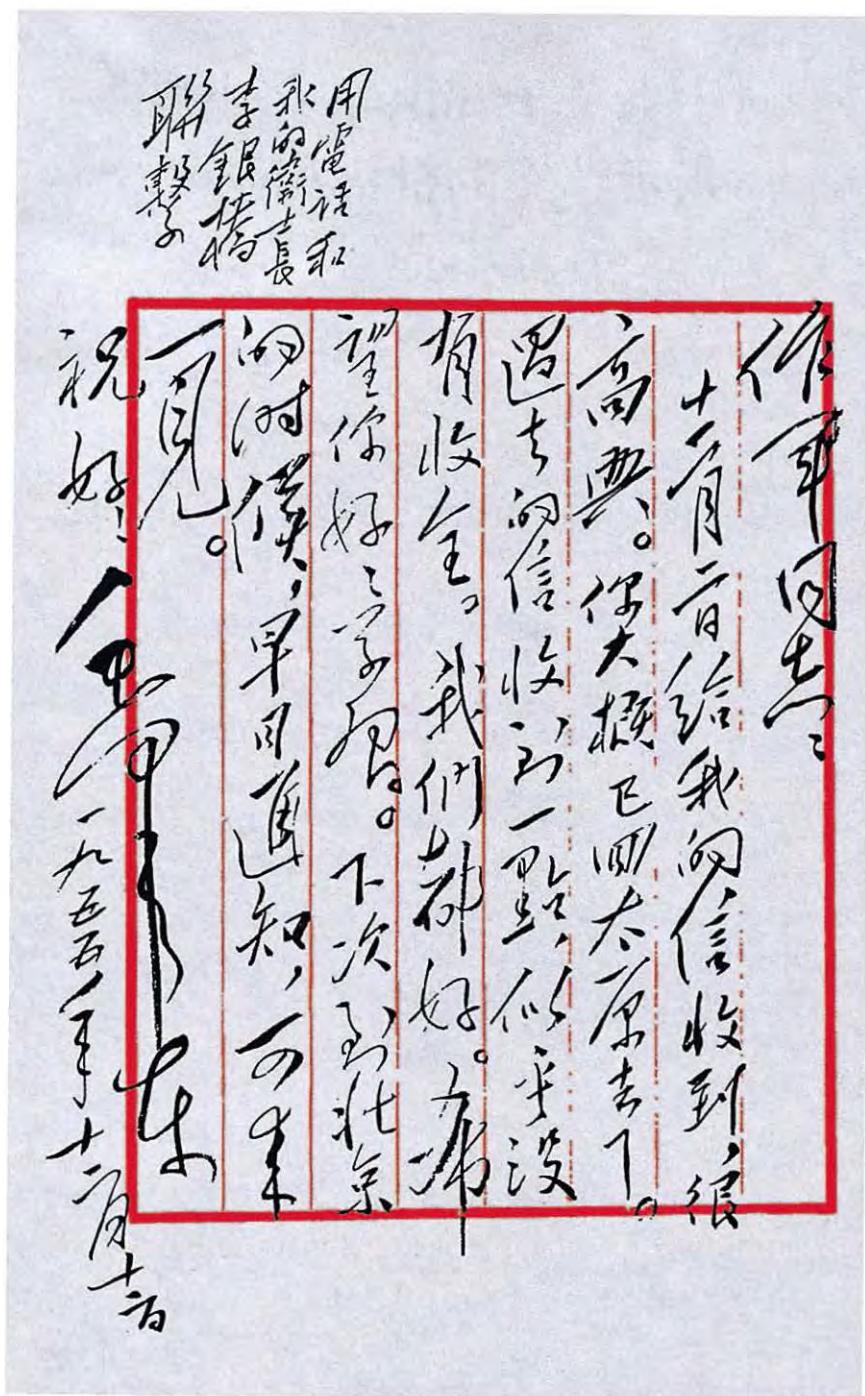
十二月二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你大概已回太原去了。过去的信收到一点，似乎没有收全。我们都好。希望你好好学习。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早日通知（用电话和我的卫士长李银桥联系），可来一见。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 翟作军，1937年至1939年曾在毛泽东处当警卫员、警卫班长。



毛泽东致翟作军信的手稿。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2月16日)

—

刘、周、陈、彭真、胡乔木^[1]即阅，于本日阅完，交尚昆^[2]于本日晚上发出。另印如前示。

这个文件可用。作了一些修改^[3]。最大的缺点是不通俗，只好将来再修改。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四时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即本篇三至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各党组，总政治部：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在准备召开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以前将应修改之点电告中央为盼。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

这个草案发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然后在中央准备召集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召〕开『会』的会议上再征求意见，加以修改，最后确定。

四

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五

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六

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

(1955年12月21日)

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

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一九六〇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

缩短一年，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要于一九五六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一百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一九五七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三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三十万个，或者四十万个，或者五十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十万个社，我国是否以三十几万个社或者四十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一九五六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一九五七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分，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一九五六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三年，最好七年，可以到十二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

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 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 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 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 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 在十二年内，大部分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肥料，一部分地区百分之百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 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 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 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1]（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

[1]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将麻雀换为臭虫。

蝇，蚊子。

(十四) 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

(十五) 在七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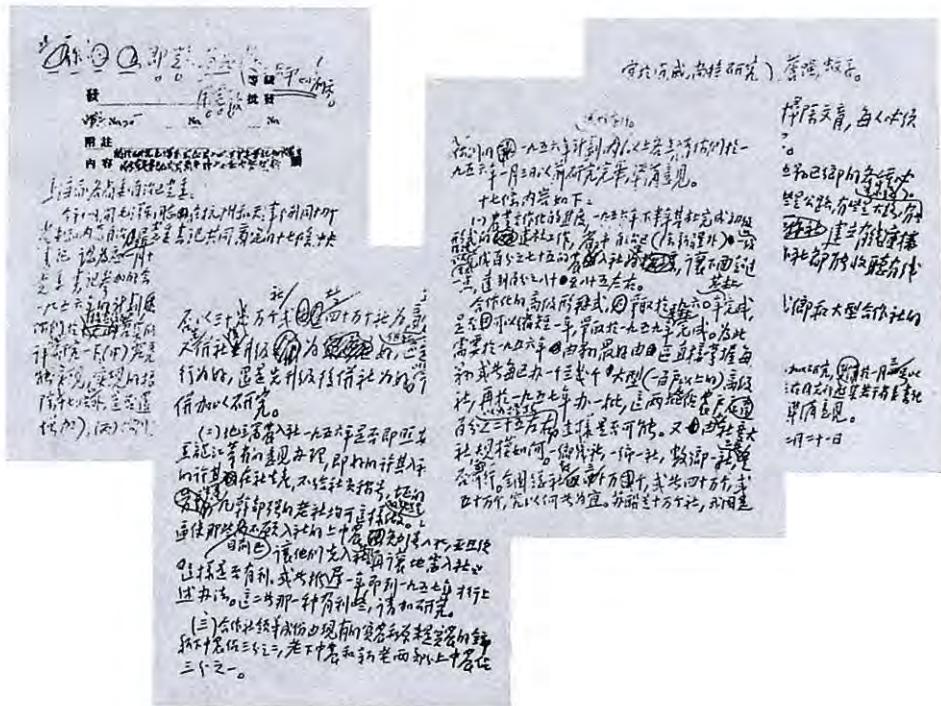
(十六) 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 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同15个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我们的愿望是使中泰两国友好^[1]

(1955年12月21日、1956年2月10日)

—

我们中国可以同泰国贸易。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呢？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至于日用品，你们应该自己设厂生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轻工业工厂。目前可以帮助你们设棉纺厂、造纸厂和糖厂。你们可以用大米、橡胶来换。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

对銮披汶总理、乃炮警察总监和乃练的致意，我表示感谢。我们希望大家合作团结起来，希望銮披汶同乃炮团结起来。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

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5年12月21日和泰国代表庵蓬等人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1956年2月10日和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

你们的做法要慎重，美国是会下毒手的，要小心。你们当初提出要秘密地来，当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后，就同意了。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銮披汶同乃炮应该团结，团结对泰国有利。美国希望你们不和，内部争吵。它制造这派反对那派，那派反对这派，是为了乘机捣鬼。这次你们来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你们那边访问，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如果你们不方便，我们也可以不去。如果我们去了，美国会同你们找麻烦，造成你们的困难，那我们也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

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

二

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要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我们可以等待。我们的愿望是要使两国友好。有误会可以慢慢解释，比如说怕中国要侵略泰国，其实我们是怕人家侵略，怕美国侵略。我们不怕印度或泰国侵略我们。现在美国正侵占着我们的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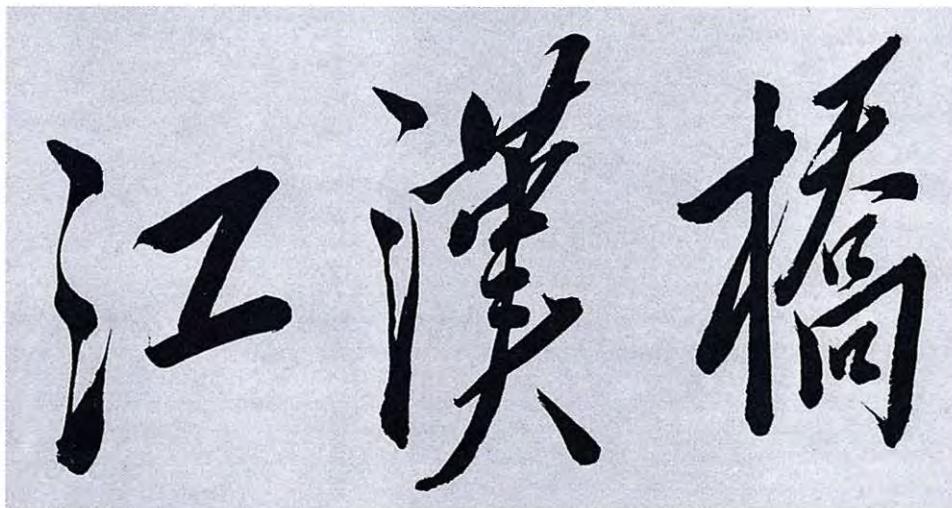
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要慢慢来，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做。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巴基斯坦、柬埔寨和锡兰的总理最近都要到中国来，其实巴基斯坦的前总理阿里先生在万隆会议上曾经骂过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吵过架，西哈努克亲王也曾经同周总理吵过架。（问周总理同旺亲王有没有吵过架，周答：旺亲王一开始就好。）你们吵得少一点。我们跟他们有吵架的一面，也有团结的一面。这些国家反对中国跟美国反对中国是不一样的。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这一条的。日本政府也反对我们，但这同美国反对我们是两回事。菲律宾也是一样，它不愿意同我们建立邦交，罗慕洛在万隆会议上也同周总理吵过架。我们很关心这些国家的处境，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共同的遭遇，都受到美国的欺负。亚非国家都反对殖民主义，印尼不满荷兰，北非和印度支那不满法国，马来亚不满英国，中近东也不满英国。那些殖民主义者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但是，不是中国在抢去各国市场，而是美国在抢去各国市场；不是中国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不是中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

事顾问团到各国去。总的来说，中国一没有抢夺各国市场，二没有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三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四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事实上，中国在中国境内抢夺了他们的市场，中国在中国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结果把他们的朋友蒋介石赶走了。我们争夺了中国市场，在中国建立了军事基地，我们对蒋介石不客气。美国说我们这样是犯了错误。现在我们又犯了错误，犯的什么错误？犯了接待外国朋友来访问的错误。三年来日本来了一千多人，其中也有国会议员，我们犯了接待他们的错误。现在又犯了接待你们的错误。有一天我们还会犯接待美国人来访问的错误。外交学会会长是一个犯错误的会长，因为他经常接待外国朋友。而你们到中国来也犯错误，以后还会有人再犯这样的错误。你们走向中立的时候还要犯一些错误，因为讲和平、讲中立，美国都说是犯错误。世界的是非竟是如此。

为江汉桥^[1]题名

(1955年12月)

江汉桥



毛泽东为江汉桥题写的桥名。

[1] 江汉桥位于武汉市汉口和汉阳之间，北连汉口武胜路，南接汉阳鹦鹉大道，是汉江上修建成的第一座公路大桥。1953年，武汉市政府决定修建汉江公路桥，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1954年设计并施工，1955年12月25日竣工通车。毛泽东亲自题写桥名。

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5年12月26日)

—

胡乔木^[2]同志：

此件^[3]可用。即送刘、周、陈、彭真^[4]阅后，由你处理。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六日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文件集序言稿时改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3] 指胡乔木1955年12月6日代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文件集》序言稿。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一九五五年十月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潮流是这样地勇往直前，以至一再地超过了任何最乐观的估计。成万万的农民涌进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农村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〇年完成。

关于元旦社论和准备召开 部分省委书记会议等问题的信

(1955年12月30日)

周、刘、陈、彭^[1]各同志：

社论^[2]写得很好，陈伯达^[3]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

我已约陈毅、柯庆施^[4]二同志来此，先行商量一下，准备一月五日开会的事情。陈云同志病情如何？不知一月四日能来此否？如未愈，则不要来。谭震林、廖鲁言^[5]请通知他们于三日或者四日来此。

请周要尚昆^[6]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一月四日到达杭州，准备于五日开

[1] 周，指周恩来。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人民日报》准备在1956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4]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5]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6]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

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一篇序言^[1]，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告田家英^[2]同志。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1] 指毛泽东1955年12月27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

[2]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

(1955年12月)

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有管？

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 这是毛泽东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所作的指示。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记录稿）

（1955年）

我们是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均很低，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内是过渡时期，中心是工业化，打物质基础。在现有条件下，继续贯彻党的艰苦奋斗传统。资金唯一来源靠自己积累。第一个五年十个指头，只做了一个。第二、三个五年资金需要更大，不厉行节约无法完成任务。如果非生产建设投资突出了，会破坏工农联盟和全国团结，农民为什么不进城？十五年内，不可能样样现代化，样样社会主义，是打基础阶段。非重点建设，非近代技术装备的工厂，第一个五年感到困难，第二、第三个更要大。削国防不可能，削行政人员，也非安置生产，非加强生产不可。不可设想削减建设国防人员解决问题。只有全面节约解决问题。

过去认识不深，贯彻不透。如工厂，福利设施均社会主义设施。已无福利可增加。先抓生产、开工。

农场也太近代化了。牛场120万平方米，先进社会。

工房、宿舍、高楼、大厦，百把万，住不起。长春汽车厂、乌拉尔厂，宿舍太漂亮了。厨房，西太后出来也要说话了。这是不了解建设困难，忘记传统，违背工业化方针及与农民共艰苦患难的精神。

生产和生活不平衡。节约为了增加积累。

一、除近代化技术设备以及和设备必要配合的厂房（国外的按国外设计，国内的按可能削减），其他一律降低造价。和延安窑洞看齐，办公室、教室、农场、宿舍、车站等按过渡时期标准，用十五年、二十年。一律砖木结构，甚至土坯子、竹泥墙。

一类是现有大城市，可以砖木。

二类新的单独城市、厂矿，要用土坯。

办公室、学校50元至70元

宿舍20元至50元

不同宿舍不同房租。

仓库40元至50元

车站50元至70元

首都盖大楼装样子，须国务院批准。

工程部六至八月拟出标准。

二、新建工厂、铁道、农场、福利、设施，根据生产、利润、业务的情况，逐年实施。先抓重点，如宿舍、卫生所无利润以前不建设。不可一下子社会主义，是远景，不是一下子社会主义。首先礼堂不可搞。

三、新建企业其他方面厉行节约。轻工业至多一年的筹备机关，以前筹备由部局直接筹备。

设计，照标准。重工业部门到苏联的人太多。

实习生的待遇要降低。

每个环节，严加控制。厂内办公室，沙发一律不准，也不买收音机。不要厂长和职工生活脱离太远。

四、现有新城，计划均要修改，不要搞社会主义化，要利用旧

城。工业要相当疏散。

1. 不搞高大建筑。一层两层。

2. 非工业集中的城市，根本不建城市。如职工用水，可用地下水，用自来水者使用公共水龙头。

马路要，绿化面积慢慢来。

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化”。二十年后，再用新规划。

五、今年准备建筑的高楼大厂，未动工的一律停止。

六、地质勘探：

1. 勘探量不必增加。

2. 希望增加的，增加50%工作量。

七、建筑部六、七、八个月交出标准。

1. 生产方面：

(1) 降低成本：工业6%加到7.5%；铁路2.5%至3.5%；商业2.9%至13.9%。

(2) 节约原料，轻工业、棉花、卷烟量。

(3) 重工业完成新产品试制计划，上半年49%，不及一半。

(4) 一律停止收新工人，先内部清理调整，现在都核不清。现在人多了。

(5) 每一环节，直至清理垃圾。鞍钢月搞五万吨钢铁，指标到车间。

2. 生活消费：

(1) 除招待外宾外，一律只供清茶一杯，一律不请客、会餐。

(2) 办公室不买沙发，首长办公室，两个小沙发，用会议桌。

(3) 公文表报节约，非国家统计局批不可发。

(4) 减少汽车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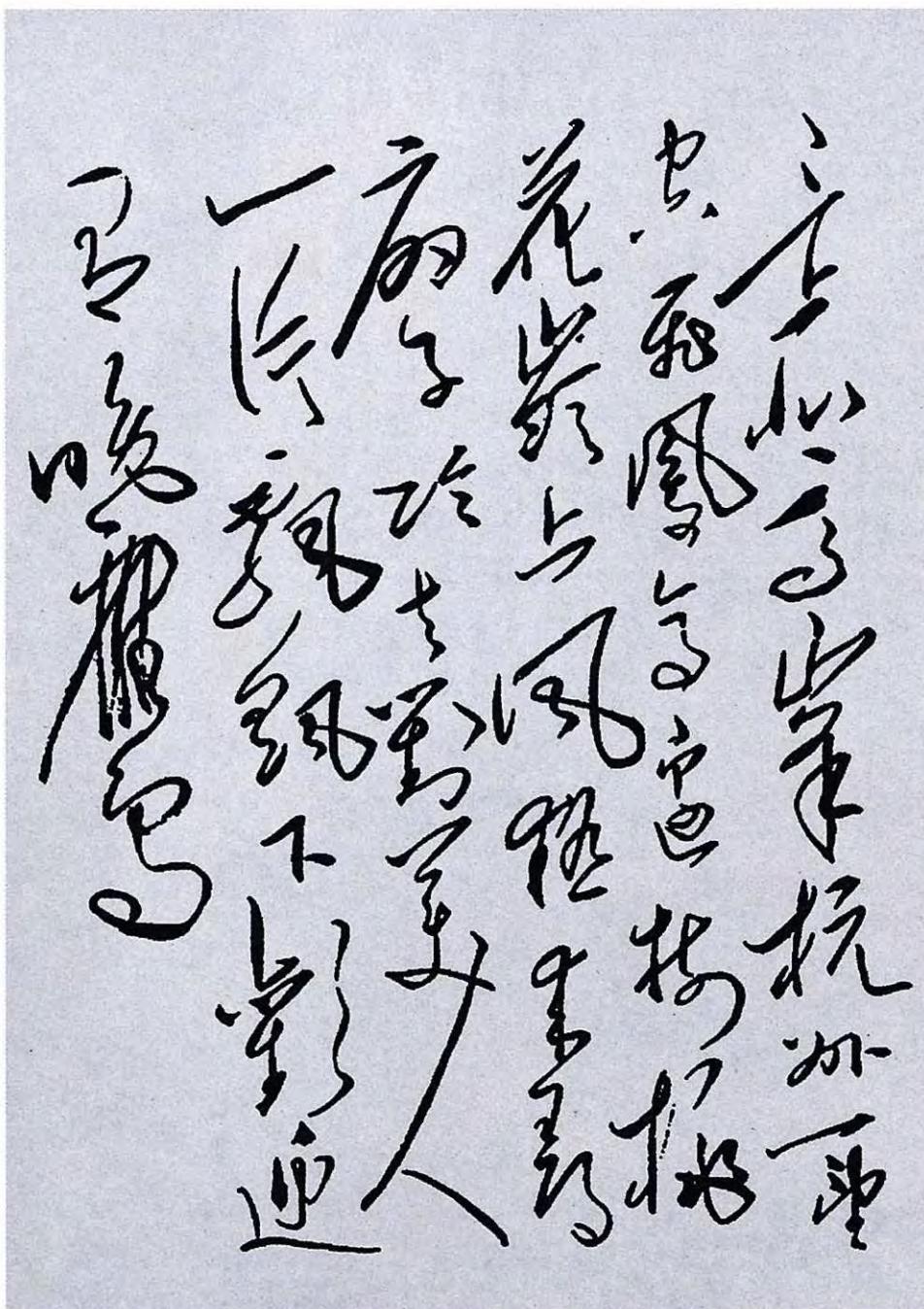
五律·看山

(195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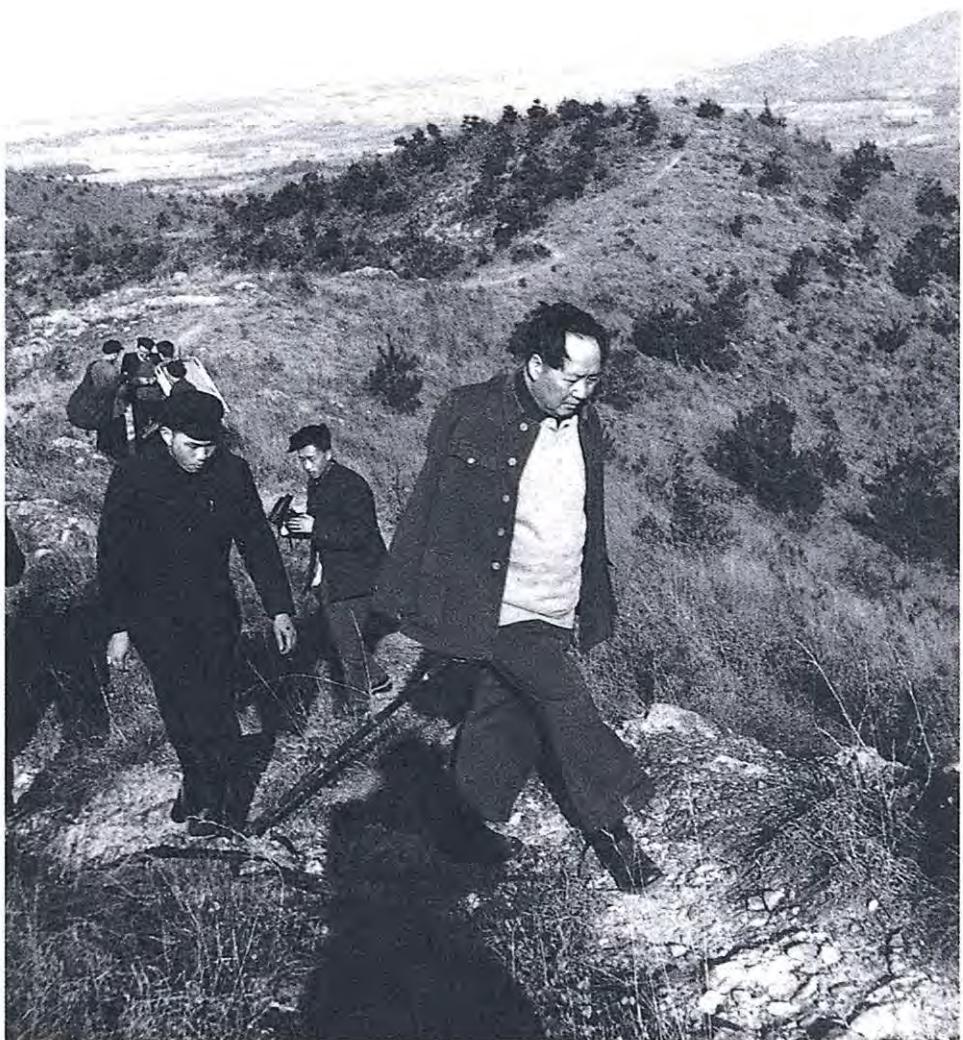
三上北高峰^[1]，
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
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
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飘^[2]下，
欢迎有晚鹰。

[1] 北高峰，在浙江省杭州市灵隐寺后，与南高峰相对峙，为西湖群山之一。在北高峰附近有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等名胜。根据毛泽东自注，诗中的“扇子”指扇子岭，“美人”指美人峰。

[2] 飘飘，同“飘摇”，飘荡、飞扬貌。这里指鹰翔。



毛泽东手书《五律·看山》。



毛泽东登上杭州北高峰。

七绝·莫干山^[1]

(195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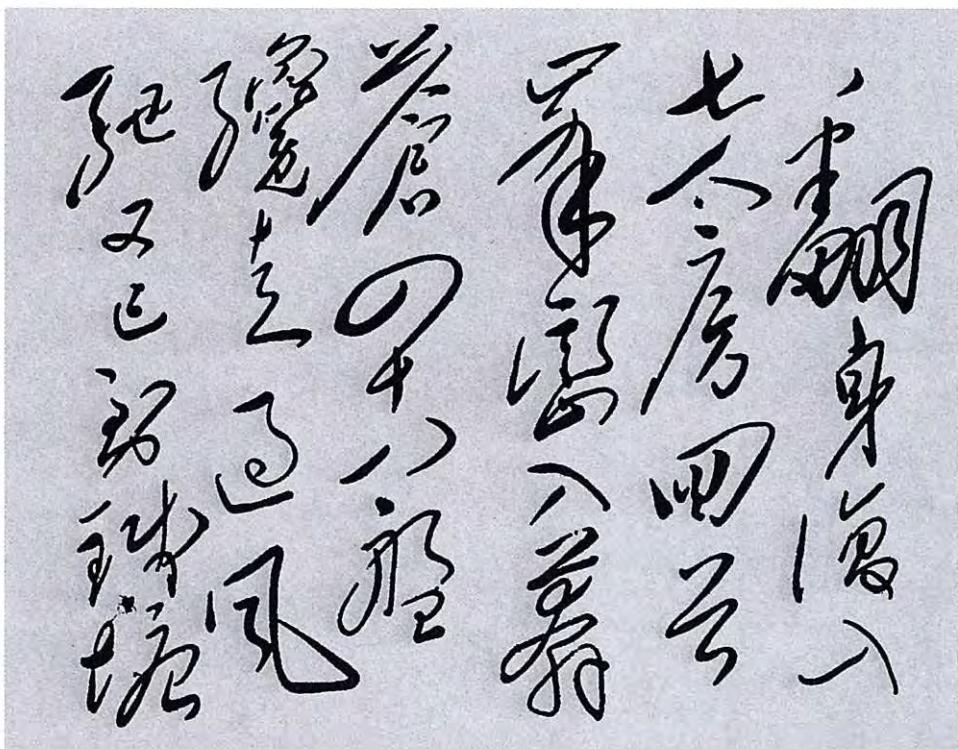
翻身复进七人房^[2]，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3]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4]。

[1] 莫干山，在浙江省德清县西北。相传春秋时吴国在此铸“莫邪”“干将”二剑，故名。为浙北避暑、休养胜地。

[2] 七人房，指毛泽东使用的卧车，可坐七人。

[3] 四十八盘，泛写曲折盘旋的山间公路。

[4] 钱塘，旧县名。这里指杭州市。



毛泽东手书《七绝·莫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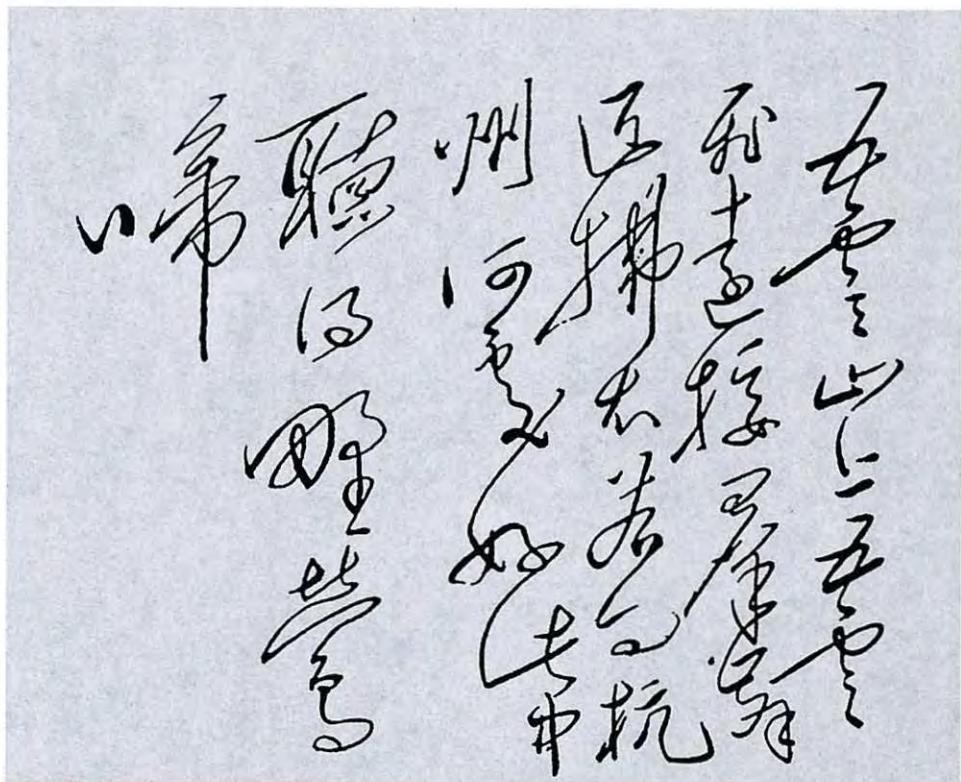
七绝·五云山^[1]

(1955年)

五云山上五云飞，
远接群峰近拂堤^[2]。
若问杭州何处好，
此中听得野莺啼。

[1] 五云山，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群山之一，邻近钱塘江。据传因有五色彩云萦绕山顶经时不散而得名。

[2] 堤，指钱塘江的江堤。



毛泽东手书《七绝·五云山》。

1956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

（1956年1月7日至9日）

—

周恩来同志：

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12月21日，中共中央将“十七条”发至各地征询意见。1956年1月上旬，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商量的意见，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十七条”进行多次补充和修改，逐步形成为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40条。这个草案，1月23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1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布。本篇三至九，是毛泽东对纲要草案稿（当时为36条）的修改，其中三至八改在“第三天会议改正稿”上，具体修改时间不详，九改在毛泽东这次修改抄清稿上，在标题上方注有：“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稿”。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1]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来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2]，现在是汇报情况，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二时

有些指标数字尚待填入的，待廖鲁言^[3]同志回京后，查明填入。

[1] 指中共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国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

[2] 指为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于1956年1月5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部分省委书记会议。

[3]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二

恩来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1]，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2]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53本，请令秘书处照我改正的一本，将未改的52本加以改正。

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我觉得可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可否请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各同志开会一次，将此件看一遍，大略谈一下（其详待下次再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时以前用电话告我。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的时候，再行正式下达。我们这里的汇报会议本日下午七时即可结束，我拟于今晚十时动身返京。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上午四时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条款是在讨论修改过程中逐步增加的。1956年1月4日的改稿为22条，1月7日前增加到36条。在1月7日的铅印件上，根据毛泽东前一次批注的意见，增加了有关青年的1条，并加写了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的1条，共38条。1月8日的铅印件上，又增加了关于勤俭办社和工农联盟2条，成为40条。

[2]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三

(5) 对于由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6)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

四

蔬菜是一项重要的副食品。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一律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民应当有计划地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五

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积储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区、乡和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定出实现这个要求的具体规划。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

六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

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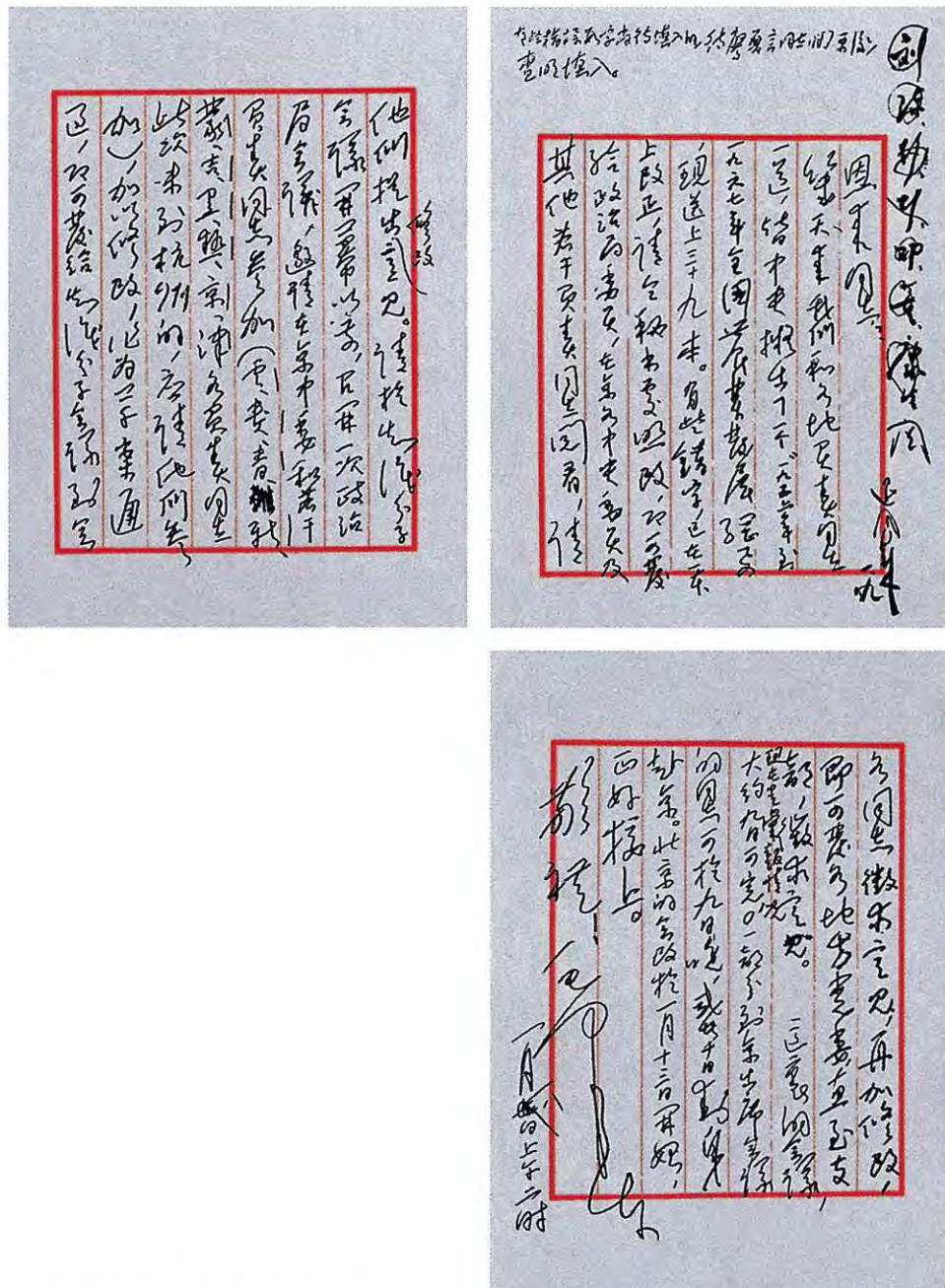
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八

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为了便利社员从事生产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为了改善社员的卫生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和节约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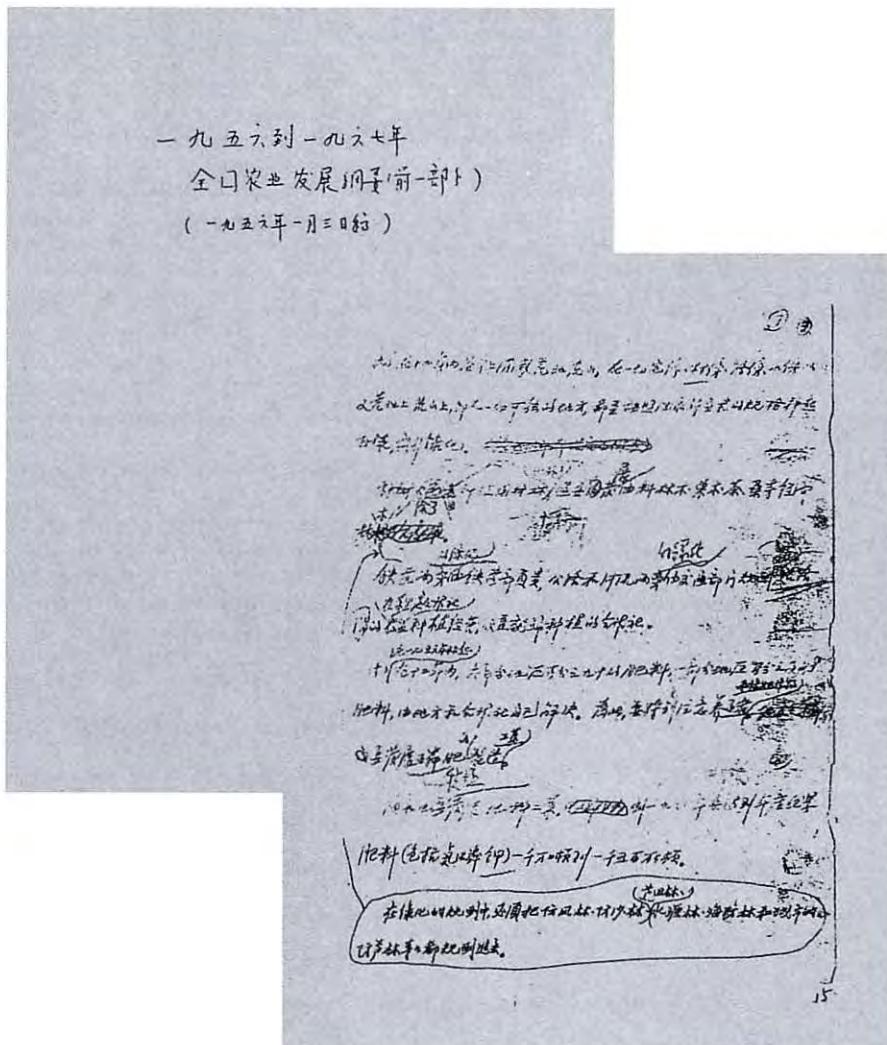
九

加强农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手稿。

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



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部分）。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6年1月10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值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并且正充满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最近阿尔巴尼亚参加联合国的事实定将使阿尔巴尼亚今后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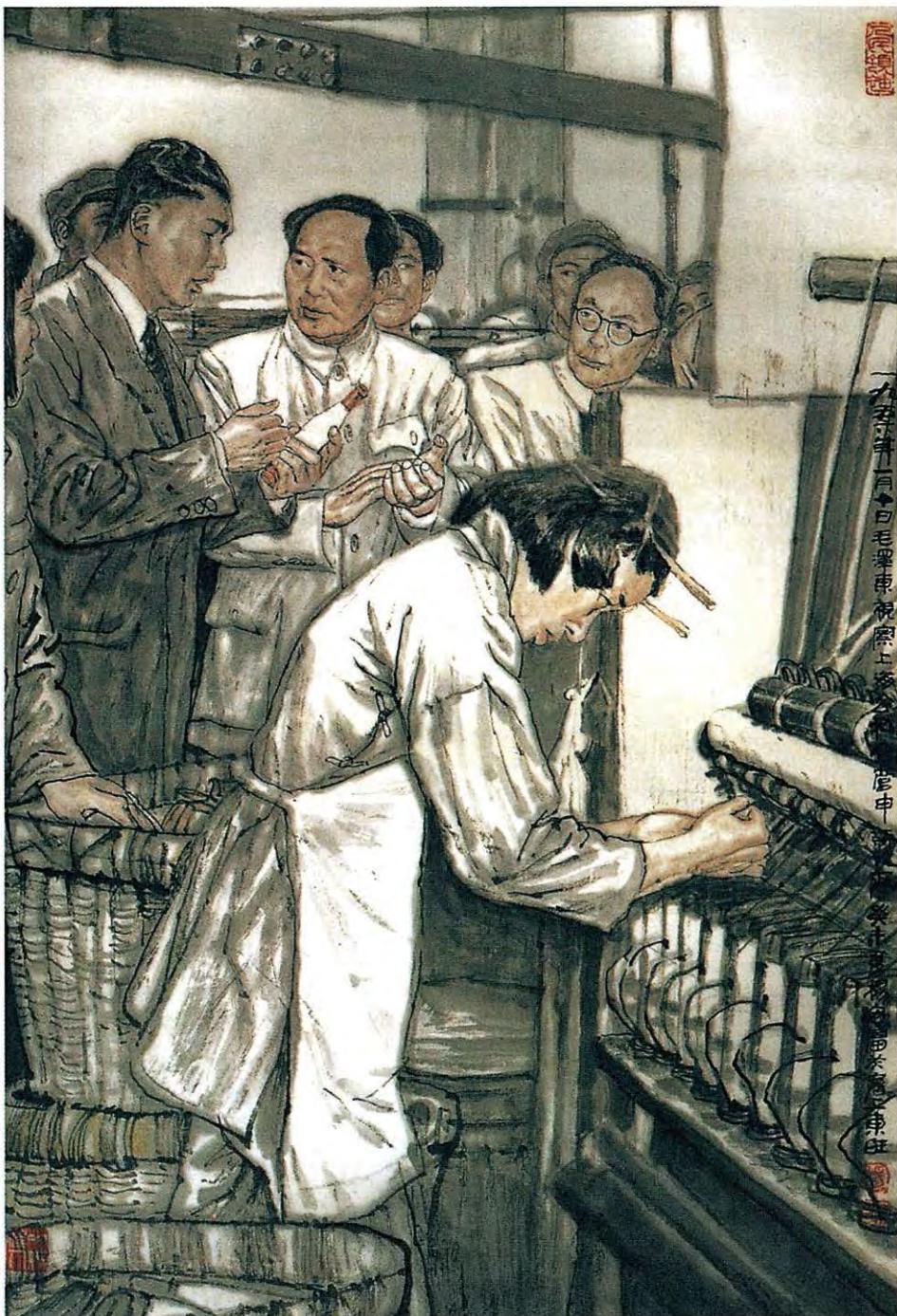
1956年1月10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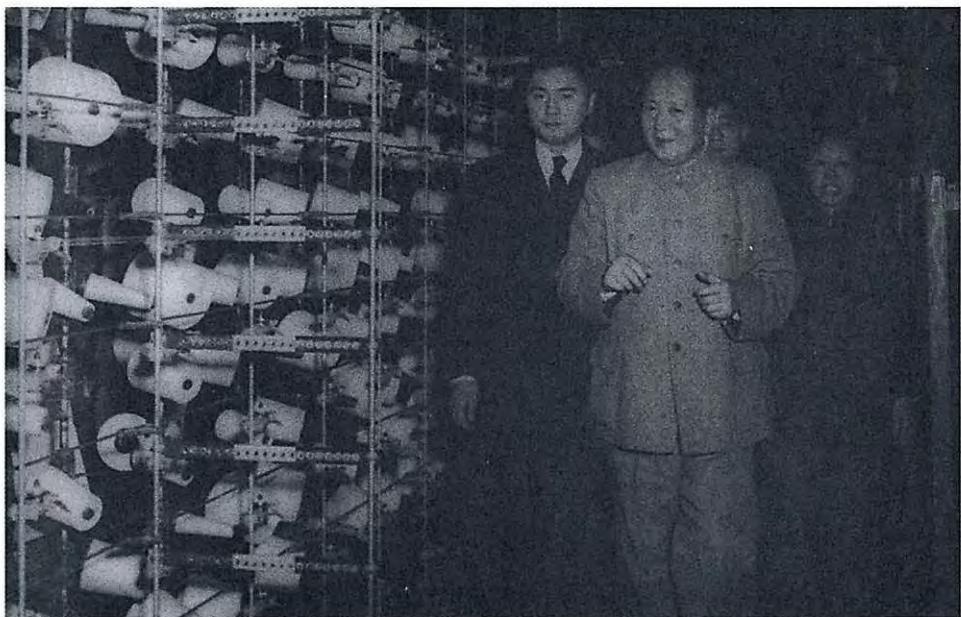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棉纺九厂。图为毛泽东和荣毅仁在交谈。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荣毅仁的陪同下，视察公私合营后的申新棉纺九厂。



《视察棉纺厂》(中国画)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参观公私合营后的申新棉纺九厂。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和各界人士交谈。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到上海江南造船厂视察。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江南造船厂，参观正在建造中的我国第一艘潜艇。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参观上海江南造船厂。



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南京市郊十月农业成产合作社，和干部、社员亲切交谈。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南京郊区饶辰乡十月农业合作社视察。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南京视察时和群众在一起。



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及苏联顾问合影。



1956年1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1956年1月，毛泽东和南京各界人士在一起。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南京和各界人士在一起。



1956年1月，毛泽东和南京各界人士在一起。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参观南京无线电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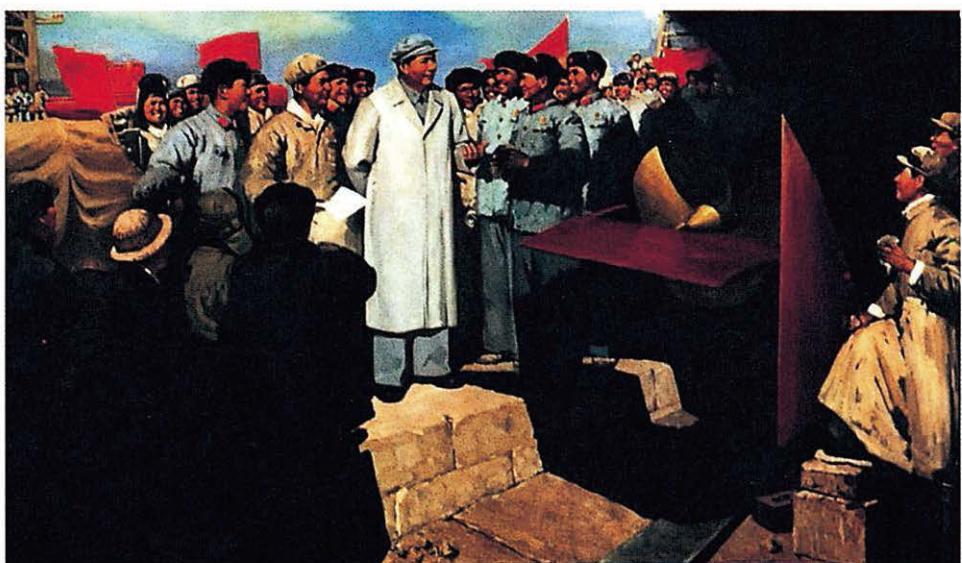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1956年1月，毛泽东参观南京机械厂。



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天津拖拉机配件厂。



《毛主席来到造船厂》（油画）

给齐吉树^[1]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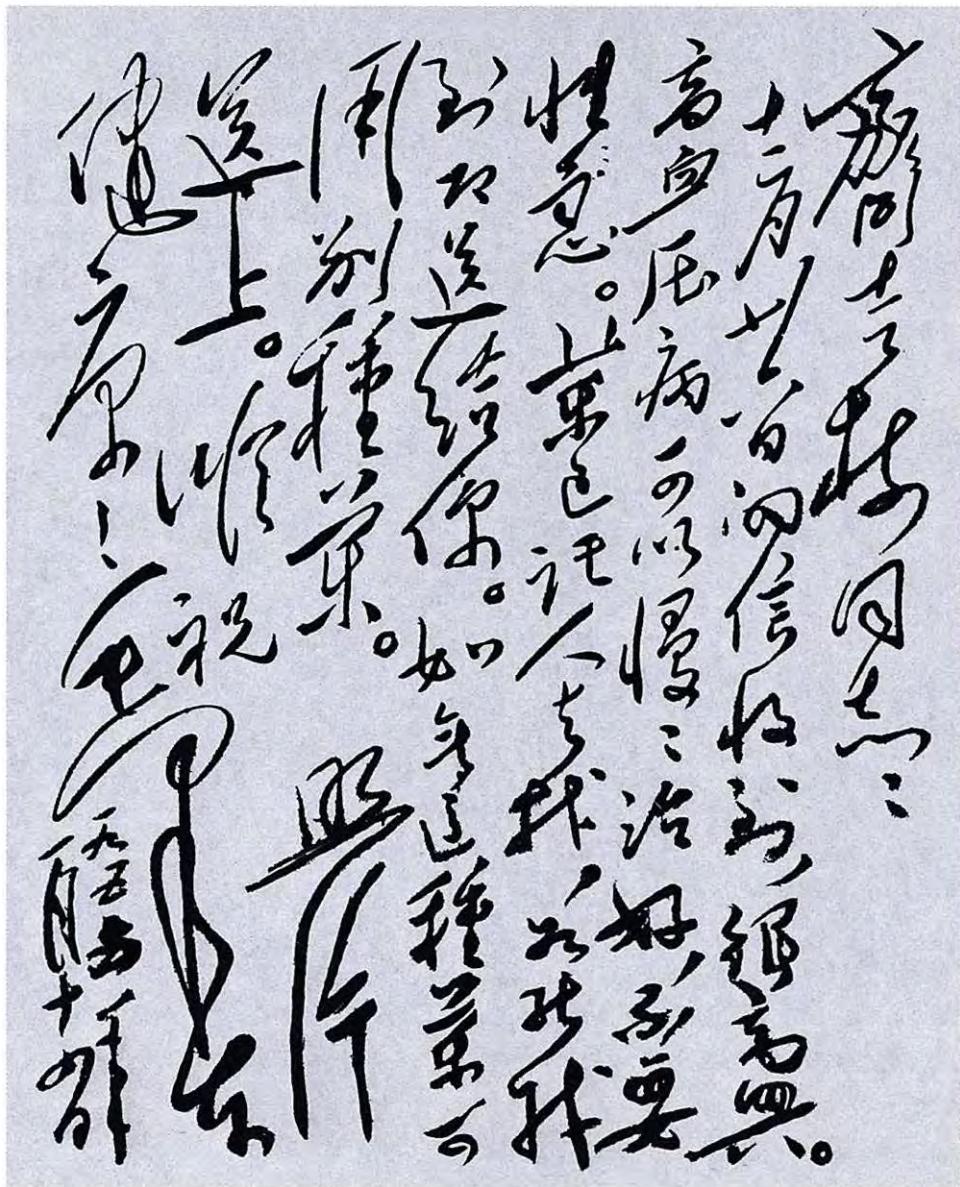
(1956年1月14日)

齐吉树同志：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1] 齐吉树，1943年至1946年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



毛泽东致齐吉树信的手稿。



1956年，上海信大祥绸布商店职工在庆祝公私合营。



1956年，全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上海市永安分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后，商品品种增加，营业额上升。



1956年1月，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民建上海市分会主任委员、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率领工商界赴京报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亲切接见。



1956年1月15日，20多万北京各界人士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图为毛泽东在周恩来和彭真的陪同下，接受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呈献报喜信。



1956年1月15日，20万北京市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图为农民代表向毛泽东敬献喜报。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听取北京工商业职工的汇报。

关于控制高级社发展数目的批语^[1]

(1956年1月19日)

先送廖鲁言^[2]同志办，同意王任重^[3]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4]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5]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廖鲁言1956年1月19日转报王任重关于湖北省发展高级社的控制数目问题的电话请示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目前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关于高级合作化问题，一部分同志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发展1万个高级社（达到农户总数的25%到30%），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同志主张放手发展高级社，达到全部农户的70%或80%，基本上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仍按省委计划发展比较稳当。廖鲁言在报告中表示同意王任重的意见。王任重在电话中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2]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3]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5]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56年，毛泽东亲切会见台湾省政协代表。



1956年，毛泽东和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高卓雄亲切交谈。



1956年，毛泽东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亲切交谈。



1956年，毛泽东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亲切交谈。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上 发出的号召

(1956年1月20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 指中共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1月20日)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

会议开得很好。听了各位同志的讲话，很高兴，可以看出同志们的水平很不低，很高，许多讲话是很好的。

现在我要讲的是领导方法问题。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拿最近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知识分子的问题等几件事来看，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迟一些、坏一些，也可以早一些、好一些。我们在延安时，曾组织过宪政促进会，现在没有了；现在有人说中央是全国社会主义促进会，这次会议也是一个促进会，省、市委，各部门，也是促进会。领导机关可以促进，也可以促退，也可以有进有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是国民促退政治，它促使社会倒退。我们的领导机关应该促进事业的发展，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如农村工作部有一个时期就是农村工作促退部，因为它要砍掉些合作社；卫生部有一个时期也是促退部，把事业搞垮了。各地方、各部门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呢？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就丧失了上层建筑应有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基础，上面还有政府、党、各部门，这都是上层建筑，必须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了使上层建筑能够适应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你们对客观情况的发展注意不够，估计不足。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万年后还是有两面性，但是，今年和明年不是一样的两面性，如果一点不变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但是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农民几年来对他们的落后性抛弃很多，最近几个月，农民跑得很快，几个月就改变了个体经济。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我们总是说他们“唯利是图”，现在他们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变成公私合营了），“唯利”又怎样“是图”法？对知识分子也是尽说他们不好，可是这次会上同志们说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占40%左右，落后的当然还有，但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应该促进这种改变。可是有的同志看不到这种变化，想到没有对象的地方去决斗，对象没有了，还要斗，这就变成唐·吉诃德了。

当然，还有对象，但也在起变化，因此我们应当欢迎这种变化。我们应该看到在生产关系改变后的新形势，去年上半年那样困难，到处骂我们，党内、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最近两三年，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这些情况反映在同志中间、人民中间和知识分子中间，我们应该认识这些情况，并且适应这些情况。

讲到促进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同时也应该注意不要搞那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敲锣、打鼓、报喜，这是好的，这正是促进嘛，这正说明中央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嘛！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情况要引起我们注意，值得谈谈这一点。农村发展纲要中已把好些农业增产的指标去掉了，右倾保守思想存在于各方面，两种领导方法采取哪一种？我因为其中有些还没有研究，没有充分根据，例如垦荒五亿五十万亩，据说用的钱要等于一年的预算，要多少人民币？垦荒还是要垦的，但是否能垦那么多，要仔细研究。计划一定要行得通，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了。合作化快是好的，但不要无根据地快。各省同志要注意。高级化务必做到在绝大多数人满意条件下高级化，现在听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对放弃土地分红还放不下，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如等几个月。北方可以到今年秋冬或明年春天再转，明春最好。建议你们多考虑。陈云同志说公私合营，人家送上门来，不要不好，但问题是内心是否通，如不通，那就等几个月，等几个月并不算长。我建议这样，不要以为又是来阻挡你们，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总要叫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高兴，不高兴的过了百分之几就有问题。各部门计划指标也要放在可靠的基

础上，本来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无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倾冒险，虽然目前这还不是主要的倾向，但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的头脑不那么清醒，不敢于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难听。凡是经过调查研究，办不到的，要敢于说办不到，敢于停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北京已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

经完成。要完成，还要做几年工作（比如说还要三四年），资本家定息的尾巴哪年割掉，还要看情况发展。北京资本家清产核资用自评的办法，可以介绍，以后农村中地主富农入社，哪些人好，哪些人坏，哪些人算社员，哪些人算候补社员，哪些人应当管制生产，可不可以也让他们自己去评，我们加以领导，建议各地试试看，让他们自己里头发生斗争。

再一点，有的同志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到的“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句话，我说“不能完全按照”，这就是说大体上还要按照，否则五年计划，岂不也没有了。但是有的同志一改改成“已经不能按照”或“已经完全不能按照”，可见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了。

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得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都赞成，你们赞成不赞成？老百姓问题不大，识字很容易，但有些人觉得采用罗马字拼音，好是很好，可惜罗马字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外国人学习，“用夏变夷”，没有问题；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用夷变夏”，就有问题了。洋字比较好，吴玉章同志说的有理，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说：“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见得。因此我们采用罗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现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吗？罗马字出现在罗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吗？我没有学过文字史，他们过去也都有自己的文字的。据说我们中国字是仓颉造出来的，我看不见得。社会主义不是出在俄国，俄国也学了。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统统拿过来，变成我们的东西，要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

在吴玉章同志的讲话中，其中有一条我是不赞成的。就是他说：“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肃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并用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结果。”“这种新的观点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发展，已经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产生出来，当新的观点和理论产生以后，它们就成为最严重的力量，就能促进解决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所提出来的新任务，就能促进社会向前发展。”这样说来，好像农业合作化是新的事情，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但是，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联共党史上就写到的，他们是地球上第一次做这件事，还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讲过了，三十多年前，俄国已经做了。我们现在讲的，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理论。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过去在欧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已经提出了新任务，产生了新的观点和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后列宁又加以发展。我们有没有新的东西呢？有的，那就是在形式和细节方面，如互助组的普遍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是新的。关于过渡时期和资产阶级联盟，在理论方面，列宁已讲过了，只是我们实行得比较完全和有步骤，这很好，有必要加以发展。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要注意情况的复杂性，善于分析，以适合各种复杂情况。许多工作，也还有发展余地，譬如肃反也要发展，现在肃反有一个准备阶段，大有文章可

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好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就能做到比延安甚至比去年又快又好。准备工作做不好，底没有摸清，就会把时间拖长，树敌太多。这都属于领导艺术，也都大有发展余地。去年夏天以来，几方面的工作，如反胡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领导艺术都是有发展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更发展一步，我们在理论上也应有所贡献，把前人讲过的进一步地发展。但十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显着新的东西。

和平问题。和平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十二年时间，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呢？看来是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经过二十一年，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十年，还可能多些。现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已有不同，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与过去不同，挑战不大可能。美国讲究赚钱，蚀本他不干，没有人抬轿子，自己不想用脚走路。现在美国军队的摆法，就不像打仗的样子，它到处搞基地，就像牛尾巴捆绑在桩上，怎样好动呢？但是还要估计到也有可能突然袭击，世界上可能出疯子的，必须估计到。所以我们的工作，越能提早完成越好，越有利。

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多了，如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知识分子问题现在还没有主动，还要过一些时候才能主动。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批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们都不能制造，只能造中等的，“两头不行，中间可以”。我们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车、坦克、飞机有多少，一辆汽车、一架飞机，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翘尾巴的！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

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资本论》这是可能的，二十年不行三十年，最多一百年就差不多，否则叫什么共产主义？同志们回去要向各方面说清楚这件事情。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平。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也不错，海岸线很长（就是没有轮船），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六亿人口，又是勤劳、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现在美国只有十几颗氢弹，一万多万吨钢，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该搞它几万万吨钢。

中国有个好处，一个是穷，一个是白（无知识），这也有两面性，穷就要革命，知识少是不好的，但好比这张白纸，这一面写过了，就没有什么好文章可做，这一面没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可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1956年，毛泽东接见从美国归国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

对达赖喇嘛^[1]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1956年1月21日)

达赖喇嘛：

你在一月一日给我的新年贺电收到了。谢谢。我衷心祝你身体健康，并盼你在新的一年内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一日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对班禅额尔德尼^[1]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1956年1月21日)

班禅额尔德尼：

谢谢你的新年祝贺。过去一年内，日喀则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有进步，我们听到了都很高兴。现在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西藏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都是要一年比一年兴旺起来的。在新的一年里，你们那里也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我祝你身体健康，学业精进，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一日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关于注意研究解决小学教师待遇低 等问题的批语

(1956年1月21日、4月11日)

—

陈云^[1]同志：

此件^[2]请你注意研究一下。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

刘、周、陈、邓、彭真^[3]同志：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1956年1月21日第二十二号《情况简报》摘报的“小学教师的一些意见”。此件反映了许多小学教师来信中提出的薪金低、入党困难、工作忙累、找爱人难等问题。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关于注意研究解决小学教师待遇低等问题的批语

此件^[1]值得一阅，并应予以解决。

毛泽东

四月十一日

[1] 指1956年4月6日第七十八号《情况简报》摘要的“小学教师中的一些问题”。此件反映了当时小学教师中存在的待遇低、地位低、质量低三个主要问题。

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1]

(1956年1月22日)

—

你们这个国家是打出来的，奋斗出来的。帝国主义这套东西就害怕打，这点我们和你们相同。我们过去没有很多东西，只是小米和步枪，我们的敌人是飞机加大炮，但还是小米、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这是从古至今的一条基本原则，弱小但是进步的战胜强大但是落后的。

—

你们国家与我们一样，处在最前线，经常很紧张。你们是吃新闻饭的，一定很紧张。不晓得哪一天美国会整我们，可能明天就整我们。不知道美国哪一天来放原子弹，究竟放不放？原子弹并不比刀、枪厉害，你们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枪一打三百年，汉代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一打只剩一千万。唐代又发展到五千万，安禄山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造反^[1]一打又剩一千多万。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无人。欧洲历史上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拿破仑时代开始发展到步枪，可打八百米远。以后又发展大炮，用热武器打仗，缩短了时间，减少了破坏。现在打仗一般三四年可解决。

我们要准备着。我们无原子弹，不想打。苏联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国主义丢下原子弹，我们准备打。打的结果，欧、亚、非跑到我们这边来，欧、亚、非三洲都实行社会主义。五分天下有其三，剩下美洲、澳洲给他们，何况中南美是不是给他们还不见得。因此我们打了再建设也可以。我们还没有建设好，索性打五年，最多丢掉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还建设得好一些。因为那时候地盘更大了，那时整个欧、亚、非三洲都过来了。要往这方面设想，它即使打来，可能也是件好事。你要搞就搞，你不要来吓我。这些话我们也公开向资本主义国家讲过，我们是有根据的，不是乱吹。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也吃了亏，社会主义沾了面子。因此，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一定要扩大，他们要大吃亏。这是第一条，是它要打的一条。

第二条，它不打。他们也研究历史，不打的可能性很大，大家都不赞成打。我们这边愈来愈多，尼赫鲁^[2]也在内，墙筑得愈来愈厚，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筑墙的工作，把墙筑高筑厚。

第三条，要对中间国家做工作，在敌人营垒内也做工作，这没有秘密，使他们孤立。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南斯拉夫与我国要做和平工作，一面加强自己，一面争取人家。我们认为

[1] 公元755年，唐朝军事将领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起兵叛乱，占领唐都城长安，史称“安史之乱”。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1]的参谋长，我们必须把第一条考虑进去，这样不吃亏。要准备突然事变，但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我们尽一切力量争取和平。我们双方多写点文章，广播些好东西。



1956年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并观看铁托总统赠送的礼品。

[1]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写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 后面的一些文字^[1]

(1956年1月)

四百斤问题^[2]（水的问题）。

储粮两年问题。^[3]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为会议文件之三印发。毛泽东在这个印件上对纲要草案又作了修改，并在另外一页纸上写了本篇这一些文字。这一些文字，主要是对纲要草案中他所作的一些修改的说明，其他是表明他对纲要草案中某些问题的思考。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即将第二条中老解放区和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1958年改为1957年，其余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1959年改为1958年，即分别提前了1年。

[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六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始，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以北地区，由现在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

[3]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七条规定：“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一九五六年始，在十二年内，积储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区、乡和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定出实现这个要求的具体规划。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

十二年基本消灭十种病虫害问题（加了“可能的”的限制）。^[1]

省内外移民 1000 万户、垦荒五亿五千万亩问题（与国营数是否有重复？）。^[2]

治病问题（加了“在一切可能地方”一句）。^[3]

除四害问题（作了限制，应无问题）。^[4]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十八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始，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例如蝗虫、粘虫、棉蚜虫、稻螟虫、玉米螟虫、红蜘蛛、红铃虫、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甘薯黑斑病。”毛泽东在其中的“基本上”三字前面，加写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八个字。

[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十九条规定：“垦荒移民。从一九五六年始，在十二年内垦荒五亿五千万亩，省内和省外的移民共一千万个劳动力，大体上也就是一千万户。”第二十条规定：“发展国营农场。从一九五六年始，在十二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万亩增加到二亿四千万亩。”毛泽东对这两条作了批注：“两项是否有重复？”还将第二十条中的“二亿四千万亩”改为“一亿四千万亩”，并在“四百万亩”旁划一问号。《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在 1956 年 1 月 26 日公布时，第十九条删去了垦荒和移民的数字。第二十条的这段话改为：“从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 1955 年的 1336 万亩增加到 14000 万亩。”

[3]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二十六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始，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的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白喉，疟疾，天花，性病。”毛泽东在其中的“基本上”三字前面，加写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八个字。

[4]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四害。从一九五六年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6年，毛泽东看贫下中农的丰收喜信。

对廖鲁言^[1]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56年1月25日)

—

尚昆^[3]同志：

此件^[4]请即付印，校对勿讹，印³⁵⁰份，于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时带到勤政殿，发给到会的人，每人一份（共有320人左右）。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零时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廖鲁言的说明稿比较集中修改的两段。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经毛泽东改定的廖鲁言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1956年1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二

这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还是一个草案，要请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加以讨论，提出意见。

三

许多人感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城市一百多万失业人员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浙江省嘉兴专区就要求从上海移入十万个劳动力，江西省也向上海要求把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失业人员移五十万人到那里去。至于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就更不待说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

(1956年1月25日)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2]。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1] 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2] 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秋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2]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1]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的编制，从1951年开始进行，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于1955年7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执行的结果是：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到1957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1月公布。1957年10月公布修正草案。后又经修改，于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40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1956年1月，毛泽东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商量，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这个草案初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在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图为毛泽东在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关于发表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 社论问题的批语

(1956年1月26日)

即送人民日报

邓拓^[1]同志：

这篇社论^[2]不能用，因为完〔全〕和廖鲁言的报告^[3]重复，并且还不及报告的详尽。我看，有了那篇报告，不写社论也可以了。如果要写，要由你们自己写，并注意不要和廖的报告重复。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1]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为《人民日报》写的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稿。

[3] 指廖鲁言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发表于1956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

给宋庆龄^[1]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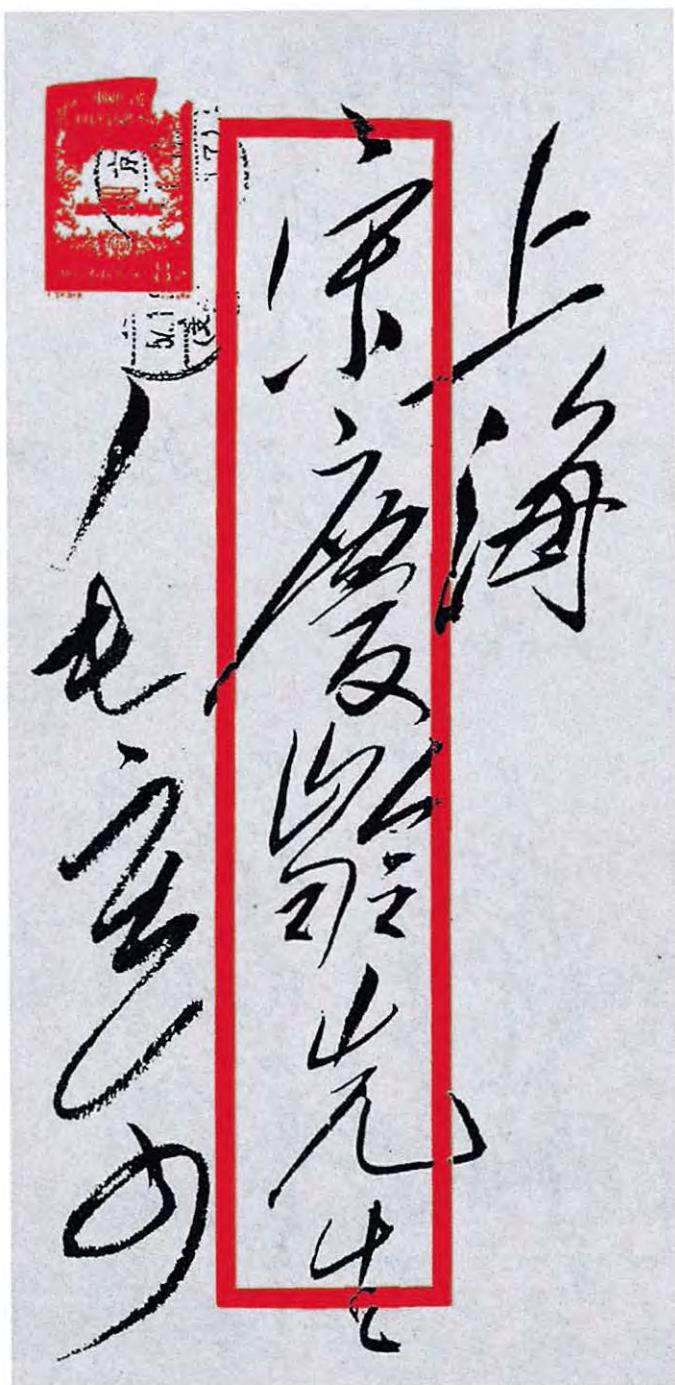
(1956年1月26日)

亲爱的大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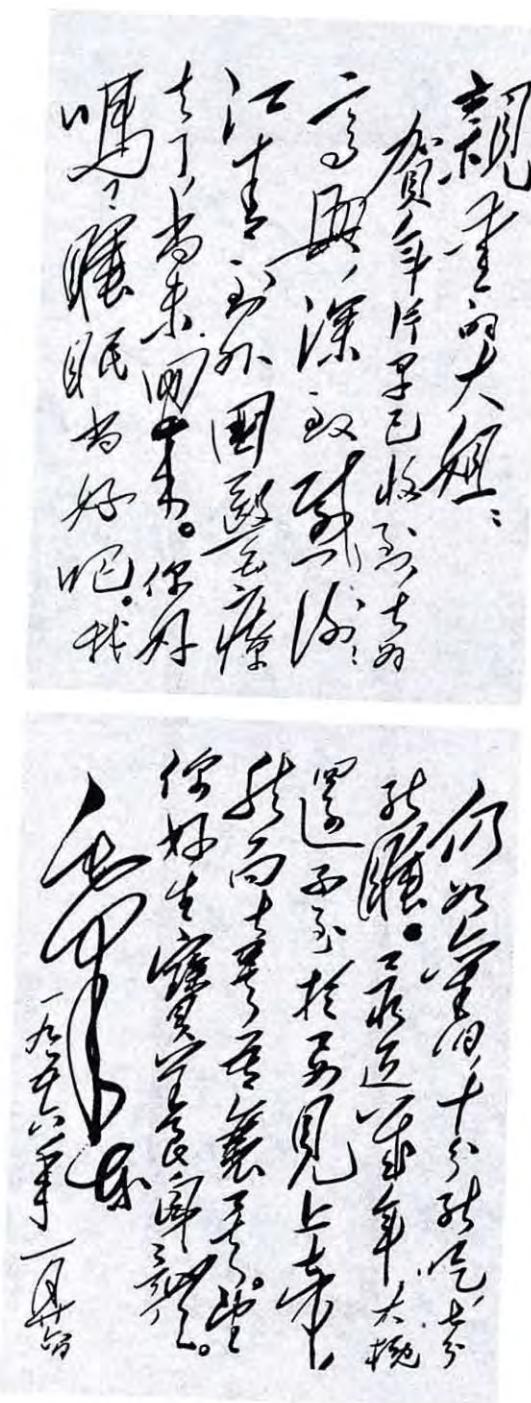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宝〈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1] 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毛泽东致宋庆龄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宋庆龄信的手稿。

给黄宗潛^[1]的信

(1956年1月26日)

黄先生：

多次惠书均已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一千元，聊佐杯水之资。

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1] 黄宗潛，1918年上半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地理教员。

黄宗洛
事与人同，均已收好，
已将之函。特此通知。
送与金环一件，咸丰
拾水之法。而
可以去病。并
嘱其勿
忘。

毛泽东致黄宗洛信的手稿。

给许志行^[1]的信

(1956年1月26日)

志行兄：

十月八日惠书早已收到，甚为感激，迟复为歉。现在是寒假，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北京一叙（到中南海找叶子龙^[2]）。暑假可去韶山。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1] 许志行，1919年冬在武汉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教书。

[2]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的 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56年1月28日)

小平同志：

此件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1]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1956年1月25日关于民革、民盟、九三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和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召开中央会议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就民主党派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等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以下意见：（一）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问题。报告说，由于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展，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这些民主党派不仅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现正在我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肯定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他们今后总的任务应当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动他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并在实践和学习中获得进一步的改造。（二）关于学

习马列主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报告说，民盟、九三学社、民进和农工民主党等以文教科学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党派，可以要求他们的成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首先从正面推动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使他们增强信心，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掌握思想武器，在此前前提下，引导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改造。（三）关于组织发展问题。报告说，这些民主党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展他们的组织，拟推动他们各自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发展组织的规划。此外，报告还对民主党派开好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改选领导成员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握手。



1956年，毛泽东会见全国人大代表时和李济深握手。



1956年，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人士在一起。



1956年，毛泽东和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在一起。

关于建立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批语^[1]

(1956年1月28日)

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1956年1月25日关于团中央准备在全国农村推广青年生产队问题给邓小平的报告上。报告说，经过征询有关同志的意见和初步研究，觉得青年生产队的形式在试办过程中确有一些积极作用，但在发展当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提出青年生产队的队员都要身强力壮、思想进步的，这样办就会使得强劳力和积极分子过分集中，影响到合作社内整个劳动组织的合理调配和其他队的生产。目前普遍建立青年生产队，条件和经验都不成熟。

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 政治报告稿的修改^[1]

(1956年1月)

—

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

—

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对周恩来1956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咎〉既往。



1956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接受全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界的代表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报喜信。



1956年1月30日，工商界代表李烛尘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向毛泽东报喜。到1956年1月底，全国各大城市和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中等城市相继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1月30日，毛泽东和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工商界代表谈话。



1956年1月，毛泽东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招待宴会上。



1956年1月底，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对此，毛泽东感到由衷地高兴。图为1956年的毛泽东。

关于检查同苏联专家、 顾问关系的批语

(1956年1月30日)

—

此件^[1]值得看一下。似须整个检查一次同各方面顾问的关系。

毛泽东
一月卅日

[1] 指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1956年1月12日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谈话的纪要。总顾问说，一些苏联军事顾问反映，中国同志目前已经不需要他们，不交给他们工作做。他自己有很多话也无处谈。彭德怀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解释。双方还就缩减顾问编制和中国军队装备现代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

刘、周、陈、小平、彭真^[1]阅，尚昆^[2]存。



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中国，为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图为苏联专家在大连造船公司。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1956年)

从一九五六年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提倡勤工俭学。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和体育活动。

关于建立空军学院的批语^[1]

(1956年2月5日)

照办。^[2]

毛泽东
二月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56年1月31日报告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为适应我国空军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空军学院。经军委研究后，拟于1957年起，以南京军事学院的空军系为基础，建立一所空军学院，培养空军大队级以上的飞行指挥干部、领航干部、参谋干部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院址设在北京西郊。

和藏族人士的谈话

(1956年2月12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好了就要成立，你们还怕吗？对土地改革赞成不赞成？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八十多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下决心，要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前藏、后藏自己内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现象，这同汉族过去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内部互相不信任或信任不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六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互相信任大为增强。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

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参观团的参观很有益处，大家应当相互交流经验。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条就是落后问题。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你们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汉族农民一样。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你们相信不相信？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国人民都从初中毕业要三十年到四十年，你们可能看得到，我们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国人民都从大学毕业要一百年。西藏人都愿意大学毕业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

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区域自治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搞了六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在汪东兴^[1]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 发展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6年2月13日)

—

汪东兴的考察报告。

此件^[2]提出了一些问题，可以一阅。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1]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

[2] 指汪东兴1956年2月11日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据省委农村工作部统计，全省初级社入社农户已达总农户的78%。春耕前，群众结合搞生产规划，已在酝酿办高级社。有的地区已经铺开，计划今冬明春基本实现高级社。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抗水灾、旱灾能力差，农用机器短缺，劳动力不足，牲畜、种子少，购买困难等。关于今后高级社的发展规划，省委打算分两步走（先试点，再扩大），但怕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如并作一步走，又担心工作缺乏经验，难以保证90%的社员增产。目前省委正在研究，还未作出定论。

二

尚昆^[1]同志：

此件请你印 100 份，发各政治局同志、农村工作部及中央警卫队约八十人，每人一份。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刘松林^[1]的信

(1956年2月14日)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2]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

[2] 得胜，即李得胜，是毛泽东在陕北时使用过的名字。

和軍事是爲先。
請你回信於收到了，我
會再寫。希望你注意身體。
我有病，好容易。當
我們好，勿以爲念。國
內社會主義改造，你那
裏是圓滿地解決了？

你本來是被派到蘇聯
國內進行考察的，因國情
性質不同，不能去。現
在好！
此致
敬候
安好

毛泽东致刘松林信的手稿。

吊唁杨树达^[1]逝世的电报

(1956年2月16日)

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转杨树达先生家属：
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和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逝世前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1]

(1956年2月19日)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2]，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3]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6年2月1日关于是否要向苏联共产党有关方面反映苏联学者在中国参观时讲的一些话给中央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2] 指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去访问广东省中山县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

[3] 尤金（1899—1968），苏联哲学家、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1956年2月，毛泽东和政协委员在一起。



1956年2月，毛泽东会见著名报人、通俗小说家张恨水，雕塑艺人张景祜，作家杜鹏程。



1956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亲切地握手。



1956年2月，毛泽东接见青年红学家兰翎。



1956年2月，毛泽东和生物遗传学家童第周、语言学家胡愈之、数学家华罗庚、社会学家费孝通等在一起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桥梁专家茅以升、化学家侯德榜等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宗教界政协委员在一起。



1956年2月，毛泽东和全国政协常委（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握手。



1956年2月，毛泽东和艺术家们在一起。



1956年，毛泽东和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等合影。



1956年2月，毛泽东接见新疆维吾尔族舞蹈专家康巴尔汉。



1956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中医施今墨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钱学森在宴会上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全国政协特邀人士卫立煌、谢无量在宴会上。



1956年2月，毛泽东和上海医学院副院长颜福庆、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浦生在宴会上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天文学家邹仪新在宴会上。



1956年，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东花在招待会上。



1956年，毛泽东和河北省安平县坚持办农业合作社的农民王玉坤在宴会上交谈。



1956年，毛泽东和桂剧演员尹羲在宴会上交谈。

转发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 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6年2月19日、20日)

—

廖鲁言同志：

此件^[2]可以转发各地。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江苏省委1956年2月10日关于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中央1956年2月20日转发江苏省委报告的批语稿上写的批语。

[2] 指中共江苏省委1956年2月10日关于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给中央和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打开了大家的眼界和思路，不断克服了各种保守思想，注意纠正了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在此基础上，分稻麦区、杂谷区、棉区、山区大组交流和总结了丰产经验：一、合理改变耕作制度，增加复种面积，争取全面增产；二、积极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兴修农田水利，增积自然肥料，改良土壤，增添耕牛、农具；三、积极改进栽培技术，从选种到收获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四、因地制宜地抓主要增产措施。会议还进行了全省高额丰产的布局，规定了有关竞赛运动的办法，并分片、分级、分等规定了不同的粮棉丰产指标。

二

刘、周^[1]阅，尚昆^[2]办。



1956年2月22日，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开幕。图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和大会代表合影。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派团赴苏联远东军区 参观演习的批语^[1]

(1956年2月24日)

照办。^[2]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2月22日报告的批语。

[2] 彭德怀的报告说：苏军总部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10名军官到苏联远东军区参观3月5日至10日举行的军事演习。经与总参谋部研究后，提出了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为团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中将为副团长的参观团人选。

关于发表郭沫若^[1]访日诗篇的批语

(1956年2月24日)

送彭真^[2]同志：

内件^[3]请交北京日报发表。其中有些草体字须先改为楷书，以免弄错。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1]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3] 指信封内装的郭沫若访日诗篇七首。郭沫若于1955年12月1日至25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这些诗是他访日期间写的。信封内的七首是：《箱根即景》《访须和田故居》《别须和田》《宫岛即景》《访博多湾》《留别华侨》《游别府》。1956年2月29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时，将《访博多湾》和《留别华侨》分别改题为《吊千代松原》和《归途在东海道车中》，又增加了《宿春帆楼》和《船入长江口》两首，这九首诗总题为《访日杂咏》。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工作 报告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2月)

—

刘、周、瑞卿^[2]再阅，在尾上加了几句。

毛泽东

发后，抄公安部。

—

可以肯定地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

[1] 本篇一是写在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1956年2月12日关于当前社会镇反工作意见的报告的批语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中央批语稿末尾加写文字。中央于1956年2月29日将广东省委的报告批转上海局、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数非捕不可的人。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审定。



1956年2月28日，来访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为毛泽东佩戴柬埔寨王国的最高勋章。

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 会议的批语^[1]

(1956年3月3日、5日、7日)

—

送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

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

毛泽东

三月三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水生动物研究专家秉志1956年2月28日为转送他给毛泽东的信而写给刘少奇的信上。秉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本篇二写在中共四川省委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1956年3月2日给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的电报上。本篇三写在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1956年3月5日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上。

二

尚昆^[1]同志：

请你电话告知上海柯庆施^[2]同志和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今年三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问他们此次会议何日召开，有无准备？

毛泽东

三月五日

三

中央卫生部

徐运北同志：

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会议应当订定下一次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议（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就可以了。



1956年3月，毛泽东和中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鲁之俊握手。



1956年3月5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加全国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医郭可明。



195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把中医的知识结合起来的号召。图为毛泽东和医药卫生界人士在一起。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

(1956年3月4日)

(一)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一九五五年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 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一百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 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 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五) 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

[1] 这是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指示的一部分。

业是二万元到三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千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二千元，小型合作社是一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元至九百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 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1]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 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 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1] 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著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的五名妇女。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 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 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 你们要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图为手工业者在踊跃报名入社。

在听取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1956年3月6日)

改进或扩充生产设备，应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解决，不应使用企业奖励联金。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当时张国焘在长辛店工厂办了一个工人夜校，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名叫李实的当校长，我还到那里参观过一次。

(当汇报到不少干部满足于现有成绩，缺乏从发展上看问题，满足于数字上完成任务，缺乏对国民经济发展及周围情况的认真研究，因而思想工作、组织工作、技术政策、干部培养都落后于发展希望时)

你会不会打麻将？打麻将要看三家的牌，还要看桌上已经打出来了什么牌之后，才决定自己打什么牌。

□□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

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苏区只剩下

个根据地，白区几乎全搞光了。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一律团结，也不是一律斗争，既不是只“团”无“斗”，也不是只“斗”无“团”。对于党内的关系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反从前的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是否主观主义会缩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当然你们是采取原谅的态度，你们说中央的领导是英明的，你们自己犯了错误。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来，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当汇报确定部长、副部长每年至少下现场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时）

对，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要常到现场去。

你们自己要办学校！



为了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抽出大量时间，向各部委了解情况，他们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图为用于听取汇报的中南海西楼甲楼。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汇报的会议室。

在听取交通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1]

(1956年3月8日)

一

□□部汇报，列了目录，一目了然，各部都要这样做才好。你们可以搞点展览会，把各种交通工具展览一下。学院学生太少了，可怜得很。将来可能有一两千万吨船，中国可能突出。世界海船吨位，我国不到百分之□，这表明我国太穷。公路少，应多修。地方工业和修公路都要发挥地方积极性。

二

运价高，束缚生产力，工农业产品交换不起来。“一长制”刺眼得很，怎么不改个别的名词？需要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降低运价问题，财政方面打小算盘不妥当，运价

[1] 本篇一是在汇报基本情况时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与今后措施时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在汇报远景规划时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在汇报其他几个问题时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高，束缚生产，税收减少，结果害自己。工农业都在发展，两方面交流，靠运输纽带，中间路太狭，通不过去，发生矛盾，就影响两方面发展。过去地方公路标准太高，修不起来。

有许多事，开始听好像有道理。学习苏联经验要结合实际才行，脱离实际就错了。

地方交通会议后，情况有转变，可见领导还是重要的，不然六亿人有六亿个方向，不得了。开片会办法很好，一年一次，也可一年开两次，先规定会期，下边就动起来（如消灭血吸虫病）。各种铁、木轮车改为胶轮车，要赶快改。

人力车已合作化百分之二十五。合作化当然要得，怎样化法要注意，有些先挂个号也可以，不挂心不安，能组织就组织，不能则不勉强。

对资本家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现在资本家愿意不愿意？现在小资本家愿意，工人愿意，大资本家随潮流走。现在问题是怎样安排。中国资本家特点之一是许多资本家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思想不一定比高岗、饶漱石、潘汉年坏，比陈光、戴季英坏。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私有财产是否三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给他们福利基金。

福建省委提的对个体车船改进意见，你们可以拿几个社试一下。每个省试一下，再下决心。

肃反，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真反革命是有技术的，已经知道了，在次要岗位上亦可控制使用。

灯光装猪法是怎么回事？可见强迫命令不行，猪尚不能，何况人乎？

三

一九六七年达到□□万吨船，这还像个样子。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

四

机关汽车统一管理方针很对。汽车，主要看需要，要与工农业相适应。

交通和轻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们会挨骂的。

地方运价降低问题，开个会先商议透，看准后再决定。

简易公路，要个标准，各地乱修，则不得了。

你们对的意见我都支持，我已经说过把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关于撤回驻越南军事总顾问 改派武官的批语^[1]

(1956年3月12日)

刘、周、陈、邓^[2]阅，退彭，照办^[3]。武官人选，要是很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3月7日报告的批语。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的报告说：为了逐渐减少我国在越南的军事顾问人员，增派越南军队所需要的技术人员，拟将在越南担任军事总顾问的韦国清撤回，另派一名驻越南武官担任两国的军事联络工作。

毛泽东等吊唁贝鲁特逝世的电报^[1]

(1956年3月13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同志：

惊悉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是波兰人民敬爱的领袖，也是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卓越战士。他的逝世，对于波兰人民和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极大的损失。

我们深信：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生前的光辉事迹将永远鼓舞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的电报，吊唁贝鲁特逝世。贝鲁特，即波莱斯瓦夫·贝鲁特（1892—1956），波兰工人党创建者之一，曾任波兰共和国总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人民共和国全国阵线全波委员会主席。1956年2月他率领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会后因突发心肌梗塞，于3月12日午夜在莫斯科逝世。

我们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波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永恒友谊而努力。中国人民将永远同波兰人民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3月13日于北京

和长征、艾地的谈话^[1]

(1956年3月14日)

长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毛泽东：因为我怠工，所以推迟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周恩来：《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

艾地：《毛泽东选集》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对第一卷、第二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

毛泽东：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

艾：《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文章^[2]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

[1] 这是谈话的一部分。长征（1907—1988），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1923—1965），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 指《战争和战略问题》。

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

毛泽东：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

艾地：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

毛泽东：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同志也曾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1]

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2]但到二十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

[1] 波立特（1890—1960），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4年3月29日，他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2] 参见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

艾地：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

毛泽东：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

还说一点，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实，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到离开延安四十

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我是去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关于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 示范章程的命令

(1956年3月17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3月17日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

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 拉科西的信

(1956年3月28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敬爱的马加士·拉科西同志：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了。

我们了解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困难，并且愿意尽可能帮助你们克服困难。根据你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可能，我们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增加供应你们价值三千万卢布的货物。我们已经指示我们对外贸易部立即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商谈供应货物的品种和数量。

谨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对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 汇报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3月30日)

—

刘、周、彭真、小平^[2]阅，尚昆^[3]办。

毛泽东

三月卅日

—

中央最近分别听取了工业、交通、农林水和财金贸各部党组的汇报，在今后几个月内中央拟分别听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

[1] 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三

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⑩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

[1] 中共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的内容，共有十项：（一）目前各省、市、区的主要经济状况。（二）本省、市、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三）对全国和本省、市、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意见，本省、市、区的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四）当前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竞赛高涨的情况，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各方面的潜力表现在哪里，如何具体地在生产、基建、运输、流通各方面发掘潜力。（五）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中央和地方在事业、财政、计划的体制划分的意见。（六）地方党委对地方各种企业和中央国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加强领导，如何进行统筹安排。（七）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八）私人工商业、私人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中的问题和意见。（九）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分工的意见，对工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的意见。（十）对资金积累、负担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见。提纲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向中央的汇报，应当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对其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中央的这个汇报提纲于1956年3月30日发往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 联合指示的批语

(1956年3月30日)

刘、周、彭真^[1]阅后，退小平^[2]照办。

毛泽东

三月卅日

国务院春耕指示^[3]（此件已退习^[4]办）于四月一日见报，此件^[5]应待一二天，可于四月三日或四日见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国务院1956年3月27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发表于1956年4月1日《人民日报》。

[4] 习，指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

[5]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这个指示1956年4月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1956年3月29日至4月6日，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接见与会代表。



1956年4月，毛泽东和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交谈。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及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成员。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和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团长李慧英握手交谈。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4月2日、4日)

—

少奇、小平^[2]同志：

社论^[3]已由陈伯达^[4]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5]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加写的题下说明。本篇四至十一是毛泽东1956年4月2日至4日多次审阅这篇文章时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文章发表于1956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56年4月4日毛泽东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5]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

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

照此^[1]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毛泽东

四月四日上午八时

—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1] 指毛泽东1956年4月4日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作的修改。

四

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

五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六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无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七

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八

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九

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

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内，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

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十一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 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

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对彭德怀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 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56年4月2日)

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中央各同志意见，在他们看过文件后，即会告知你。

毛泽东
四月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3月23日为报送关于军委扩大会议结果的报告和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简要报告上。彭德怀1956年3月6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主要讲了以下问题：第一，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第二，战略方针问题的提出；第三，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第四，关于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问题；第五，关于作战指导上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二部分关于国防建设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第二，动员准备工作；第三，建立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

同意将南京军区划分为 南京、福州两军区的批语

(1956年4月4日)

刘、周、朱、小平^[1]阅后，退彭德怀^[2]同志。

此件^[3]看过。同意划分为两个军区。叶飞^[4]的省委书记是否可以不再兼了，何人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请小平和谭震林^[5]商定告彭。

毛泽东

四月四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 指彭德怀1956年3月28日关于建议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军区（辖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军区）和福州军区（辖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给毛泽东的报告。

[4]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省长。

[5]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接受丹麦大使格瑞杰生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6年4月10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递交的丹麦国王所签署的国书，并且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自从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丹麦王国建立邦交以来，贵我两国的关系沿着友好的道路向前发展着。今年二月，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贵我两国协议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几年以来，中国人民杂技团，中国古典歌舞剧团曾经赴丹麦演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丹麦，中国工农业和艺术展览会也曾经分别在哥本哈根举行。丹麦的工会和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1955年丹麦工商界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进行了贸易谈判，扩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这些友好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而贵我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加强，是有助于促进国际间的和平的。

我深信在贵大使的努力之下，贵我两国之间久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必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贵我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必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丹麦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你为发展中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增进中丹两国经济、文化联系的工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予以充分的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且祝贵国元首健康。

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1]

(1956年4月10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你在北京呆多久了？

金·阿·格瑞杰生大使（以下简称格）：已经有三年了。我很喜欢北京。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获得发展。

毛：我们两国之间过去没有打过仗，将来会打仗吗？

格：不会的。

毛：你们不是参加大西洋联盟的国家吗？要是美国打起仗来，你们怎么样呢？

格：那不会的。我们两国之间将来也不会打仗。中国作为世界的大国而出现，使和平得救了。

毛：中国不过是个马马虎虎的国家，地方大，力量并不强。

格：中国地方大，有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而丹麦只有四万多平方公里。

毛：中国地方没有那么大。如果每一平方公里都像你们国家那样发达就好了。

格：中国还有六亿人口哩！

毛：中国是不会向别人翘尾巴的。如果中国翘尾巴，你们可以

[1] 这是毛泽东和丹麦驻华大使金·阿·格瑞杰生谈话的一部分。

批评。

格：那自然不会的。至于丹麦，地方虽小，但论单位面积，还经营得不坏。我愿提请主席注意，中国将派两个代表团去丹麦考察农业和合作社。

毛：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我们也愿意向冰岛学习。

格：冰岛只有渔业，农业很少。

毛：渔业就值得学习。

格：希望中国代表团去丹麦考察回来后介绍一下丹麦的情况。

毛：需要在报上介绍介绍。你们老呆在北京，知识也受到限制。我想，驻北京的使节们每年五一和十一以后（就是春耕、秋收以后），可以组织两次旅行，到中国各地去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格：这个主意很好。

毛：我们也要学一学你们是怎么办合作社的。

对中央就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 通知^[1]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6年4月11日)

—

彭真^[2]同志：

略有修改^[3]，主要是发到县级，于五月份收集意见上报。

毛泽东

四月十一日

—

除此以外，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

[1] 指中共中央1956年4月11日关于征询对蒋、日、伪战犯的处理意见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各

党组的通知。通知说，目前对于在押的蒋、日、伪战犯，需要作适当的处理。中央经过总的利害权衡，觉得似以从宽处理为好。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这种处理，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4、5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在各地讨论之后，中央当年没有作实行特赦的决定。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对上述罪犯实行特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日发布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4日特赦释放了首批战犯23名。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 即本篇二。这是毛泽东在中央通知稿末尾加写的一句话。

关于请中宣部讨论对待苏联科学的 教条主义态度问题的批语

(1956年4月18日)

张际春^[1]同志：

此件^[2]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3]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毛泽东

四月十八日

[1] 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1956年3月14日摘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3月3日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哈格尔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的 谈话纪要^[1]

(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听取第一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18日)

一、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2]、捷克斯洛伐克^[3]就不要建设了。

二、从邓子恢^[4]同志的谈话中可以得出两条教训：一条是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中百分之九十

[1] 1956年4月18日至24日，毛泽东连续6天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谈话纪要。

[2] 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49年10月在苏联占领区内成立。当时属社会主义阵营。1990年8月31日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签定“统一条约”，统一为一个国家——德国。

[3] 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属社会主义阵营。1993年解体，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

[4] 邓子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的人收入应有所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不是不搞公共积累，而是搞得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农民个人利益，秋后不能增加收入或增加很少。

再一条是抓先进经验，即增产经验。抓住推广先进经验，即可抓住一切。

因此，要抓住先进经验、农民个人得利（与工人增加工资意义一样）这两条。

三、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还要看看这两年农业实际的增产情况。总之，要向苏联学，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计委应指定三四个人，不做别的，专门分析限额以下的建设项目。这里面一定有味道，看看都是些什么。

听取第二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19日）

一、对沿海工业的利用问题。

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

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二、农业增产问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步骤要慎重，不能破坏了深耕细作。

我对邓子恢同志的总结，提了两点意见：（一）增加农民个人收入；（二）抓先进经验。先进经验包括技术政策、副业等等。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如建球场、俱乐部等）太多。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曾说到农民有钱，但有钱是有限度的，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年年个人收入有所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副业也是错误。

应该把积累、个人收入、发展副业、纠正命令主义这些问题都纳入规划之中。为此，四月底要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

三、“两个万岁”问题。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四、石油钻探进尺，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千万公尺太少了，应搞得更多些，来一个革命加拼命。

五、统计生产效率时，可以搞两个数，一个是按生产工人计算，一个是按全员计算。

听取第三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20日）

一、过去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

为什么英国、美国、日本建设了呢？为什么苏联建设了呢？当

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列宁反抗了第二国际^[1]，才取得了俄国的革命胜利。我们抵制了第三国际^[2]的错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当然，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国际不革命，第三国际有一时期革命太过火了。

不管谁放的屁，都要分析一下是香是臭，决不能随风倒。

二、重工业是重点是无争论的，但如果把轻工业和重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轻工业定少了，那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建设工业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不要上杜勒斯^[3]的当，他不希望我们改善人民生活，而希望我们多搞军火。

三、拖拉机到一九六二年拥有二十万台，是否多了些？对拖拉机的使用要慎重。

[1] 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初期基本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分化，以列宁等为代表的左派同第二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陷于破产。

[2]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1943年6月解散。

[3] 杜勒斯(1888—1954)，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任内推行实力地位政策、战争边缘政策、反共政策和艾森豪威尔主义，敌视新中国。

三个五年计划开荒四亿亩就算是最多了。

四、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就无法处理。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听取第四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21日)

一、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还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人总是比机械会做工作，广东潮州每亩产量二千二百斤，有的国营农场每亩产量一百多斤，一拖一拉一百多斤，不拖不拉二千二百斤。好像瓦尔加对中国科学院的考察团提出过中国是否用拖拉机的问题。

二、战时和平时的互相转化问题。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

三、专业与协作问题。老铁路修理厂（如长辛店），可以考虑改为制造厂，只担任一小部分修理任务。通用的机器（如钻探机），非机械部门可否制造一小部分，还可研究。

四、地方工业问题。应立两条法律：一让地方搞，二不拿走。地方工业，中央部门在技术上、规划上、供产销平衡上还要管。

五、群众的事业由群众自办，也要加以限制，要分期分批来办，不要七年到十二年的事在一两年内解决。

六、汇报得好，下功夫摸了一下，总结了经验。过去没有这些经验，现在总结了这些经验。可以发到各部各省市去。今后每年都要你们汇报一次。

听取第五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23日)

一、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机器自给率，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五十，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七十，第三个五年百分之九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几个提法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应改为“除个别边疆地区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巩固”二字还值得考虑。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就要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加上“基本上”三字。

苏联于一九三六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时才宣布工业化，我们一九六七年应争取达到三千六百万吨。

三、猪一九六二年可达三亿头，一九六七年可达五亿头，那时仍是粪肥的主要来源，争取农村中每人一口猪。

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五、人家看我们是缺点的“白”和“穷”，恰恰是我们的优点。

我们没有什么包袱，受帝国主义压迫达百年之久，翘不起尾巴来，这也可能就是谦虚的来源。我们既无帝国主义的包袱，又无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包袱。

六、茂名页岩油厂，两期一百万吨，投资十三亿元。可计算一下收回成本的时间，再下决心是搞二期或搞一期。

七、内昆线应争取一九五八年修到昆明。

八、张白线，京太线，中咸线，经济意义不大，可以暂不修建。

听取第六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24日)

一、工厂已有很多在沿海城市，可以不再建大厂、新厂，而建小厂和适当扩建旧厂则是可以的。

二、山东沂源的钢铁厂可以考虑放在临沂以北地区。

三、小学下放不必一定两年，也不必规定一律，有的二年，有的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等。

小学下放是国家与合作社的矛盾（有两个矛盾：即国家与合作社、合作社与社员）。

四、一九六二年粮食消费水平只增加百分之一点二，一九六七年不动，是值得重新研究的。因为增了产，不论城乡都会增吃，故增百分之一点二可能太少了。

配给制不要轻易取消，对备荒备战都有很大好处，这是全民性质的计划供应，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五、六大矛盾问题：

(一) 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些资。

(二) 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

(三) 国防、行政与经济、文教的矛盾：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

(四) 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福利。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的关系。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

(五) 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

(六) 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五分之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他们占了两条。金银财宝很多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国防费在第三个五年计划里应大减，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考虑再减少一些。国防工业是否生产那样多的产品，也值得研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国防费和行政费占的比重很小，而我们的比重就大得多。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些？我总想从国防费和行政费上打点主意，多搞些经济建设。可以再看两年，看国防费、行政费可否再减。

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最复杂，农村中往往是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干部社会主义积极性太高，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则更多注意个人利益，这就是矛盾。

财政一节，说还想从农民多要一些，很值得研究，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税一百七十亿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税加小学下放共达三百七十七亿元，已经加了很多。对农民总要经常照顾，不要一下使农民收入大为减少。去年就是一个大教训，多收入六十亿至七十亿斤，全体农民都骂我们。我们减少了征购，实行了“三定”，又加上丰收，因而改骂娘为鼓掌。总之，要小心谨慎，多要些，还可以多想些办法，如薄利广销等。

六、最后结论：

就照你们的办，因为你们说的有道理。凡是在汇报中我们谈到的问题，你们要注意调整一下。

计委要和各部、各省市见面是好的，他们比我们的知识多些。

部（包括委员会）、局、委（省市）、厂每年都搞一次报告（今年算第一次）。厂里的报告不能都看，可以抽看。去参观之前，可先找厂长来谈两次，这样就会熟悉起来。

人民代表大会去年七月开，今年六月开，明年可否提到五月开。

八大时，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由总理^[1]报告好（富春^[2]同志提议由总理报告）。

[1] 总理，指周恩来。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成立的电报

(1956年4月20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位委员：

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为印发徐运北^[1]关于 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6年4月20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廿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

毛泽东

四月廿日

[1]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徐运北1956年4月18日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有14个省、市的党政代表参加。会议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的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报告还附有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验方一份。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报告时，还加了题目“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和题下注“（这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1956年4月18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值得大家一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注）”。

给毛宇居^[1]的信

(1956年4月20日)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借纯珠^[2]兄之便敬致问候之意。

即祝兴居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2]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兄弟。

给毛笔珠^[1]的信

(1956年4月20日)

笔珠兄：

纯珠^[2]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1] 毛笔珠（1895—1973），名泽田，毛泽东的堂兄弟。

[2]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兄弟。

给毛泽荣^[1]的信

(1956年4月20日)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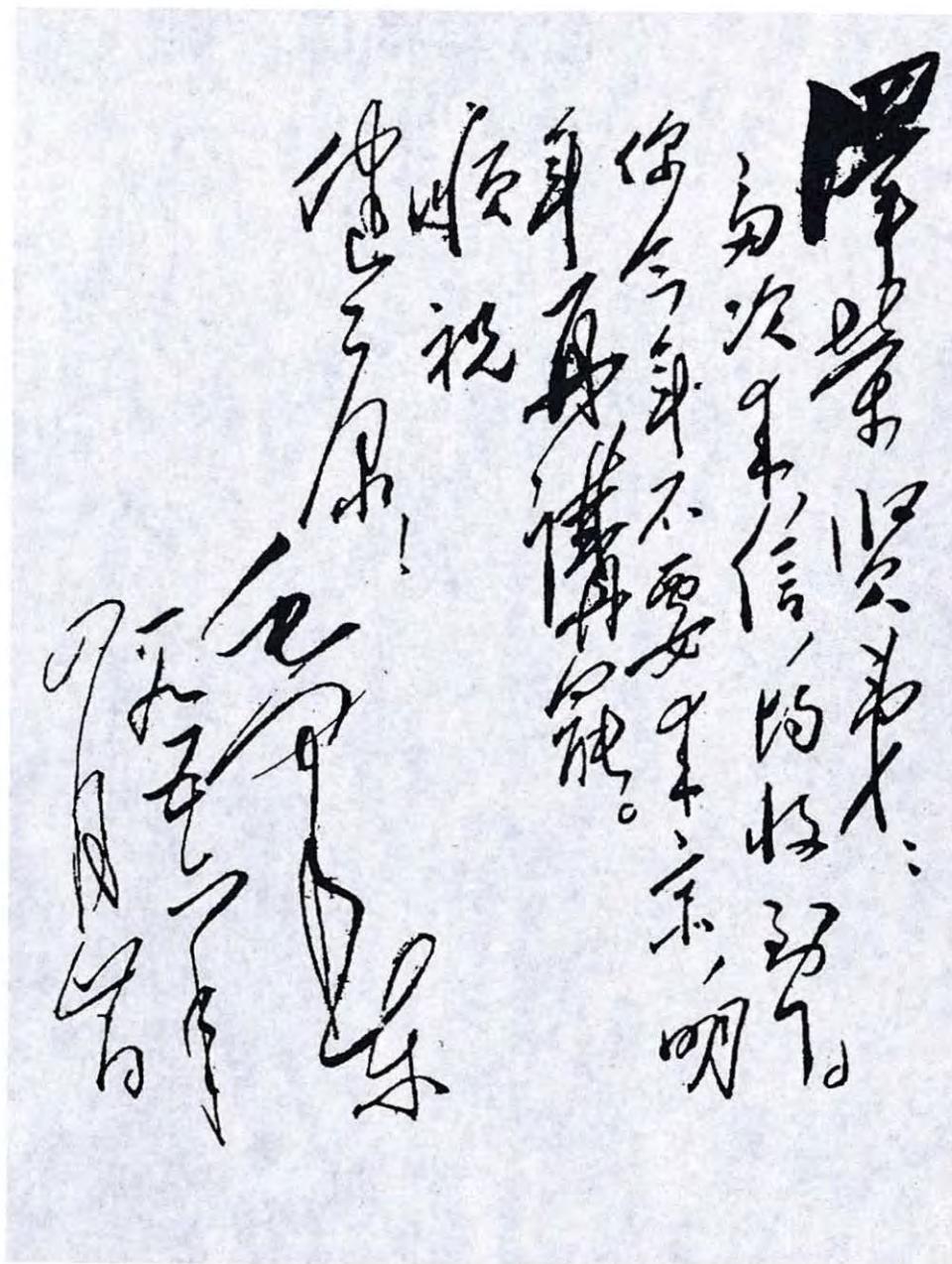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1]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毛泽东致毛泽荣信的手稿。

论十大关系^[1]

(1956年4月25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

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

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

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

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

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1]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

[1] 义务交售制，是苏联1933年至1957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一项主要办法。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

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

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

“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

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

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

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

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少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

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

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1]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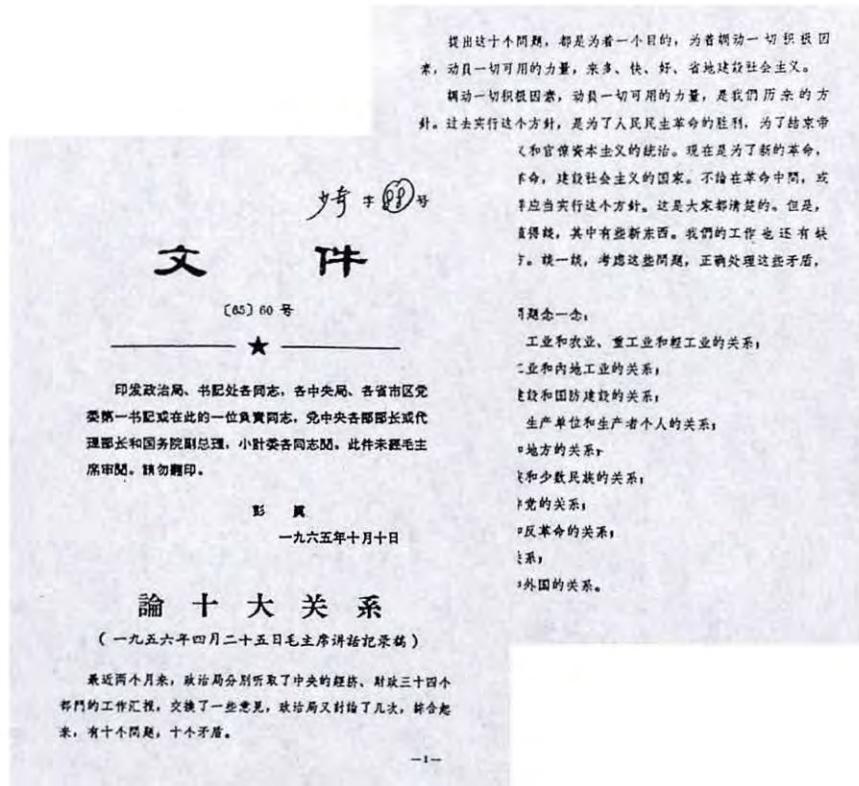
[1] 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明朝宦官刘瑾的亲信奴才。

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图为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部分）。

颁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的命令^[1]

(1956年4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2]，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

[2] 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56年4月25日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决定还对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原则和有关事项作了规定。

倡议实行火葬^[1]

(1956年4月27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方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

[1] 在这篇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本篇题下的年月日是毛泽东签名的日期。按照签名顺序，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136人。1959年2月10日，陈云给杨尚昆写信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意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56年4月28日)

很多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我就不要讲很多了。

第一，党内生活问题。七届四中全会^[1]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2]那一种破坏性的煽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

[1] 七届四中全会，指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中的成绩，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会议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2]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他与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

[1]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問題的决议案，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大会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左”倾路线^[1]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2]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3]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张国焘的右倾路线。鉴于这些教训，我们开展了一个整风运动^[4]，接受好的东

[1] 第一次“左”倾路线，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1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1928年4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2] 第二次“左”倾路线，指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等又制定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3] 六届四中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4] 指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

西，批评和纠正错的东西，主要口号是又团结又斗争，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1]是有关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2]等来进行纠正。在纠正的时候，我们仍然给各根据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3]，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这种过于分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适用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不适用了，不能再像过去

[1] 第二次王明路线，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7年12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右倾错误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在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2] 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3] 指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那样各自独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有些问题，比如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如果说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研究好，似乎我们也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说了，现在由国务院组织一个机构，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拟一个方案出来。

第二，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第三，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的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恐怕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出一个草案来。

我请同志们注意，请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听说，现在到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中央部门处理问题拖延不决，这两点相当普遍。地方要解决问题，到中央部门就是见不到人，连处长都不容易见到，有些问题拖了几年不得解决。应当检查这个问题，看用一种什么方式，又能见到人，又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一个通知^[1]，说地方有权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里是说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了。也许你们会制止得多了一点，但并非出于坏意，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信任现在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给了你们这个权。这个权不能给地委，也

[1] 指1953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

不能给县委，只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因为省委、市委和区党委这一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总之，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的东西。

第四，修改党章问题。陆定一^[2]同志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

[1] “五多”，指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

[2]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问题。是哪一个同志在这里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是发展了命令主义，合作社什么都得听命令。过去是个体经济，就是搞自由主义。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自由能活下去吗？我就不相信。比如你们回到家里就可以随便谈谈，跟你们的夫人、小孩讲一点笑话。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严肃是同不严肃相对立而存在的，没有不严肃哪有严肃呢？纪律是对没有纪律而来的，是对自由主义而来的，不搞一点“自由主义”怎么行？总是要有一点“自由主义”的。现在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如果反对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个家庭设一个检查长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严肃，都不搞一点自由。

第七，全国平衡问题。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

[1] 这是毛泽东1951年给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

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上海的货不运到四川去，你李井泉^[1]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货统统到北京来销，就要把北京的货都打倒。所以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经济工作问题。我们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这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中央同你们每年来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来汇报一次。但是总还要找一些委、部、局、厂，搞一些典型来研究一下，因为我们也不大懂。请各位同志切实研究一下，着重研究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1] 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给贺果^[1]的信

(1956年4月29日)

培真兄：

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九日

[1] 贺果，字培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省贵阳市教育局局长。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

(1956年4月29日)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与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中国从前是半殖民地，现在也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是最吝啬的，根本不愿意帮助别的国家建立工业，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

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现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要作斗争，同时要团结他们，要给他们利益，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给什么利益呢？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

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我们给他们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年了，我们还打算再给他们三年的时间，一共九年。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生产不中断，市场

[1] 这是毛泽东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上群众需要的商品不短缺，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稳定。现在我们革民族资产阶级的命，取消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资本家，给他们上课、开会，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并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没有痛苦的，不是没有斗争的。我们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工作。不但工人对资本家作斗争，资本家家庭里的进步子女也同父母作斗争。这样，六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就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了。

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了安排，使他们逐步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是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在逐步变为国营企业。资本家要比封建地主有用得多。对地主我们只给一些土地，让他们自己种地，变为农民，现在不给他们选举权。但对资本家就不同，他们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

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可供中南美洲兄弟党作参考。你们可以考虑在革命前对民族资产阶级多做一些工作，争取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对帝国主义是不满意的，你们可以联合他们，争取他们，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如果你们能让全部农民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再加上争取了资产阶级，你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在目前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将来的社会解放运动中，你们的希望会很大。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被剥削者同不剥削别人的独立生产者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很重要的。此外，无产阶级还要有另外的一种联盟，这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宗教人士以及开明地主

的联盟。半殖民地国家要争取获得独立和解放，没有这种联盟也是不行的。

总而言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对于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有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整死。批评并不等于一推了事。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同的是，有的犯得多一些，有的犯得少一些；有的改正得早一些，有的改正得晚一些。我们党内曾经有过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无情打击”的偏向。人总是有情的，何况是对同志呢？“无情打击”只会在党内造成对立，闹不团结，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打来打去弄得大家不和气，党的事业不兴旺、不发达，同志们大家都不高兴。后来我们党纠正了这种偏向，帮助在改正错误的同志，能团结的力量越多越好。

犯过错误的同志有了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强。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下一次有可能会犯错误。

大敌当前，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国际上也一样，没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包括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进步力量。我们可以同你们相配合，牵制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力量。帝国主义到处都插一手，我们就每一处都抓住它一点，这样它就难

以行动了。我们的胜利也是靠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例如朝鲜战争^[1]期间，美国只能把它的兵力的三分之一放在朝鲜和东方，另有三分之一放在欧洲，还有三分之一在美洲。它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就帮助了我们，要不然我们怎么能胜利呢？怎么能在三八线^[2]上停战呢？在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都是这样得到各国的帮助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有一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的中国人在巴西吧。对于在外面的中国人，我们的方针也是争取，争取一切愿意回头而不帮助美帝国主义的人，不管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的罪，我们都可以赦免他们。我们希望他们回来，回来看看再走也好，回来找工作也好。蒋介石如果愿意也可以回来，但他很顽固，不肯回来。

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我们也尽量争取，不管对它过去侵略中国的仇恨有多么大，我们对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前高级军官也争

[1] 1950年6月，朝鲜半岛三八线北南两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发生战争。随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大举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迫使它于1953年7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以朝鲜国土上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

取。一批过去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军人要求来中国看看，我们说可以。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十几个人的代表团，在五一节以后来。这是因为今天日本的地位和过去大大不相同了，现在它实际上是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了。过去日本欺负别人，而今天美国欺负它。美国虽然同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协定，可是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是极不巩固的。

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各国同志和人民的支持。

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听说同志们在这里都很认真，肯钻研。认真学习是很好的，这是战胜敌人取得成功的一种保证。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弄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因为事情都有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我们应当把中国的这两个方面都给外国人看。你们已经看到了好的一面，还应该再看看不好的一面。

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

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是八分功劳、两分错误，同志们不会通过；说他是六分功劳、四分错误，也不会被通过。但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

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那篇文章^[1]是由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六七次的修改才发表的。

犯错误是难免的。谁不犯错误呢？难道帝国主义犯错误犯得少吗？算账总有正负，对错误即负的必须批评，成功的经验即正的必须保护。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唯物论的话。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认识的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

[1]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的话。

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

减少国防费用多搞些经济建设^[1]

(1956年4月)

—

重工业是重点，这是没有争论的，但如果把轻、重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如果轻工业定少了，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赫鲁晓夫^[2]同志说得对，不要上杜勒斯^[3]的当，他不希望我们改善人民生活，而希望我们多搞军火。

国防工业原定一九六四年满足战时需要量，也可考虑再推迟一年，即到一九六五年。因为和平区域是逐渐扩大的趋势，东自菲律宾，西至法国。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1956年4月20日、21日、24日先后听取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插话的一部分。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3]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二

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

三

国防、行政与经济、文教的矛盾，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

国防费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应大减，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考虑再减少一些，国防工业是否生产那样多的产品，也值得研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国防和行政费占的比重很小，而我们的比重就大得多，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些？我总想从军事、行政费上打点主意，多搞些经济建设，可以再看两年，看国防、行政费可否再减。



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大会上。



1956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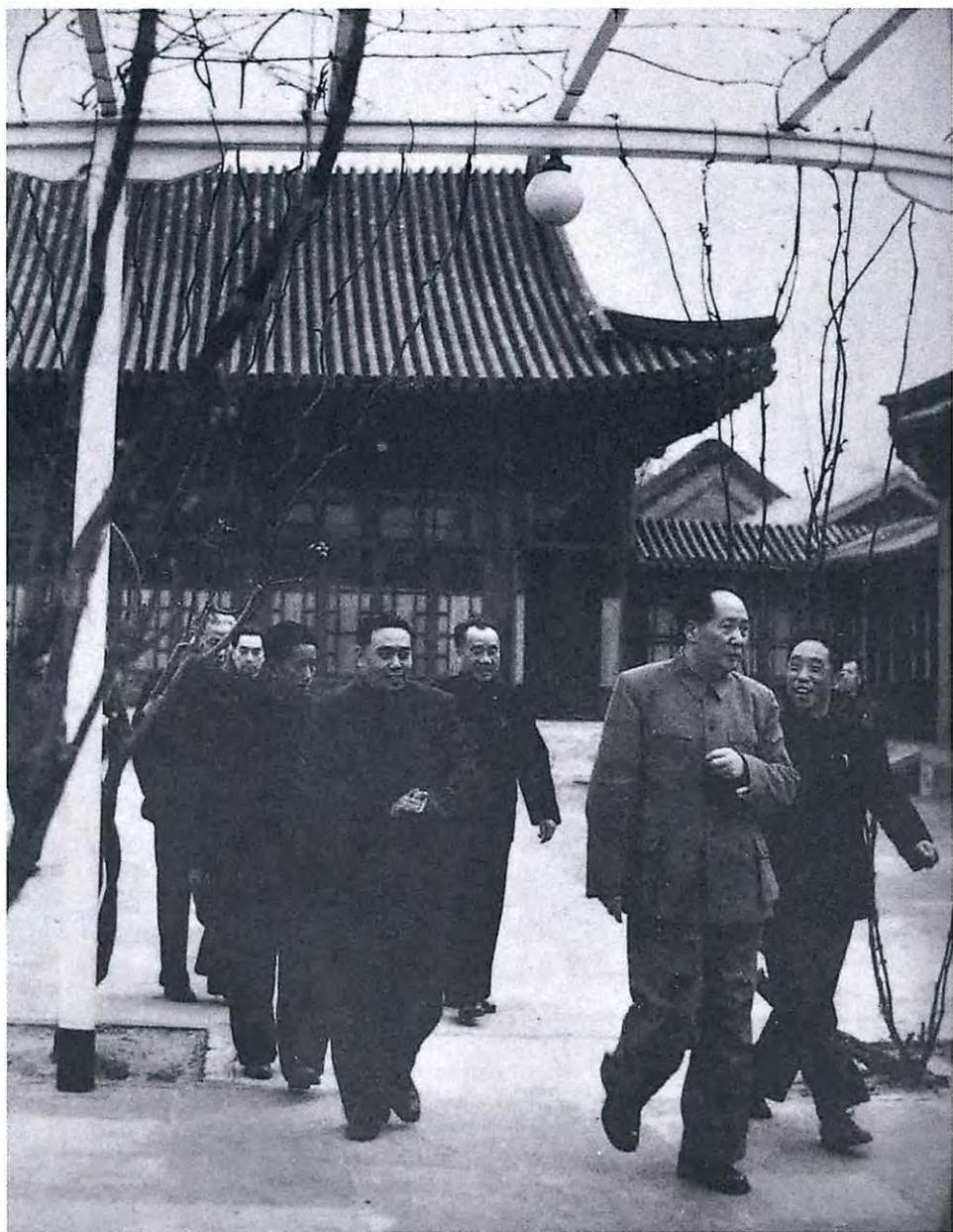
1956年4月，毛泽东等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



1956年4月，毛泽东等接见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6年4月3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接见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主席团和港澳工人代表团及外国工会代表团。



1956年4月，毛泽东在邮电部部长朱学范的陪同下接见参加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代表。



1956年4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出席新华社国内分社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956年4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出席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的全体同志合影。

关于斯大林问题^[1]

(1956年4月、10月)

—

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集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

斯大林是希望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

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6年4月在苏共二十大后不到两个月，先后对米高扬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1956年10月23日接见苏驻华大使时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1956年10月30日接见苏驻华大使时谈话的一部分。

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1]

(1956年4月)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毛泽东

[1]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并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发出贺电。

慶祝西藏自治区成立
毛澤東題

毛泽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题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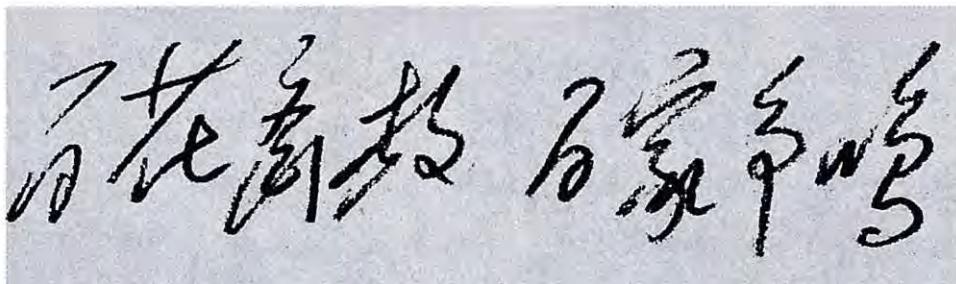
(1956年5月2日)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1]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战国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2]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康英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

[1] 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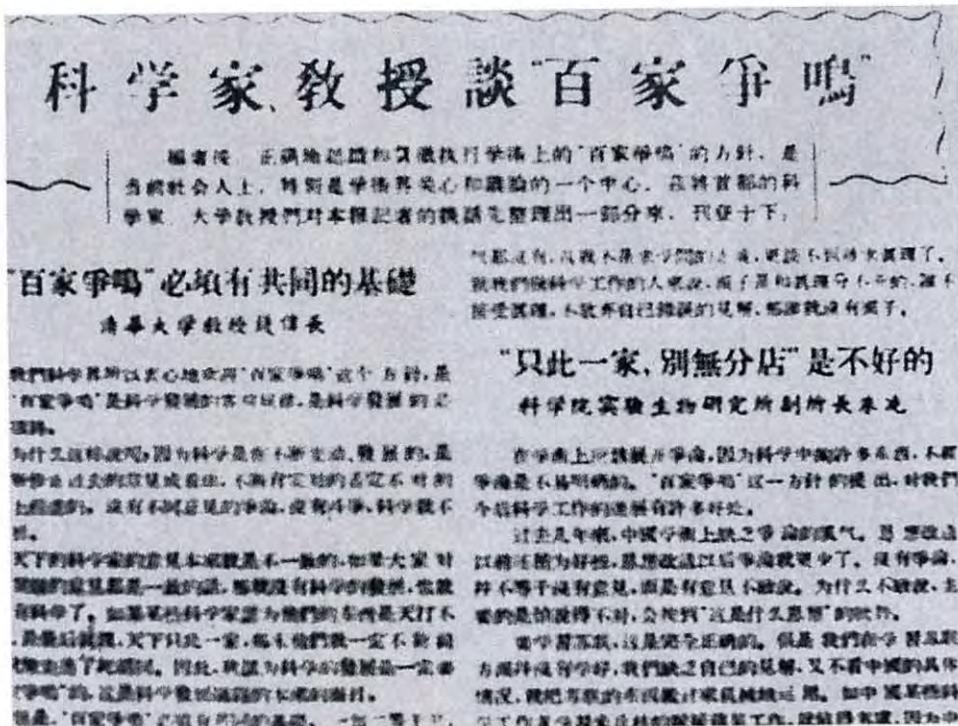
[2] 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创始人。

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1]、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手书“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1] 李森科（1898—1976），农学家，苏联生物学中李森科学派的创始人。曾任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反对作为遗传学基础的基因理论，排斥、压制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曾对中国农业及相关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在全国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受到热烈欢迎。图为《光明日报》刊载的《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

中央转发中央代表团关于 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 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6年5月8日)

—

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

此件^[1]发给你们参考。西藏方面前往康区的考虑〈察〉团，不久就会到来，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乱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如果他

[1] 指中央代表团党组1956年4月29日关于当前西藏政治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中央代表团自北京出发的同时，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拉萨，在喇嘛、贵族上层中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恐惧，怀疑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和代表团的来藏是来搞改革的，对这两件事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冷淡。经过召开上层分子座谈会，广泛地进行拜会、访问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各种活动，宣传中央的政策，解释误会，揭露谣言，局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已胜利闭幕。估计再继续进行一些工作之后，拉萨的局势可进一步安定下来。报告还谈到，达赖提出派人组成代表团去四川藏区，协助当地党政进行宣传和安抚工作，我们已表示同意。

们愿意到成都和北京走一趟则更好。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

—

请四川省委和西康党委注意：拉萨方面所说引起叛乱的四条原因，请按实情加以分析，对于即将到来的拉萨考察团予以符合情况的说明——中央注。^[1]

[1] 中央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拉萨对四川藏区叛乱发生的原因有多种传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叛乱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四条原因引起的。本篇二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说的这四条原因后加的一个批注。



1956年5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五一庆祝会上。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十大关系。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公布关于县、市、市辖区、乡、 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 问题的决定的命令

(1956年5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5月12日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 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1956年5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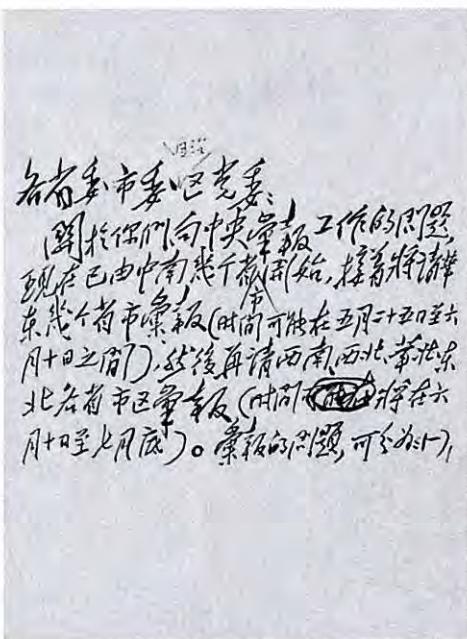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关于你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由中南几个省市开始，接着将请华东几个省市汇报（时间可能在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日之间），然后再请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区汇报（时间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底）。汇报的问题，可分为：（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以上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七年的或者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中央各部管的为辅。写成书面文件，字数不拘，依内容决定，长的可以有一万字，或者两万字，甚至更长些，短的可以只有几千字。此外还有：（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盐民问题，港澳问题）。以上各项，每一个问题写几千字

即可，均要分开写，各成篇幅，不要连在一起。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工業（重工业、輕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
地方管的）；（二）交通運輸（陸水空並代
的和接續的）；（三）商業（內貿、外貿、供
銷合作和私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四）財
政和金融；（五）幹部（即
教育工作）。以上各項都應作一些歷史的
和現狀的敘述，並有計劃地列上來。對十二年的
遠景規劃，以圖為主，地管的或希望由
地方管的為主，中央各部管的為輔。寫成
書面文件，字數不拘，依內容決定，長的
可以有一萬字，或少兩萬字，甚至更長些，短
的可以只有幾千字。此外還有（六）統計

（七）
總問題，（一）財政革命和金融問題（這
是新黨安排）；（九）農業、安排問題，
（十）少數民族問題（多此問題的地方別累）
（十一）其他特殊問題（例如廢除的軍委
和偽眷問題，漁民問題，土匪問題，港
澳問題）。以上各項，每一個問題寫幾
千字即可，均要細寫，成篇幅，
不要連在一起。以上共有十幾個題目，
不可能在一次準備好和報紙完，
可以分為兩次或共三次準備好和報
紙完。希望都經過你們的審議會加以

討論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
完善也不要緊。彙報的時候除第
一書記應未之外，可以帶些材料備用
助手稿。以上各問題，重金放在第一
至第六各項，而以第一項為主要問題
步，第一項準備好了，即可彙報一次。
彙報材料中要有材料有論述，要突
出本此詳中央工作手稿（或工作中的缺
點錯誤，揭露矛盾並提出解決意
見。不成就向意見也可提出。真付彙
報時間，請和你們商定。

中央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的手稿。

写在湖北省财贸工作汇报提纲 后面的文字^[1]

(1956年5月)

资本家〔企业〕国『家』有化慢一点：

- (1) 抓住他们的尾巴；
- (2) 可得息钱；
- (3) 有时间，我们主动一点。

经验：

人事与业务的安排要迅速；

经济改造要逐步来。

[1] 毛泽东的这些文字，写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关于湖北省财贸工作的汇报提纲（草稿）最后。在提纲封面上毛泽东写有“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廿日”的字样。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乘机抵达广州，在广州白云机场和机组通讯长柳昆尚握手。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乘专机到达广州后在机场和工作人员合影。



1956年5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等人陪同下视察广州造纸厂。



1956年5月，毛泽东在参观新中国工业建设。



《毛主席视察广州造纸厂》(中国画)



《毛主席和造纸厂工人在一起》(油画)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 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1956年5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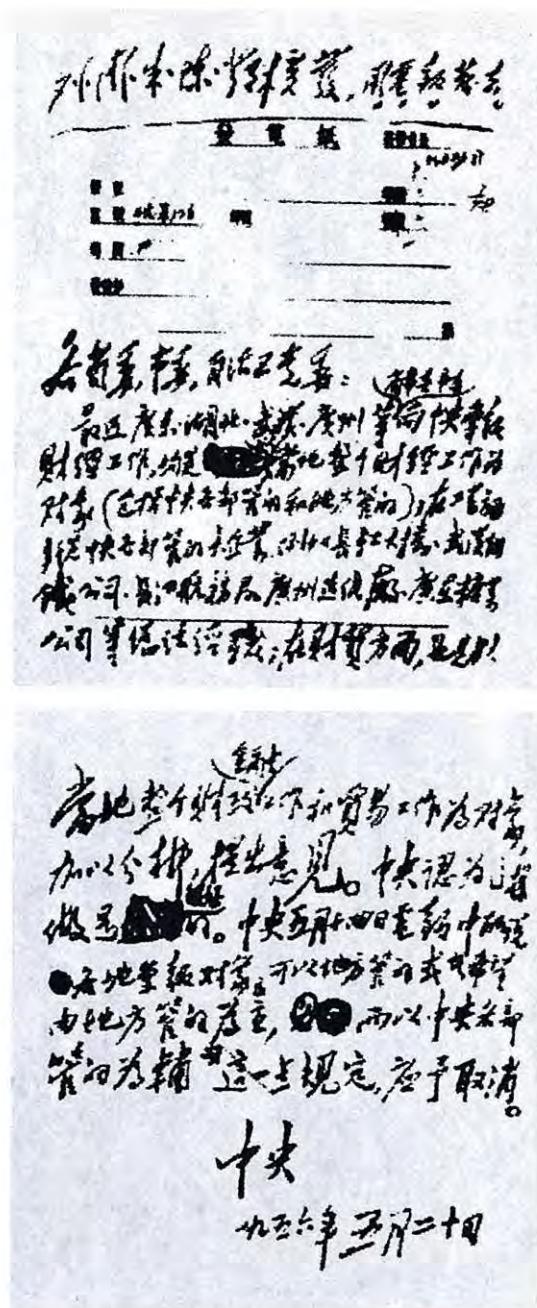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1]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1] 即中共中央1956年5月14日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的手稿。



1956年5月30日，毛泽东在武汉汉口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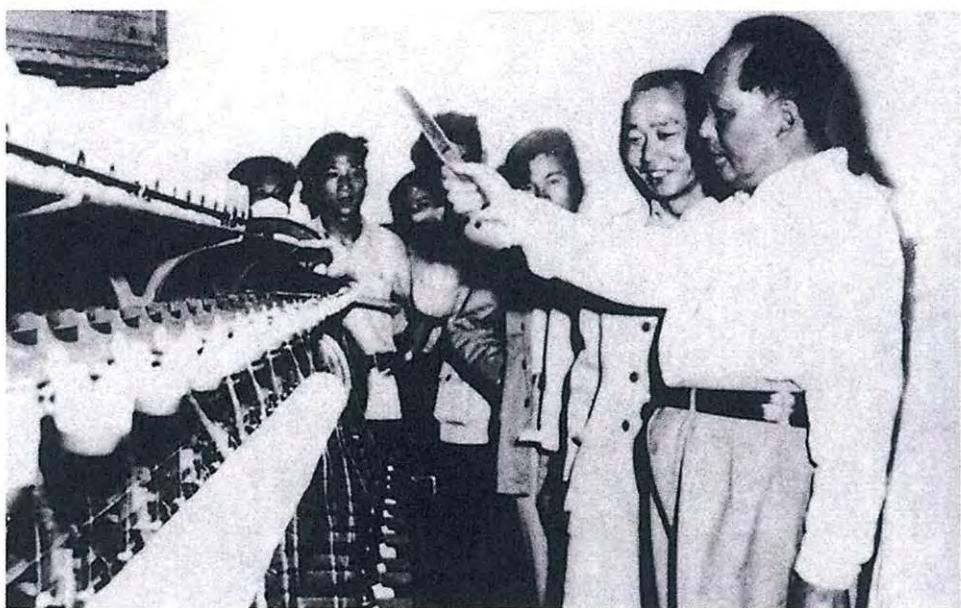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和水利专家研究长江大桥的设计等事宜。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一厂，了解生产和工人生活情况。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在武汉国棉一厂向前来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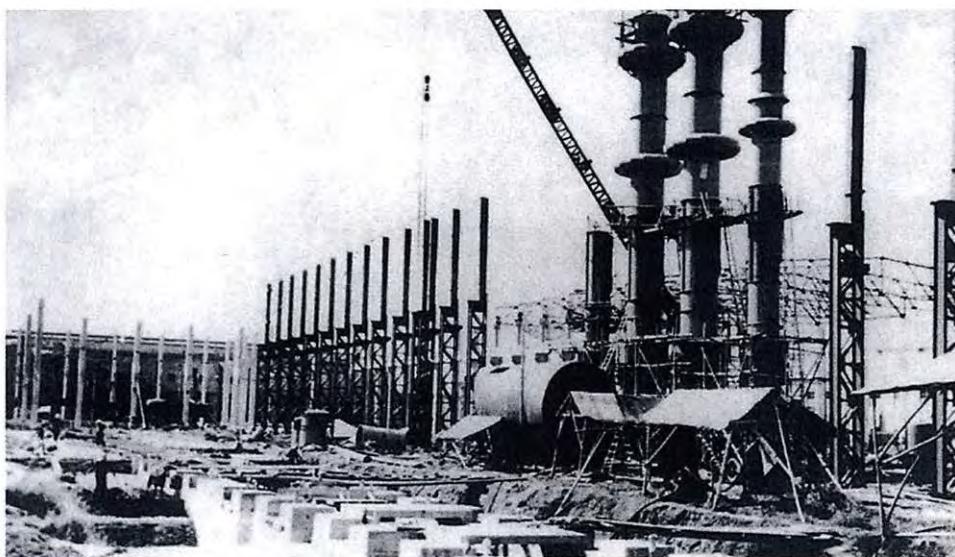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在武汉国棉一厂棉纺车间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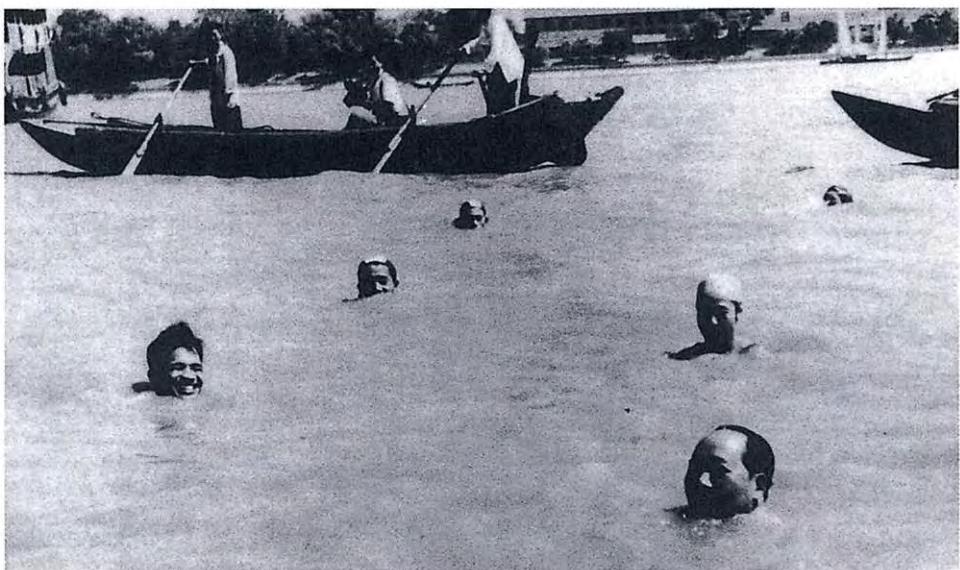
1956年6月，毛泽东在磨木车间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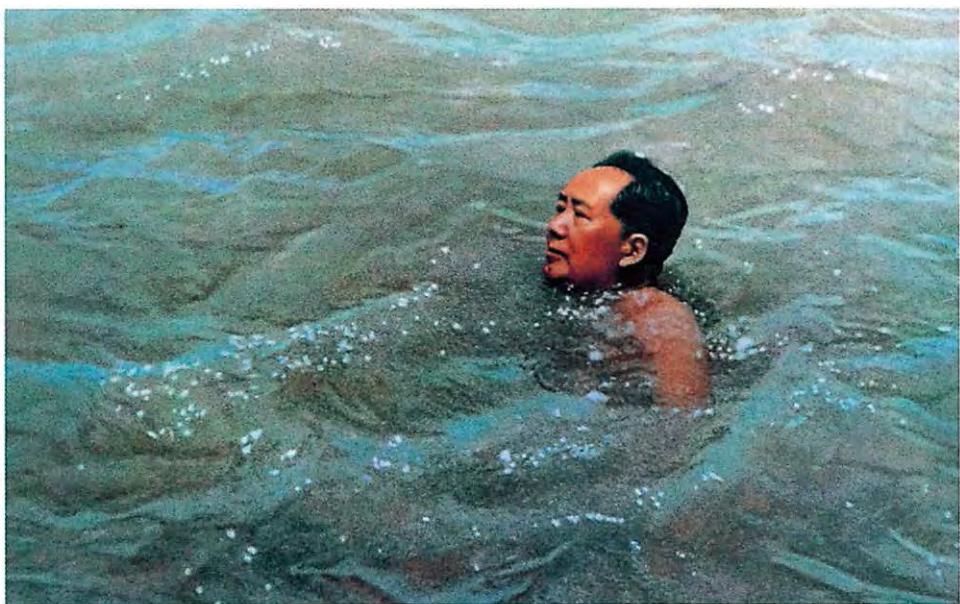
1956年6月，毛泽东在磨木车间向工人陈维新询问工作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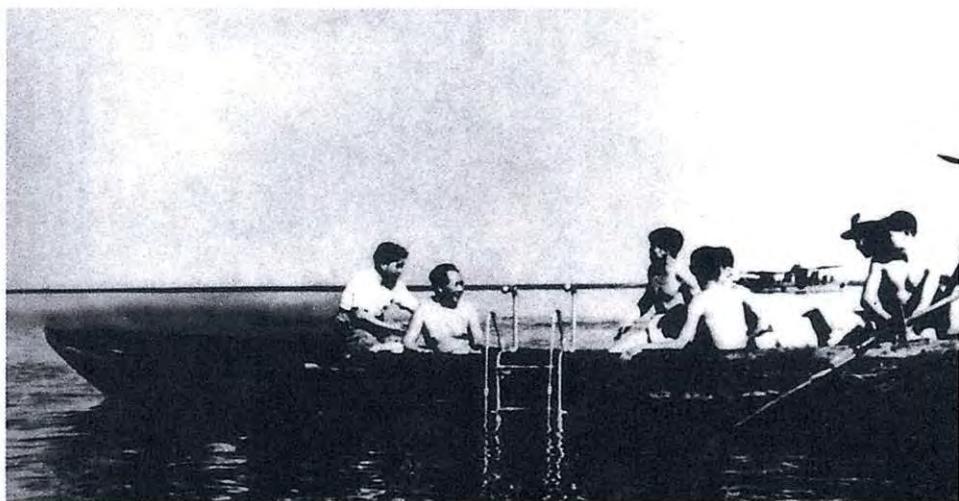
1956年6月3日上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正在筹建中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图为当年正在筹建中的铸造厂吊装冲天炉。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是在木船上和随行人员谈笑风生。



1956年6月，毛泽东和武康轮工作人员的合影。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文的批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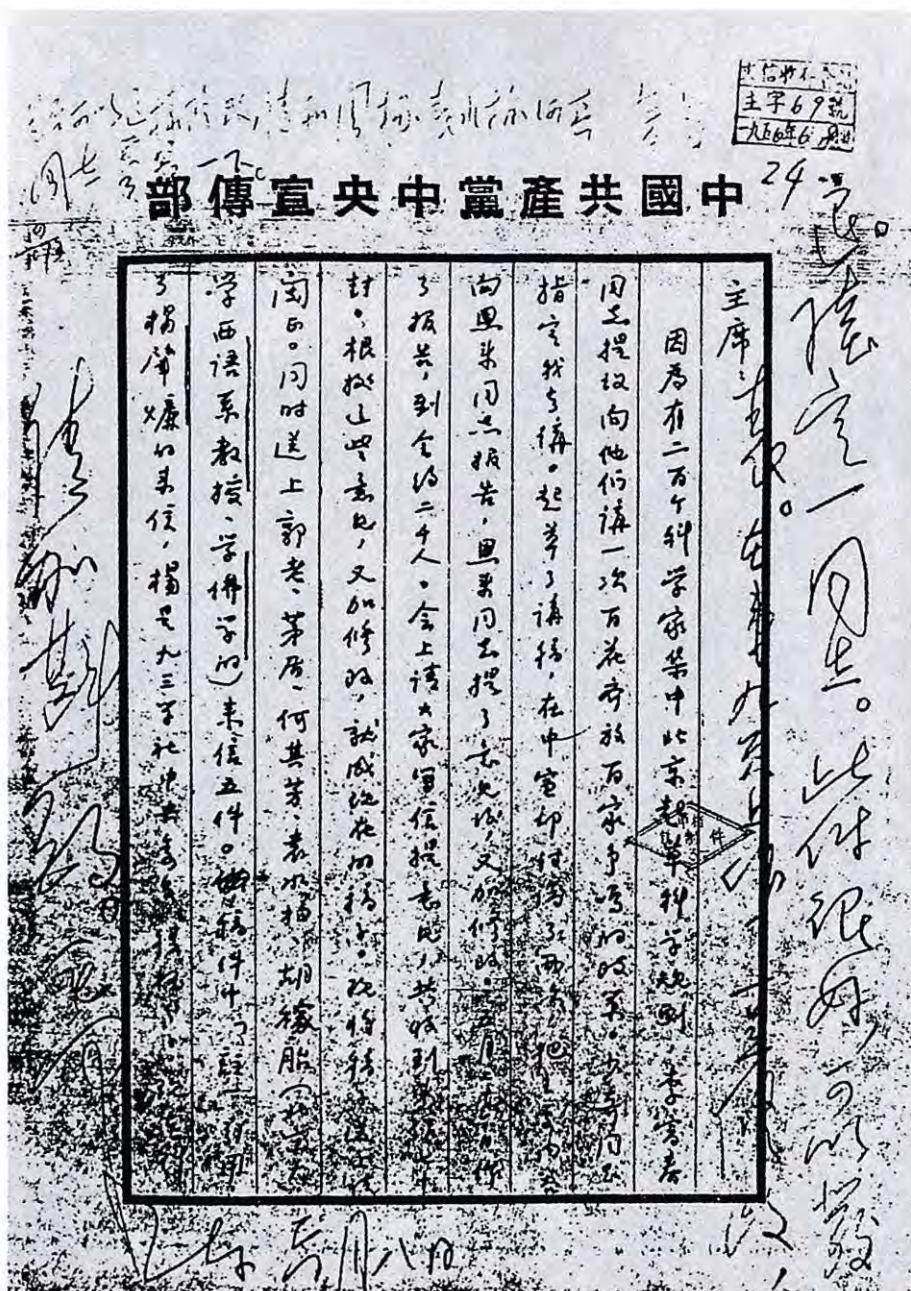
(1956年6月8日)

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

毛泽东
六月八日

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等同志商量一下。

[1] 这个批语写在陆定一1956年6月7日为送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因为有二百个科学家集中北京起草科学规划，李富春提议向他们讲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少奇同志指定我去讲。讲稿起草后，中宣部讨论了两次，后又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5月26日在两千人的会上作了报告，会后收到来信70封。根据这些意见又加修改，成为现在的稿子。同时送上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来信五件。关于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提了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将这段删去。但因为这一段的影响是好的，所以仍旧保留。1956年6月13日，这篇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在怀仁堂举行报告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双百”方针。图为6月8日，毛泽东在陆定一报送讲话稿时所附信件上的批示。



1956年6月，毛泽东接见海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时和张学思亲切交谈。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6年6月13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和贵国总统对我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的好意和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寻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所有邻国执行睦邻政策。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兴地看到，中国同巴基斯坦自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的贸易文化交流和相互友好访问正不断地得到发展。

我国政府和我本人欢迎阁下的新任。我们珍视阁下在过去一年多来为加强中巴两国友谊所作的努力，并且愿意在这方面继续给阁下以充分的协助。

祝阁下在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贵国元首健康！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1956年6月14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等会见参加制定规划的科学界人士。左起：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朱德、陈云、聂荣臻、邓小平。

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 一处带原则性修改的批语^[1]

(1956年6月22日)

可以这样修改。

毛泽东
六月廿二日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1956年6月21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的信中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修改稿中，第十四条加了一句“必要的时候，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这是比较带原则性的修改，请酌是否合适。彭真转报刘少奇时写的信中说，“我觉得改得可以。但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的社员，与鲁言、总理电话商后，觉得还是用公益金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不给土地报酬为好”。刘少奇表示“拟同意照这样修改”。毛泽东看后，在“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一句旁边批写：“可以这样修改”。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章程时，将这句话改为“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应该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章程于1956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6年6月15日至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接见出席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



1956年6月，陕西省兴平县农民代表许敬章把丰收的小麦献给毛泽东。



1956年，毛泽东和王国藩亲切握手。

接受罗马尼亚大使尼古拉·乔洛尤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6年6月28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国家。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罗马尼亚人民得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解放以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罗马尼亚人民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几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合作和兄弟友谊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一切都是好的^[1]

(1956年6月28日)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末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1] 这是毛泽东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谈话的一部分。

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我跟苏联同志说，过去他们犯过错误，今后还会有错误，他们不大相信。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很大的错误。我们党内有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高岗的右倾反党的机会主义，今后还一定会有错误，还会有如高岗等等的人。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关于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示范章程的命令

(1956年6月30日)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56年6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6月30日

对《人民日报》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1]

(1956年6月)

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社论讲反右不到半年，就认为反右成绩很大，估高了。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1]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刘少奇命令陆定一由旧中宣部的人写成，刘少奇、陆定一审阅发表的。后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



1956年6月，世界著名的和平人士黎巴嫩东正教大教主尼冯·萨巴来中国访问。7月1日，毛泽东接见了他。

水调歌头·游泳^[1]

(1956年6月)

才饮长沙水^[2]，
又食武昌鱼^[3]。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4]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5]。

[1] 游泳，1956年6月，毛泽东曾由武昌游泳横渡长江，到达汉口。

[2] 长沙水，毛泽东自注：“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

[3] 武昌鱼，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里化用。武昌鱼，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鳊鱼，称团头鳊或团头鲂。

[4] 极目楚天舒，极目，放眼远望。武昌一带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楚国的范围，所以作者把这一带的天空叫“楚天”。舒，舒展，开阔。柳永词《雨霖铃》：“暮霭沉沉楚天阔。”毛泽东在1957年2月11日给黄炎培的信中说：“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5] 宽余，指神态舒缓，心情畅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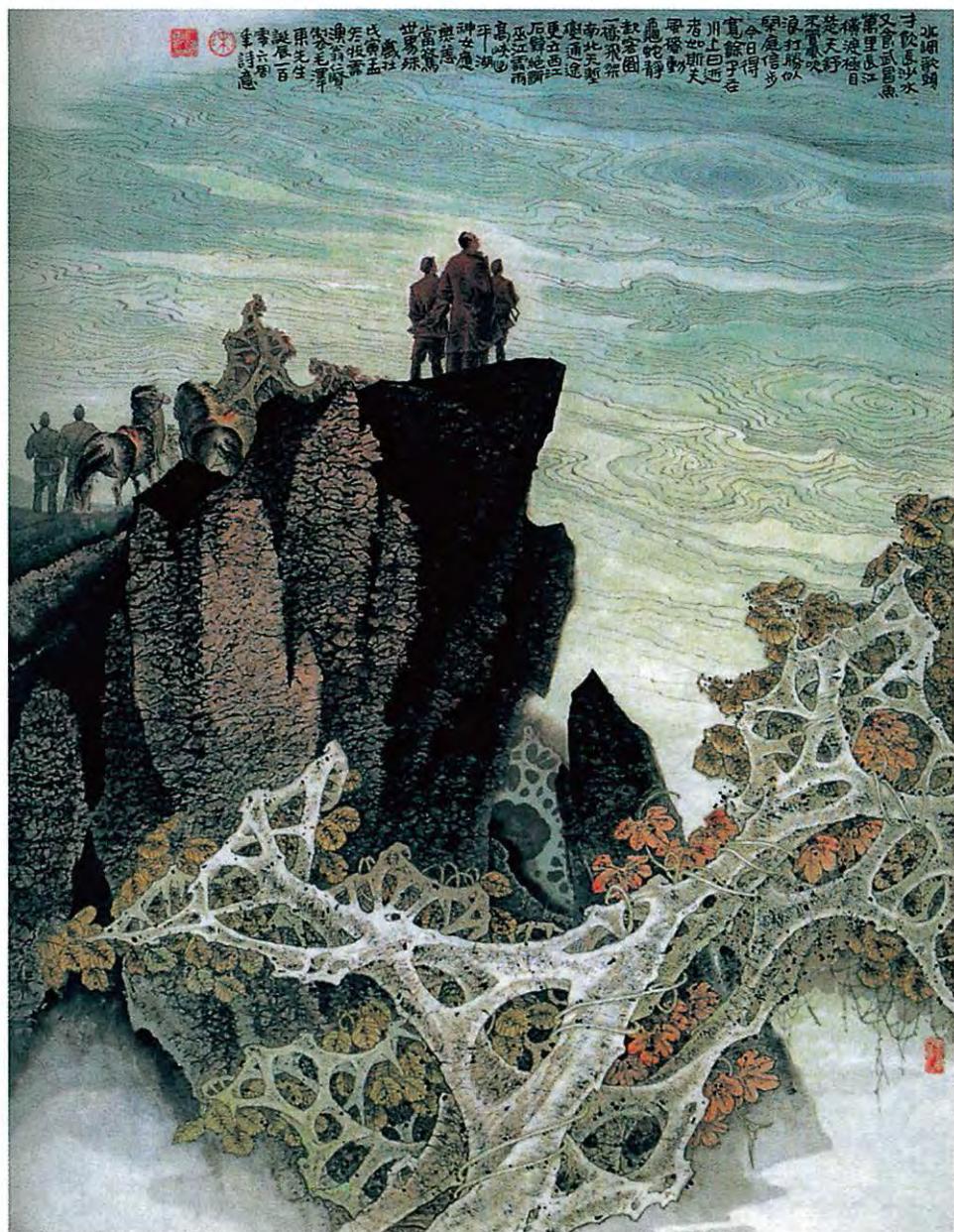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1]
天堑^[2]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3]

[1] 一桥飞架南北，指当时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1958年版《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毛泽东曾将此句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经毛泽东同意恢复原句。

[2] 天堑，堑，沟壕。古人把长江视为“天堑”。据《南史·孔范传》记载，隋伐陈，孔范向陈后主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虜军岂能飞渡？”

[3] 更立西江石壁……当惊世界殊，将来还打算在鄂西川东长江三峡一带建立巨型水坝（“西江石壁”）蓄水发电，水坝上游原来高峡间狭窄汹涌的江面将变为平静的大湖。到那时，巫山的雨水也都得流入这个“平湖”里来。巫山上的神女当然会健在如故，她看到这种意外的景象，该惊叹世界真是大变样了。巫山，在四川省巫山县东南。巫山形成的峡谷巫峡和上游的瞿塘峡、下游的西陵峡合称三峡。巫山云雨，传楚宋玉《高唐赋·序》说，楚怀王在游云梦泽的高唐时曾梦与巫山神女遇，神女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这里只是借用这个故事中的字面和人物。



《极目楚天舒》(诗意图)

一九五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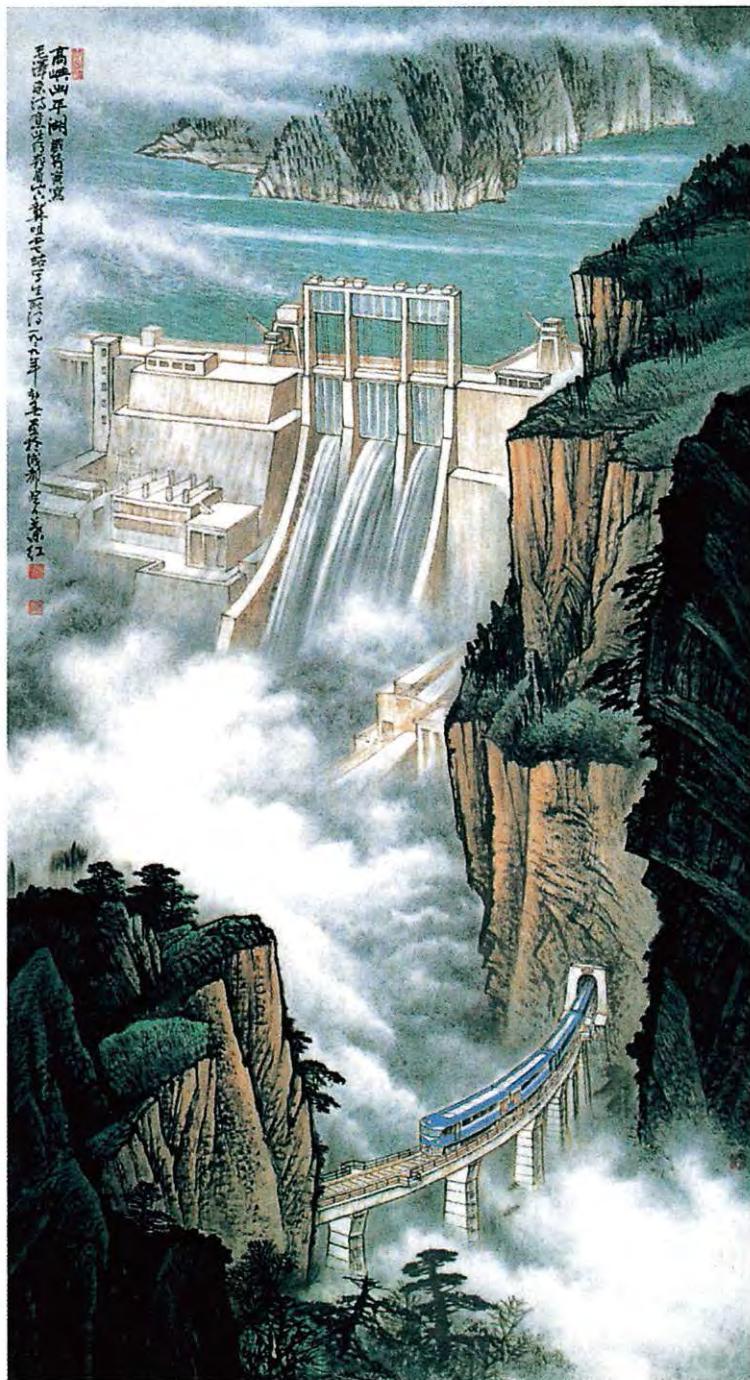
水调歌头·游泳
毛泽东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遥看魏武挥鞭，猶同楚天
競。浪遏飛舟，急流勇退，猶似
列陣信步。今日同歸覲。

游泳
水調歌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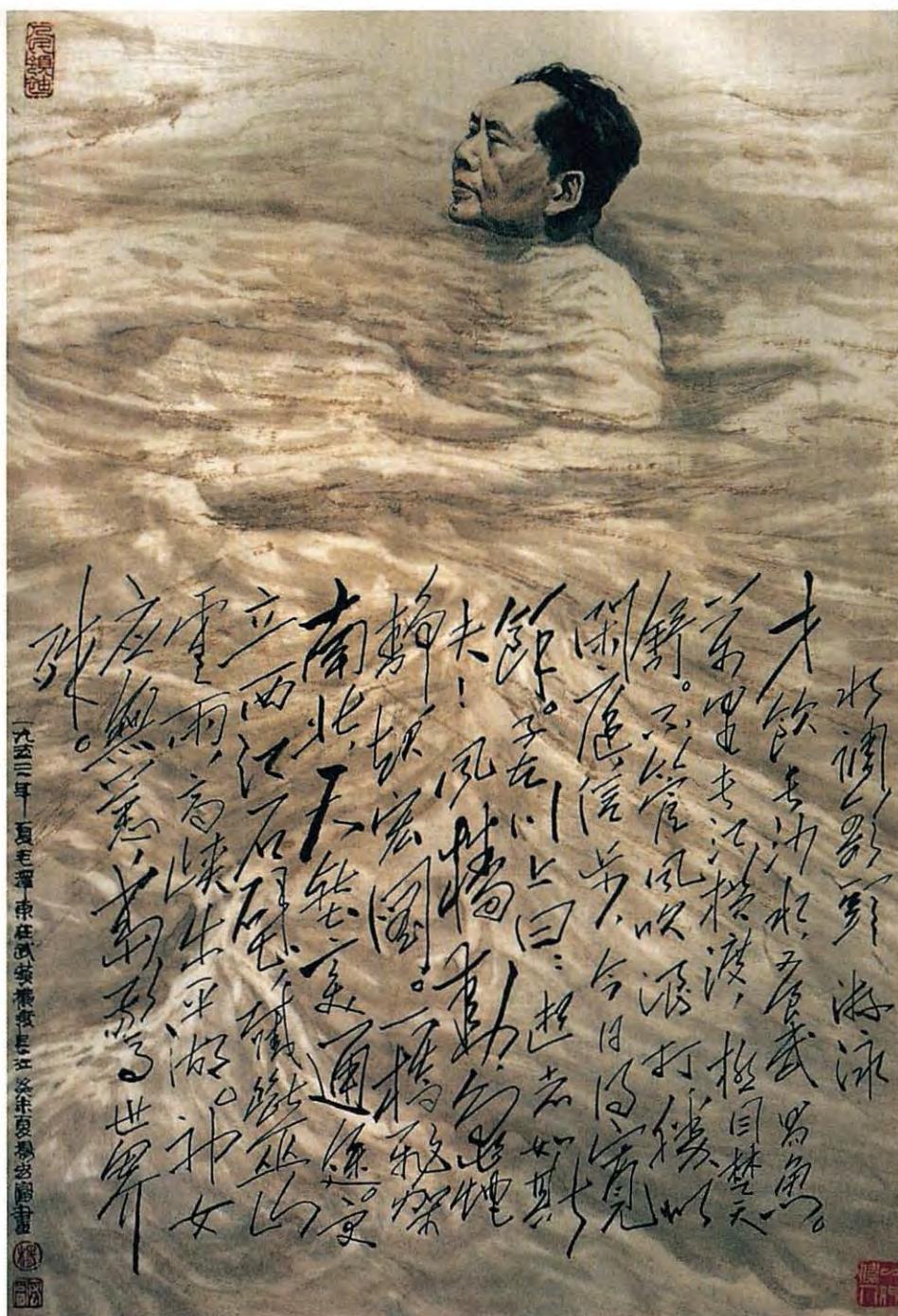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水调歌头·游泳》。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油画)



《高峡出平湖》(诗意图)



《畅游长江》(中国画)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十五周年的电报^[1]

(1956年7月9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达·阿吉尔毕希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們謹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統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三十五年来，蒙古人民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并且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对加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对于兄弟般的蒙古人民的成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达·阿吉尔毕希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就感到万分高兴。

祝蒙古人民在和平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中蒙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7月9日于北京

关于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 组织条例的命令

(1956年7月9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7月9日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7月9日

关于国庆阅兵问题的批语^[1]

(1956年7月13日)

刘、周、朱、陈、彭真、小平^[2]阅，退彭^[3]办。
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1956年6月13日关于今年首都国庆节阅兵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提出，国庆由谁阅兵问题，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今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究竟如何，请中央确定。报告还提出，近年来，国庆节阅兵所发布的命令内容大体相同，今年阅兵时拟不发布命令，是否可以，请中央决定。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

(1956年7月1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你们，中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斗争，很同情你们。恐怕只有帝国主义不高兴，也只有美帝国主义，英国可能还好一些。怎么样？在美国干涉你们的时候，英国采取什么态度？

阿本斯（以下简称阿）：英国看起来没有表示态度。在安理会上，对危地马拉要求制止帝国主义干涉的提案，英国投了弃权票，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

在事件发生时，有一艘英国商船正在危地马拉港口运货，被美国大使馆操纵的空军飞机打沉了。

毛：英国在危地马拉有什么利益没有？

阿：英国在危地马拉没有任何利益。在上世纪（19世纪）时，英国取得了危地马拉的一块领土的让与权，这一块领土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毛泽东看地图）

阿本斯夫人：就是地图上的英属洪都拉斯。

阿：我们一直在要求收回它。

毛：收回这块土地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吧？主要的还是美国对危地马拉全国的侵略。在事情发生时，你们的邻国表示什么态度？墨西哥采取什么态度？

阿：墨西哥同危地马拉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友好，墨西哥政府尽力表示中立。

毛：墨西哥属北美洲吗？

阿：是的。

毛：中美洲有哪些国家？

阿：中美洲包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毛：不包括巴拿马吗？

阿：不。巴拿马原来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巴拿马运河区的关系，它才成了一国。另外，中美洲五国在独立后成立过统一的中美联邦。

毛：你们南边的国家态度怎么样？

阿：南美各国人民对危地马拉都很同情。

毛：干涉是来自海上的吗？

阿：不。侵略是直接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来的，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直接挑起来的。事情发生前，在加拉斯加召开了美洲国家的外长会议。会上，杜勒斯提出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提案。这一提案是要一切美洲国家迫害共产党人和所有保卫本国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人士。危地马拉反对这一提案，因为这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并使垄断组织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渗入的提案。

毛：这个会是几时开的？

阿：一九五四年三月开的。

毛：美国到处以反共的招牌为名，而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洲国家共产党人数很少，苏联离得很远，为什么美国那样急于反

共呢？

阿：美国所以急于反共，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为本民族的主权、独立以及从垄断控制下争取解放而斗争，并且揭露本国政府的卖国企图。

危地马拉代表团在加拉斯加会议上指出，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掩盖着进一步渗入其他国家和加深殖民控制的企图。

美国提案的投票情况是这样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弃权，危地马拉代表团投票反对，其他国家投票赞成。

危地马拉的态度受到各国进步的革命力量的尊敬，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危地马拉人民的意愿，也表达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意愿。

毛：我们知道的。

你们的朋友多些，美国的朋友少些，你们的朋友比美国的多。

美国的胜利是暂时的，危地马拉终究是你们的，是危地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独立。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还有欧洲国家的账。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包括英国在内。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它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日本、南朝鲜、中国的台湾、菲律宾、南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的侵略。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阿：国际形势最近两年的发展，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亚洲国家就是这种例子。亚洲形势对其他大陆的斗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现在听到了亚洲的声音，以后一定会听到拉丁美洲的声音。

毛：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思想上要求变，小的要求变大。美国力量

大要变小，因为美国本国人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主席问在座的人的年龄）我们这里有三个清朝的人、四个民国的人——四个国民党的人。（笑声）

满清，要推翻。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打仗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满清。大，也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几年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人民对土地的要求。不知道他晓得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就失败于一个军阀首领袁世凯。

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老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而后，孙中山（后来是蒋介石）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军阀都消灭了。

蒋介石统一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当时五万党员，经过镇压只剩下几千党员。敌人到处捣乱，还是按照老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他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他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日本很强大，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日本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也是按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赶到了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发展到了九十万游击队，枪炮不

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阿本斯向夫人惊奇地说：四百万。）打了三年，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国很强，不是真的强。美国政治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本国人民也不喜欢。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做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笑声）

整个历史都证明这一点。人类有阶级社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可以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在美洲，美国要让位给你们。

阿：感谢主席先生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

毛：我们的经验，供参考，不能照抄。

阿：我们一定会使它适合我们的情况。我们感到很有信心。再过五六年，我们愿意再到中国来看中国人民的成就。这种成就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各国的人民，包括危地马拉人民。

毛：中国人民是你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成就中，有你们的一份；你们的成就中，也有中国人民的一份。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终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阿：亲爱的主席先生，能亲自向你致意，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极大的友谊，对危地马拉人民的极大的友谊。在我们的人民的心目中，主席先生受到极大的尊敬。（主席：谢谢。）我们祝贺主席先生在国家工作中的成就，祝主席先生的个人幸福。

毛：我们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

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我不懂。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我们性质上相同，只是所住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乔冠华在三十八度线上的板门店同美国谈判了两年多，也是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来说，重视它，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怕，可以轻视它。但是它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斗争，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因此需要时间。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才搞出名堂，搞出个朝鲜停战。现在又在日内瓦谈了快一年了，还没有谈出名堂来，也可能谈到二十一世纪去。只要美国拖到二十一世纪，你就得准备拖。

不要悲观，不会拖那么久的。

同美国打交道，像我们中国所说的吃牛皮糖一样。看样子美洲

国家、亚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阿：现在各国人民的风雨正在打美国。

毛：对。

刚才你说五六年后再来中国，是说五六年后有把握取得胜利吗？

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但我们相信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毛：你（指阿本斯）是从欧洲移去的？

阿：我父亲是从瑞士来的。母亲是……

毛：你呢？（指阿本斯夫人）

阿本斯夫人：我相信我有点西班牙血统。

毛：西班牙血统的占人口的多少？印第安人占多少？

阿：在危地马拉，印第安人占百分之七十。

毛：其他中南美国家的印第安人多吗？

阿：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印第安人多。

阿根廷、智利差不多全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毛：有人说，美洲人是从中国去的？

阿：危地马拉人很像中国人。

毛：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也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也可能不是。南美、北美一共有多少印第安人？

阿：（犹疑）几千万吧？

毛：这是不是就出现了欧洲移民同本地印第安人的合作问题？

阿：工人和农民都受到剥削，尤其印第安人受到歧视，身上标着号码，像牲畜一样。

毛：你们从欧洲移入的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

统治另外一部分人，那么你们这一部分被压迫的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所处地位相同。

你们的政府实行了土改的政策，把帝国主义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外地来的人当总统，把土地分给本地人，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拥护。

阿：我们确实把反动党派搞出来的压迫取消了一些。我们那里没有种族歧视，黑人不受歧视。

毛：危地马拉有黑人吗？

阿：很少。

毛：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政策太进步了，也是一个缺点。是不是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没收？有民族资产阶级吗？地主中间有没有不跟美国走的？人民不喜欢美国，对美国关系小些的地主，可以团结。这样就能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包括一些虽对本地人歧视，但又对美国不高兴的人。

阿：地主阶级一般是亲美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对立的。我们听了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建议，改正了前任政府的一个错误。前任政府为吸引人民的支持，采取了一般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的政策，造成贫富对立。我们改变了它，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合理要求。

但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民族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支持政府，我们却远离了他们。

毛：我们这里也有地主中间的左派，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反对蒋介石，和我们在一起。

除开逃往台湾的那些以外，我们接收了整个资产阶级，接收了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中、小学的教授、教师。教育他们，要

他们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错误，使他们感觉到不舒服，引起他们的反感。

大体上可以说，经过五六年的合作，团结得更好了。

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只要没有跑到台湾，我们也接收了下来。但我们处理得不好，有些有职无权，挂个名。这些非切实改正不可。水利部有个参事郑洞国，挂个名，没有事做。长期下去如何得了。文史馆不做什么事情。有些地方政治协商会议也不做什么事情，这是缺点。

你在中国对我们的错误缺点要注意，要进行比较。

毛：还要为阿本斯组织些什么座谈？

吴茂洁：已组织了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还要组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

毛：尽讲好的，你就不要相信他。他不讲坏的，你就问他，有什么坏的？还能在中国留多久？

阿：到八月十四日。我们因签证问题，必须在下月底前回到法国。

毛：那么还可以到各地看看。多找些人谈谈，找共产党人，也找其他党派的人，找起义将领、资本家、宗教界人士。你们如有少数民族问题，也可谈谈，这方面我们有点经验，也有错误。

张奚若：他们已参观了民族学院。

阿：很感谢主席先生所讲的话。我们将利用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来学习。我们已经学到了你们的政策的灵活性，你们给每一个不同美国在一起的人以机会，使他们为人民服务，并在服务中承认自己的错误。

美洲的一些政治领袖，往往不是这样。他们对他们自己，也从来不承认有错误。

毛：你很老实，想到的就说了出来。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在根据地的头几年，采取可以叫做“一切打倒”的口号。除工人、农民外，什么人都不要，通通赶掉。这样，蒋介石倒感到舒服了。蒋介石力量大了，把我们从南方的很多根据地赶到北方的一个根据地。这样，我们就“想”，批评、改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的历史上犯过三次“左”倾、两次右倾——陈独秀、王明。此外，局部的、个别的也犯过右的错误，如张国焘、高岗。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日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有很多老师：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这些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帝国主义、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都是我们的教授，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错误。如果你们有错误，你们也可以取得教训。美国就是你们的教授。现任总统阿马斯可以说是你们的第二个教授。

阿：在告别之前，我首先要表示感谢。我们占了你很多时间。我们知道，这些时间并没有白费掉。我们要把主席先生的话带到我们的政治力量中去，来改进我们的工作。非常感谢。

毛：谢谢你们来看我。

对中央转发王观澜关于江浙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1]

(1956年7月22日)

报告中的第二项^[2]“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个算法与实际税收和农民负担有某些出入，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摸底，也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和真正了解农民的经济情况，各级党委都应当进行这样的调查，地委、县委在一两个乡或者在一两个合作社内进行调查，省、市、自治区党委选择一两个县直接去进行典型调查。这项工作应在夏季

[1]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本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

[2] 指王观澜1956年6月12日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第二项。这一项主要是谈为农民算账问题。报告说，在浙江临海县曾为农民农副业的收支算了一次账。在农业方面，按每人约有一亩三分田地、平均每亩年产量四百八十五斤计算，扣除农业税、生产成本（种子、肥料等）后，大概每人可得原粮四百五十四斤，折人民币三十一元八角，每月可得二元六角五分。副业方面，找不到必要的材料算一次细账，据1955年统计，浙江副业和土特产产值占农副业总产值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但目前均有下降趋势。临海县养猪只完成今年计划的三分之一。因此，农家每人每月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也只有四元多，多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对于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

布置，以备秋季之用。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请你们调查所属如临海情形的有多少县，好于临海的有多少县，摸一下底，电告我们为盼！

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 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

(1956年7月22日)

李维汉^[1]（以下简称李）：关于平息叛乱，继续贯彻执行“以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打击”的方针，宣布停下来谈判。允许叛首自己来谈判，也可以派代表来谈判。谈判要有上层参加。在谈判期间，叛众不下山，我们不去打。对叛乱分子，反复争取，不惜时间。同时，利用时间让部队、干部、群众休整（体力、思想、组织等等）。要戒备，要防御，再打我们更主动。做得好，估计一部分和大部分叛乱分子可以瓦解。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个办法很好，应当坐下来谈判，我们有缺点就讲缺点，有错误就讲错误，这样也才能说服拉萨方面。

李：稳定邻区，缩小叛乱影响。对所有叛乱分子，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在平叛中和平叛后，都不杀人。有的同志主张，平叛后罪大恶极的还可以杀。这就有一个对中央四月九日指示^[2]理解的问题，指示中说：“即使对那些参加叛乱的上层分子，无论是首恶分子还是胁从分子，只要表示悔改，停止叛乱，也对他们一律从宽处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195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彝族和藏族地区反革命叛乱情况的通报。

理，不咎既往，过去在政府和协商机关有职务的，保留职务，允许继续参加工作。在平息叛乱中有立功表现的，还将给予奖励。”

毛：可以一个不杀，民愤很大的，拖他一二年，群众气平了，就可以不办了。苏永和、马良^[1]都没有杀嘛！杀这些人对西藏上层会有影响。

廖志高^[2]（以下简称廖）：寺庙枪支不动，群众不放心，上层的枪向寺庙转移。

毛：暂时不动，不是永远不动。暂时不动，约法三章，我们有理。

李：关于划分农区阶级成分，划分三种阶级成分即农民、富农、地主，农民内部不再划分，以便加强农民内部的团结。但在发展党团、配备骨干、提拔干部时，要掌握其阶级成分和斗争中的表现。

毛：发展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好好地发展。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

现在，民族之间还有些不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共产党，就要做到民族之间的完全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意见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正确

[1] 苏永和，又名罗基邦让·多吉巴参（1909—1981），西康芦花（今四川黑水）人。1955年任阿坝藏族自治州（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副秘书长、政协副主席。1956年春参加叛乱，被捕。释放后出走印度。1980年从加拿大回国定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马良（1905—1960），甘肃临夏人，曾任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团长。1951年在甘肃、青海、四川边界的藏族地区组织武装叛乱。1953年被捕。

[2] 廖志高（1913—2000），四川冕宁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的就采纳，不正确的要说服，说不服就等待。我有个亲身体验，当年在陕北的时候，遇事就和高岗^[1]商量，听取他的意见。此人以后变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换成另外一个人道理也是一样的。对于陕北是我的学问高呢，还是高岗的学问高？当然是高岗的学问高。所以，遇事我就和高岗商量。他到东北去以前，我告诉他我的这个经验，他到东北后把这个话忘记了。

在汉族地区都是这样，更何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本地人总是了解本地的事，即使有些话说得不对，也只能用同志的态度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等待，等待他三、四、五年，待他们同意了再办。汉族干部这样做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那时你要走，他们也会出来挽留的。留一些为本地人信任的汉族干部在那里长期工作。要取得他们的信任，首先就要信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没有这一条就是格格不入。

民族间的隔阂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要缩短这个时期，就要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一条。还要增加一条，叫做“唱对台戏”，使他们有讲话的机会，把苦处和怨气都吐出来。你们这次会开得很好，汉族干部唱一台，少数民族干部也唱一台。像这样的会，可以考虑每年开一两次，各省也可以开。

李：几年来少数民族干部有一些反映，在这里汇报一下。这些反映是：

一、自己的意见常常不被重视，而汉族干部的意见每每必须接受，甚至发表演说、汇报工作，都不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和想要做

[1]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33年到陕甘苏区工作，是陕甘工农红军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等职。

的事。

毛：这就是强加于人。绝不能强加于人，做好事也不能强迫。

李：二、有一股压力，不敢随便说话，特别是不敢说不同的意见，害怕随便扣帽子。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有名无实或者名多实少，不能做主。

毛：那就不好，应该倒过来。

李：四、自治地方的许多困难和要求，提出来很不容易解决，他们对中央各有关的部门有很多意见。

毛：你们不是要开民族工作会议吗，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

李：在划阶级上自觉缩小打击面，地、富比率划得小一些，剥削轻微的富农可以划到农民中去，地主划到富农中去。具体办法由地委研究。孤立地主，中立富农。

毛：现在划的地、富占多少？

廖：省委意见，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比例准备到百分之七，个别不超过百分之八。

毛：我看多了，汉族地区一些地方也不过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划百分之三、四、五就可以了。有些人可以有意识地不划成地主。在汉族地区小土地出租者一条定下来，几百万人感到舒服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很苦，上层的生活也不很好。

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和汉族地区的不同，汉族地区的地主在土地改革以后剥夺了选举权，不能做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剥夺选举权，还可以做官。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应该宽一些。我们对资本家都是赎买政策，对他们应该比对资本家更宽大一些。

现在，逐句议一下李维汉同志讲的第一节。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战争的那一方面即叛乱的头子认为是民族斗争性质的。他们用“保卫民族和宗教”欺骗了一部分群众，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打是不得已的，现在又要停下来，就是要争取群众，解决这个群众性的问题，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从他们手中拿过来。从我们方面说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我们说阶级斗争，是有充分根据的。打仗要有彝民参加，土地分给当地农民，我们并不搬走。过去的民族斗争，总是掠夺他们。我们是大量地援助，这能说是民族斗争吗？我们还有一条，就是少数民族自己管自己的事。这方面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解决这一条。所以桑吉悦希^[1]说，我们就听他的，把我们都压倒了。

战争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上层，这个估计是对的，同时也教育了拉萨方面。将来金沙江以西藏区的改革，一定要避免打仗，尽一切可能去做工作，打仗是可能避免的。附带一小条，准备不可避免地小部分地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一天打，也要有准备。但要争取不打。

李：怎样讲就怎样做，要讲政治信用。少数民族对我们不信任。讲了不办，哪怕是对上层人士讲的，都会被拿去欺骗群众。

毛：汉人有时对我们共产党也不信任，民主党派在我们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开始也不相信，后来我们登了报，才相信了。要做到叫人家相信，就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就是

[1] 桑吉悦希，又名天宝（1917—2008），四川马尔康人。当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

“唱对台戏”，先党内后党外，叫他们说心里话。不说心里话的团结是假团结，那种团结是不巩固的。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背着老包袱，自以为“老子不贪污，是来解放你们的”，这就不好取得他们的信任。

应该说明白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协商不够，听意见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性不够。中央对这些事，也有责任。过去没有专门讨论过，今天讨论了四个多钟头，我们就主动了。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在一起。

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 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的批语^[1]

(1956年7月23日)

送李维汉同志酌处。

下面有些人不赞成这种变更。究竟是否应当变更，请审议酌复广东〈西〉^[2]。

毛泽东

七月廿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广西省委统战部1956年7月12日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给中央统战部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毛泽东在5月下旬曾口头指示：暂时停止进行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的工作。为了便于执行，请给以明文指示。

[2]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6年8月草拟了中央关于更改区级和乡级民族自治区问题给广西省委的复电，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电报指出，对这一问题，各地少数民族中都反映了一些意见，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地加以处理。凡是可以通过改建、扩建或合并建立自治县的区级自治区，即可着手建立自治县；但对那些确实不能更改为自治县，而当地民族人民又不愿意更改为区公所或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区级自治区，决不可以强迫他们更改，应一律暂时停止更改，留待以后再说。至于改建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为民族乡的问题，如果当地少数民族不同意，也可以暂缓处理。



1956年7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供销合作社会议的代表。



1956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8月、9月)

八月上旬的批语^[2]

—

经济数字太少（成就）。

苏共二十次。

国防。

华侨、工、青、妇。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在讨论、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本篇收入的是他在多次过程稿上的批语和加写、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用宋体排印。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这篇报告，报告的全文发表于同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

[2] 8月上旬的批语中，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6年8月8日印发的《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初稿）》的封面上，二至五写在政治报告初稿有关文字的旁边。

二

不能完全归咎下面，中央也要负一部责任。^[1]

三

革命也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些文化。^[2]

四

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3]

[1]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55页上，这页上的内容主要是说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着只追求数量和曲解节约而不管质量的错误思想和极其有害的自满情绪，结果造成1955年有些工程的质量事故。

[2]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78页以下一段文字的旁边：“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承认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根据中国革命胜利的老经验来否认提高文化的迫切需要。是的，当劳动人民大多数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在那个时候，认为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进行这些斗争，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

[3]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111页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而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一段文字的旁边。

五

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1]

八月中旬的修改^[2]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种情况，而不是否认这种种情况，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和尽一切努力争取不犯极端严重的错误，而决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

[1]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140页以下一段文字的旁边：“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

[2] 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1956年8月14日送给他的政治报告稿中“党的领导”部分所作的修改。

八月二十一日的修改^[1]

一

在不久以前，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总结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现在世界上民族的醒觉运动的高潮还在继续发展，它的规模来得非常广阔，它将继续取得重大的胜利。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受到亚非两洲的影响，而向前发展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绝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打击之下，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个十分丑恶的东西，已经日益显得陷于孤立，并且正在走进彻底瓦解的过程之中。不论是英法等欧洲旧的殖民帝国的

[1] 这里收入的是毛泽东审阅政治报告（修改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部分所作的13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在这两部分修改稿前面，有刘少奇1956年8月21日写的“此件即刻排印”“今日十二时前印好”等批语。

挣扎，还是美国建立新的殖民帝国的努力，都将受到彻底的失败。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殖民帝国主义，这个殖民帝国的崩溃，将是人类的最后解放。总之，原来由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宰割世界广大地区的局面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局面已经永远地一去而不复还了。

三

在今后，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在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下继续进行坚定的斗争，避免战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就确实出现了。因为在这形势之下，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很不容易发动世界战争。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

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组成了一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组织侵略性的军事集团，长期占领西德和日本，并且占领南朝鲜和我国的领土台湾，大规模地进行扩军备战，从而造成了世界的紧张局势，据说这是为了要“防御共产主义的侵略”。他们在口头上虽然大嚷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实际目的却不仅仅在这里，他们首先和主要的目的也不在这里。

这个集团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团结得很紧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碰倒的，要碰这个阵营的壁垒，势将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社会主义阵营按其本质和实际情况完全不需要向外侵略，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侵略”可以“防御”的。而他们需要防御的，却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以及他们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五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殖民主义阵地的缩小，符合于西方国家要求社会解放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利益，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有力的同盟军。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持久和平可能性的出现，则符合一切不愿意战争的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就西方国家来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和平事业的同盟军。我们必须重视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发展。

六

帝国主义者还会要在许多地方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会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地方，决不会轻易放手。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因此，斗争还会要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

七

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帝国主义国内和其他国家人民力量的支持，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外部保卫了我们革命的胜利。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1]

八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曾经屡次试探是否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变革，并且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一道，曾经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我们认为这种和平试探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作这种试探的活动中，我们党没有放弃警惕性，没有放弃自己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这对于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我们当然应当争取这样做。但是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们也有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发动者自食其果。

历史所作的实际结论正是这样。战争的结果把被美帝国主义者

[1] 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修正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部分时，对中国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迅速胜利的第三条主要原因的修改。前两条主要原因是：一、战后的中国人民不愿意退回到原来受蹂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

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从中国的统治地位推落下去，旧中国的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被彻底打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变成了全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革命的方法是战争，是革命方面用强力打倒反革命方面的强力。但在战争过程中间，也有几个地方经过和平谈判而获得解放，例如北京、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以及西藏的大部分地方，就是这样。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是一个关系到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内，当着时机成熟了的时候，是否应当夺取政权的大问题。

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和平改革的可能性，就真正出现了。这种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即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而不用强力压制的方法。

十

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中国革命不可免地将在世界上引起种种的结果，这是历史的规律。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世

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没有不互相影响的。

十一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

十二

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

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十三

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必须争取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必须继续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必须继续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必须继续巩固同农民的兄弟联盟；必须继续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必须继续巩固和扩大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必须继续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研究；最后，必须巩固和各国兄弟党的团结，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今后应当积极完成的任务。

八月二十四日的批语和修改^[1]

—

退少奇同志：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这里已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虽然革命根据地包括了上亿的人口，因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且在根据地内执行了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最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部分时写的批语和作的比较集中的修改。这一部分的题目是毛泽东审阅时加拟的。

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但是我们并不去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去破坏农民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所以这时候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三

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

四

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

起来。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没有参加这种政权，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六

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不管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问题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八月二十九日的批语和修改^[1]

—

退少奇同志：

[1] 这里的一和二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和“国际支援”三部分时所写的批语。三和四是他审阅政治报告稿“国际支援”部分时加写的两段文字。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¹¹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毛泽东

八月廿九日

二

退陆定一¹²同志：

此件¹³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增加了两个小段，请加斟酌。

毛泽东

八月廿九日

三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

[1] 指政治报告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部分。刘少奇1956年8月29日为送审“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改写稿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3] 指政治报告稿“共产党”和“国际支援”两部分改稿。

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四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八月三十日的批语^[1]

退少奇同志：

[1]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1956年8月30日关于政治报告第三次修改稿的各部分编排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上。

可以这样编排^[1]，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2]。

毛泽东
卅日

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八月三十一日的批语和修改^[3]

伯达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

[1] 刘少奇送给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第三次修改稿各部分编排的顺序是：“序言”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改造；四、社会主义建设，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五、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关于华侨问题、关于我国的国防问题、关于国内的反革命分子问题、关于官僚主义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问题、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六、共产党；七、国际支援。”

[2] 政治报告稿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在修改过程中有多次变动。1956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其各部分的顺序为：开头部分；（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社会主义改造；（三）社会主义建设（下面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五个小标题）；（四）国家的政治生活；（五）国际关系；（六）党的领导。

[3] 这里的一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部分时所写的批语；二、三是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时所写的批语和修改；四是关于压缩政治报告稿头几部分文字的批语。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

毛泽东

卅一日三时

—

即退胡乔木^[1]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

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2]，请乔木注意。

毛泽东

卅一日五时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2] 这一页上讲到，“在第一个五年内，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因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只约占百分之五十八”。毛泽东在这一句话旁边写了批语：“还有百分之十的开支要作交代。”这句话后来修改为：“在第一个五年内，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在第一个五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除用于信贷基金、归还国内外债务、援外、总预备费等项共约占百分之十以外，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共约占百分之五十八。”

三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四

乔木同志：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六时

九月六日的批语和修改^[1]

—

即送乔木同志：

[1] 这里的一、二是毛泽东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时所写的批语和修改；三是关于同周恩来联系修改政治报告的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毛泽东

九月六日二时

二

为了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初办的合作社，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入。为此，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加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

三

伯达同志：

周总理及洛甫^[1]同志今日开始修改政治报告，请你与总理联系，或即与总理处合并举行。

毛泽东

九月六日七时

[1]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九月七日的批语

周总理：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

毛泽东

九月七日六时

—

乔木同志：

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

不知15页上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没有？

毛泽东

九月七日六时

三

伯达同志：

“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再送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九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三部分^[1]，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

毛泽东

九月七日七时

四

周总理：

政治报告的头三部分，请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势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写。但请于今晚十时前，交伯达看一下，然后交我。“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2]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译。

[1] 指政治报告稿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1]，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

九月七日十时

五

乔木同志：

“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2]谈一下。

毛泽东

九月七日十时

九月八日的批语

—

伯达同志：

[1] 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1]，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八日八时

—

少奇同志：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毛泽东

九月八日九时

九月九日至十三日的批语

—

尚昆^[2]同志：

[1] 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少奇同志修改处请交翻译注意照改。改印，暂可等一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见交来，汇总修改，并经少奇和我看过后，再行付印。

毛泽东

九月九日八时

二

伯达同志：

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读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1]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照前抄三份，分送刘、周^[2]及我。

毛泽东

九月十日五时

三

少奇同志：

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

[1] 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总理改本，用后请送伯达，因为里面有批语处，需请伯达再修改的。

此外，请将已定稿的各部分（冒〈帽〉子及一至四^[1]）立即印成一本，于今日发给所有代表，每人一份，并附通知，请他们收到即看即加修改，于九月十二日下午送回中央。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四时半

四

少奇同志：

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两处是和乔木、伯达商量修改的，请酌定。周总理今晚没有时间看此件，他在改他自己的报告^[2]。因此，请即将这一部分的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二时半

[1] 指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社会主义改造，三、社会主义建设，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2] 指周恩来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五

即送少奇同志：

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七时半

九月十四日的批语

—

即送少奇同志：

(一) 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

(二) 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再改。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二时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

二

伯达、乔木、家英同志：

(一) “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

(二) 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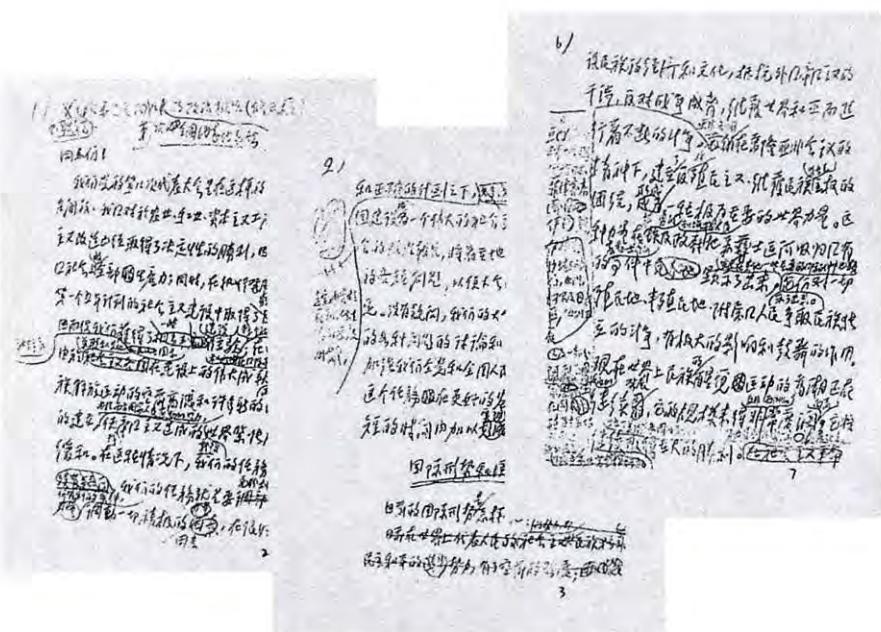
三

杨尚昆同志：

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陈伯达同志等的修改稿，要今天下午才能交出。据我看，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总理报告的翻译工作，亦请抓紧。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时



1956年，在筹备中共八大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反复审阅并修改了八大政治报告。图为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稿（部分）。

给曹云芳^[1]的信

(1956年8月11日)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2]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1] 曹云芳，原是罗哲烈士之妻。大革命时期曾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2] 罗哲，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牺牲。

曹云芳同志：

前一日的信收到，甚感。
羅哲鳴美勇犧牲，早就
聽了些消息。五五年在
重慶的時候，見到他，維
持着他的態度，他
只告訴你他已失蹤，除
向的情形他不知道。現知你
仍健在，並有兩個女兒，他繼
承羅哲鳴志，我很高興。
羅哲鳴是革命家，我為他
證書當時沒有別的證件。
鄭金由誰經辦的，並由
當地政府去作決定，我
決定給妻子，不給女兒，也
就算了，不必为此事爭論。

擴大會事由你來修改，現
寄上三万元，請你酌量支
取，勿為難。你見過兩個孩子
不應該半生兩種性子，不然兩
個的孩子都作育成績，向你
們改過來。

順祝康泰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

毛泽东致曹云芳信的手稿。

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 问题的批语^[1]

(1956年8月)

似应有几句话劝告英法政府和英法人民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应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上。后来，这个联合声明改为中国政府声明，发表于195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发表了有关声明。根据毛泽东的批语，中国政府的声明增加了有关劝告英法政府的一段话：“中国政府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主权行为是不容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的；有关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问题，是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的。英国和法国在这次事件前，曾经采取过一些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比较明智的行动。中国政府希望，英国和法国将本着这种精神来对待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任何武力威胁和武力干涉的行为将必然引起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也决不会是有利的。”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6年8月18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

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亚非国家要团结起来， 保证和平与独立^[1]

(1956年8月21日)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访问。我们两国是邻居，是朋友。我们很高兴，最近两国的关系接近了，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你们已经看到中国人民是多么高兴看见你们。

我们中国也很困难，过去一百多年受到外国的压迫，现在建国不久，在工业、文化等方面都还需要发展。我们需要朋友们的帮助。以后我们可以互相合作。

我们欢迎你们来中国访问，以便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小国的地位也应尊重。柬埔寨觉得它是小国，但我们把他们的代表团当作大国的使者来欢迎。我们对大国、小国都一律平等看待。

亚非国家现在都在争取独立。亚非会议召开后只不过一年多，万隆精神已发展得很快，影响很大。亚非会议团结了大小国家，人口有十五亿。自从埃及事件以来，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界线更加分明了，甚至日本在伦敦会议上也不站在殖民主义方面。日本在万隆会议时，还不很积极呢。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数很少，事实上根本不可怕。他们没有翅膀，飞不起来了。现在亚非国家都在争取独

[1] 这是毛泽东和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的一部分。

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连拉丁美洲也受到了影响。

我们许多亚非国家过去都受到外国的统治，现在获得独立后，要团结起来，保证和平和独立。看看我们的国家就知道，我们是不会侵略别人的，侵略别人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地方原来就有本地民族居住着，别的民族跑去做什么呢？过去的侵略者是日本，现在是美国。你们现在还有外国的基地。我们的台湾还被人侵占。

你们的政策、方针很好，对内采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对外采取独立、友好的方针，这样就有可能在和平环境中发展你们的经济。你们现在国内不打仗了，讲和了。我们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准备和蒋介石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你们做得很好，国内问题没有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现在我方在座的没有过去互相打过仗的人，但却有互相吵过架的人，因为他们是属于各个不同党派的。过去和我们打过仗的人，现在在北京也有工作做，各得其所。

我们很多方针都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我们一定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支持你们，这对双方都有利。

我们关心的是东方，而不是西方，因为东方有李承晚、蒋介石和吴庭艳。过去日本侵略我们，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和我们来往。我们要搞好关系，我们也愿和美国搞好关系。和美国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在日内瓦谈了一年，相信终有一天会谈好的，我们不着急。对台湾问题也是如此，我们不着急。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56年8月22日)

—

今天是七届七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为八大做准备，有三大工程：文件、选举、发言。

第一，文件问题。有五个文件要审查：一个是政治报告，一个是党章草案，一个是修改党章的报告，一个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一个是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现在就靠大家了，还有二十天的工夫，还来得及，请同志们发表议论、提出修改意见。

第二，关于八大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如果全体代表能够在八月三十号以前到齐，最好三十号开一次会，争取在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四天内提出一个名单。想用这样的办法：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单，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中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开始时的讲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对提交七届七中全会的几个文件作解释说明后的讲话。个别地方有删节。

长提出一个预选名单；再发下去，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再由政治局集中起来，制订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候选人名单。¹¹¹

第三，发言问题。中央委员中有许多同志是要发言的，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一千零二十六位代表，准备有八十人左右发言，（邓小平：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到一百个）看时间长短。总之，原则是

[1] 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七届七中全会的几个文件作解释说明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一次中央委员会人数，政治局也想过，是不是可以要二百、三百？后来考虑，扩大到那么大的范围，不好安排。所谓‘三八式’的干部，牵连很多。选你没有选我，选我没有选他，问题很大。所以，原则还是‘三八式’以前的。但是，代表们可能要突破‘三八式’这个界限。所谓‘三八式’，就是抗日时期涌现出来的干部。的确有大批优秀干部是‘三八式’的，但是因为牵连太广，所以，‘三八式’的一般不选。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说服他们，让他们等几年，这样也有好处，等几年并不坏，更成熟，更孚众望。现在还是让这些‘三八式’以前的同志在中央委员会掌一下权。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准备定在一百五到一百七，包括这正式的和候补的。”在邓小平谈到上届中央委员中有几人被解除职务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商量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应该向代表们建议，原有的中央委员都当选更为有利。一般同志，当选当然没有问题了，主要是过去犯了错误的几位领导同志。比如两条路线，今天在座的就有李立三路线的代表，还有王明路线的代表，要代表们选举他们，有些代表会有些抵触。我们觉得包括他们两位都当选比较有利。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怪，七次大会时，开头也是通不过，后来选上了。选上了，对于我们的事业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没有害，有利。因为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内许多人，有同他们思想相同的人；还有党外的观感，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我们还包容他们。是不是能说服代表们？当然，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如果代表们一定不选，你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希望能够说服大家，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座的中央委员都要做这个工作，使上届的委员都当选。这回法国党的情况也是这样，上届的委员都当选了，我们也采取他们这个办法，看可以不可以。这是一点建议。”

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会议时间，现在的安排是十三天，包括中间的休息，实际开会十二天，如果能够节省时间，最好实际开会十一天。时间不要太长，不要照延安时的七大那个办法。七大开得太长。（邓小平：也有一个好处，把日本开倒了。）当然也有好处。延安整风，把大家的思想搞一致，团结起来对付敌人，所以得到了胜利。

七次大会后，我们得到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了建设。这一次大会我们要得到建设的胜利，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1]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团结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切同这个方向不相同的，我们就要批驳，就要反对。凡是不利于团结一切力量，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方针，我们就要批评。这是我们这次大会、也是我们党历来的旗帜。

我们的七大是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力量，进行革命战争，打倒敌人，并且开始了建设的大会。那末，现在我们的建设取得了初步的经验，还是这个方针，就是团结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得很紧。再就是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民族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

[1] 在邓小平说明几个文件时，毛泽东还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还是在建设，占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讲建设。”

动，凡是能够孤立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都要团结起来。即便是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它愿意和平，能够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都跟它建立外交关系，包括美国在内。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

我们这个国家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后，将来可以看得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过去起的作用应该说是大的，在历史上起了它的作用。但是最近这一百多年衰落下来了，起的作用不大了，跟我们中华民族众多的人口、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完全新的大国，在世界上起更大的作用。

二

此外有几点，我还想趁此机会谈一下：

第一，关于常任代表制。我们这个党章草案上有个常任代表制。这是鉴于：过去十一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开会，其中有各种原因，我看原因之一就是惰性，没有别的理由。把代表大会看得非常神圣，非常严重，愈这样看就愈是难开。我们现在要改变那种惰性，要每年开，开成习惯，成为条件反射。那末，从前没有开是不是就完全不合法呢？那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因为党章上说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如果情况不许可，也可以推迟。我们少开了两次，实际上是少开了一次，因为三年战争那个时候很难开。我们与苏联不同，苏联是先占大城市，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城市。打三大战役的时候，人家都在打仗，不会来开会。一九四九年还在打仗。后头又有一个朝鲜战争，忙得要死。要讲理由，还可

以讲好几条。总而言之，战争那么忙是很难开会的。现在的情况改变了，完全可以经常开，有了常任代表，不要选举就好办了。如果我们用常任代表制（这上面写的是五年选一次），就可以每年开一次。草案上写的还灵活，如果有特别情况，这一年也可以不开。我看最好每年开一次，这要成为习惯。这样，就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最近各省市开的代表大会一般讲开得很好，特点就是展开广泛的批评。不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许多意见就听不到。中央改为常任代表制，地方也要改为常任代表制，也是每年开。这是个制度问题，也是党章修改的一个重点。此外党章的修改还有很多内容。

第二，关于中央的组成。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中央准备设几层屏障，并设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同志当总书记。因为他已经是总书记了。秘书长是什么呢？按照英文的写法，就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国人脑筋里头则不同，秘书长就是秘书长，总书记那是另外一件事。那好吧，我们就设一个总书记吧。

中央书记处过去是五位同志，就是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少奇同志和我，还有一个候补书记彭真同志。再过去是两个候补书记，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陈云同志补了弼时同志。这样几个同志开会时，有许多时候秘书长是参加的，还有别的同志间或参加。有许多时候参加会的同志很多，譬如讨论肃反问题，五人小组的负责人和公安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讨论别的一些问题，譬如《红楼梦》的问题周扬同志参加了，工业问题、商业问题、合作化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有关的同志都参加了。但是缺少一个工作机关，就是秘书处，现在的秘书处还不十分便利工作。因此，想在政

治局和它的常委会之下组织一个书记处。至于组成人员，正式、候补，现在还没有议。那末以后，这个书记处，就是管中央日常工作，如准备文件，审查工作的执行等。

中央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会，常委会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因为估计到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能不止十三个人，政治局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合起来可能会到二十人多一点。我们认为组织一个小的常委会，一个小的“内阁”，是有必要的。

还有中央副主席、主席。过去只有中央主席，没有副主席，没有总书记，现在设总书记，又设副主席。副主席是设一个，还是设几个？这个问题也考虑过，也跟一些同志谈过，觉得还是几位比较好。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六亿人口，一千一百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过去的几位书记都当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一个总书记。（笑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

此外还有，在必要时要设名誉主席。这也是为了有备无患。有些人不赞成现在设，也可以考虑，设不设要看对党与国家是否有利。

第三，关于过去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中央委员会同它的政治局实行的这条路线是不是对的？可以有两种答复：一种是对的，一种是错的。为什么可以有两种答复？譬如，南斯拉夫的大使找了保加利亚的一位中央委员，还有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几位，集合在他那里开会，说中国共产党是机会主义的党，斯大林不打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不成，因为在中国天安门上，还挂有斯大林的像，对斯大林

反得不彻底，此外还有许多。因此他断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不成功。那末，如果以后建设不成功，就是我们现在以及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还有印度党的一位老同志，他说我们的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总之，国际上怀疑我们这条路线的人并不很少。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相当一些人认为我们党是个机会主义的党，说世界上的铁托不只一个，有两个，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中国的铁托就是我。我是铁托，你们也有点嫌疑呀！（笑声）还有，有相当的人说我们是民族主义的党，就是资产阶级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空气什么时候才变的呢？先是签订中苏条约的时候，特别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一来，世界局势变化了，中国的党也好，政府也好，都不是亲美的了。抗美还亲美？亲美就不抗美了。不要因为国内批评我们的人比较少，就以为我们这条路线是对的。国际社会各方面承认我们党有个历史过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党内一千一百万同志是不是完全赞成我们这条路线呢？不见得。一千一百万党员，你查得那么清楚，一个也不反对？不是那样的。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延安整风，到现在，虽然我们还要在党内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国内应该采取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际上应该跟苏联很好地合作，跟人民民主国家很好地合作，跟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跟各国共产党很好地合作，跟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同盟，但是并不等于说对我们这条路线就没有怀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要在预备会议中间谈一谈呢？我看谈一谈比较好。因为开代表大会总是要讲过去或者错或者对，这并不妨碍批评错误。中央这十一年的工作是有错误的，不能说没有错误，可以举出相当的一些错误。但是说到路线，我这么建议，也许能够得到在座的同志们的同意，应该肯定我们的路线是对

的，不是机会主义路线，我们是在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条路线。我们的路线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批评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之后建立的一条路线。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整风，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产生的路线，就是七次大会所规定的路线。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我们有两条总路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你要说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错误的，也可以讲，比如托派就这样批评我们，总说我们是民主党。这个“民主党”的说法也传得很远，美国国务院从前特别欣赏这个说法，现在他们又说我们不是了。我说我们这些人有一个知己，他也是中国人，就是“蒋委员长”，蒋介石。此人比较懂得我们，他在国际上从来就是替我们辩护的，他说：对共产党你切记不要相信，它是一个非常王八蛋的党，就是要搞共产，绝不会跟你们妥协。你们不要幻想把中国从苏联方面分化出来，搞个南斯拉夫的铁托，这不行的。我们没有出薪水，他控制的报纸刊物，在香港、台湾纷纷给我们作这个宣传，作这个解释工作。（笑声）同时美国人也给我们作解释工作，美国人是从我们把蒋介石推翻之后替我们作解释工作的，也不要我们出薪水。英国人有时候解释，有时候就不解释，他说：还是有把中国同苏联分化的可能，中国有出铁托的可能，你看吧，他们的土改也不一样，对资本家的办法也不一样。美国一骂，蒋介石一骂，还不足以说明我们中国不是南斯拉夫吗？美国一骂，大家就懂得中国共产党大概是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了，不然为什么美国这么骂呢？虽然如此，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就完全终结了呢？还没有终结。在国际上还要看，你们究竟怎么搞的呀？比如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许多外国人就是不了解，中国同志也有不了解的。中国同志中“左”

派多得很。原来十月革命的那个方式深入人心，我们党内跟资本家接触的很多人又鉴于“三反”“五反”，以为资产阶级那么坏，这个看法也深入人心。现在这几个月有所改变，因为进行教育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三反”“五反”是最激烈的斗争，以后也还有说服、批评等各种文明的斗争，是可以不需要经过另外的强力的办法来改造、来没收的。这不是机会主义，这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肯定，这两次大会之间的中央是执行了七次大会的路线的，而七次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可不可以这样说，请同志们讨论一下。

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

(1956年8月24日)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2]，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

[2] 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入侵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9月15日它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两方临时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

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1]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2]，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

[1]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7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2]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1913年，该党被解散。1924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把该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1927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他的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

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1]。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

[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1]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

[1] 桐城派，是古文中的一个流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而为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由于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把他们和他们这一派的人称为桐城派。这一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

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1]。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2]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

[1]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考虑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由于资本家阶级一般地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设想没有能行得通。

[2]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1]，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2]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1]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

[2] 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

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1]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2]，也要《阿Q正传》^[3]。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4]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1]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他设立的六门课程（即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

[2] 《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创作的长篇小说。

[3] 《阿Q正传》，鲁迅小说的代表作。

[4] 《毁灭》，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1]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數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2]。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1] 西太后，即叶赫那拉氏（1835—1908），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1861年其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因住在西宫，所以又称西太后。她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清末顽固势力的总代表，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同时又盲目地排外。1898年，她镇压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运动。

[2] 隋朝的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据《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唐朝的十部乐是：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其中，龟兹、康国、安国、疏勒、高昌都属于西域，高丽即朝鲜，天竺即印度。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个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是由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提出的。他在《劝学篇·设学》中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不能改变的根本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科学技术，作为维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和京剧演员在一起。

在欢迎老挝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1956年8月25日)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举杯，向老挝国王致意，祝他身体健康，向梭发那·富马首相致意，祝他身体健康，并且向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表示祝贺，向老挝王国全体人民表示祝贺。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和老挝是近邻，两国在历史上是友好的，近代两国间的关系虽然曾经有过中断，但是，现在在新的基础上、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开始恢复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毛泽东主席对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和五项原则的胜利表示祝贺。

毛泽东主席在致词以后，同梭发那·富马首相和卡代·敦·萨索里特^[1]等一起干杯。

[1] 卡代·敦·萨索里特，当时任老挝王国副首相。

对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稿的批语

(1956年8月27日)

退邓小平同志。

此件^[2]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3]，请你们酌定。第23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4]，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23〈32〉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指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

[3]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修改稿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报告的第一部分第一段，“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了“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十四个字。另一处是在报告最后第四段分析我们党的胜利的原因时，在“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前面，加写了“首先和最主要地”七个字。这两处修改意见，在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采纳了。

[4]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第23页论述了党内民主并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七大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讨论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接着，报告稿列举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两条意见：一条是“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另一条是“没有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也没有说1949年的扩大的二中会议”。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两条建议，加写了这四次会议。

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 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

(1956年8月29日)

一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二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对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时加写的两段文字。

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的。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

(1956年8月)

陈、陆、胡、王稼祥、李维汉、胡绳、田家英^[2]。

a. 大会宗旨：总结经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有用〔因〕素，外宾四十九国^[3]，为建设社会主义为〈而〉斗争。

b. 除了选举以外，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团结那与自己有过斗

[1] 这个讲话提纲，写在印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安排、会议规则等六个文件的目录上。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在1956年8月30日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2] 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都参加了中共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3] 指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实际上，后来参加八大的共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

争的人^[1]。

七大选票〈举〉经验是成成〈功〉的。

时间安排是充裕的。

资产阶级。

c. 150—170^[2]。

上届中委。

三八线^[3]。

d. 36小时发言时间^[4]是充裕的。

前门饭店。

[1] 这里指要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又说：“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说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

[2] 指中共中央准备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1956年9月27日，八大正式选举出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共170人。

[3] “三八线”，这里指考虑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以“三八式”干部划线问题，即1938年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进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

[4] 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案）安排的9个下午约36小时的大会发言时间。

对彭德怀^[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 批语和修改^[2]

(1956年8月30日)

—

退彭德怀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

毛泽东

八月卅日晨

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2] 本篇一写在彭德怀1956年8月29日为送审关于军事工作的发言的修正稿给毛泽东的信上。彭德怀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这个发言，原题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195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为《胜利完成军事工作的光荣任务》。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彭德怀发言稿所作的两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虽然由于我军现代化建设为时不久，各军种、兵种还未能达到完全现代化的程度，但是已经达到我国空前未有的规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军现代化水平必将进一步获得提高。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

三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以便达到知己又知彼的目的。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

对李立三^[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1956年8月30日)

退李立三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2]。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方面的修改，请加酌定。

毛泽东

八月卅日

[1] 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

[2] 指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1956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

(1956年8月30日)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作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3]以来的经验，团结全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3]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关于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过去有些外国同志怀疑：究竟你们搞些什么事情？有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们的整风运动。现在，我看了解的人更多了，可以说一般是了解了。当然，还会有些人不了解。在国内，甚至在党内，也还会有些人不了解，认为七大以来的路线不见得那么正确。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七大以来的十一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1]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

[1] 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我们党，到六月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对这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

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这次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很好的事。过去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两个革命的胜利，没有建设的成绩，现在不同了。外国同志对我们是比较尊重的。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

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

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第二点，关于继承党的传统。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

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宗派主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也有部分的东

西是不好的，我们自己就要丢掉，更不要别国来学这些坏事。但是，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我这里是讲打得不对的，斗争得不对的。如果那些人后头改变了态度，承认打你打错了，封你为机会主义王国的国王是不妥的，只要有这一条就行了。如果个别的人还不承认，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党里头，有许多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人，他虽然没有跟你打过架，交过手，但是他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有些缺点，或者做出一些坏事。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

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对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第三点，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刚才小平^[1]同志讲，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届中委是七十七人，这次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恐怕比较妥当。等几年，比如等五年，那个时候再来扩大，恐怕是比较有利。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中央提的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这个人数究竟妥当不妥当，究竟多少为好，请同志们考虑。

应该肯定，上届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十一年间，他们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大毛病，并且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克服了各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设的因素。他们是有成绩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这是讲中央委员会的整体。至于个别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计。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

[1] 小平，即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

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1]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

[1] 二中全会，指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讨论了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比如富裕中农，大家看到，无论在哪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们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一点小财产，无非是一两匹牲口呀，一辆大车呀，十几亩地呀。他们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些东西。这种人跟贫农不同。中国的贫农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当然，陈独秀也有

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张国焘搞阴谋，搞分裂，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犯错误的人当了中央委员，那我们大家一齐犯错误好了，横直有当中央委员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呢？也不会这样。你看，我们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没有当中央委员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末，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

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

我们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从今天算起，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但是安排得好，是完全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好的。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 (草案)》的修改和批语^[1]

(1956年8月、9月)

—

第三十七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二

即退小平^[2]同志：

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党章第三条觉得应当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审阅邓小平1956年8月5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三十七条条文时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稿的批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起草工作。

添三个字^[1]，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日廿二时

在第三条加了三个字。

[1]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三条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第一款是：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毛泽东在其中的“实际问题”前面加上“理论和”三个字。

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建议草案的批语^[1]

(1956年8月、9月)

[1] 本篇一写在1956年8月印的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第三次草稿上。本篇二是对第三次草稿中以下两段话的批语，这两段话是：“在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以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应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58%左右，提高到60%—70%左右。”后来，建议的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加写了以下的话：“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2%左右，下降为20%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本篇三写在1956年8月23日印的这一建议草案中所列的关于1962年主要重工业产品的计划产量及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7年计划产量的百分比的数字表旁边，后来的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分别列出了1957年计划产量、1952年实际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绝对数，删去了原有的百分比数字。本篇四写在1956年9月7日印的建议的草案修改稿上。毛泽东在此稿上所作的一些修改，主要是在文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以适应当地经济、文化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一句中的“各民族人民”后面，加写了“和领袖人物”五个字。

—

要一个说明理由的文件，供内部用。

—

400—450亿（军），130—140亿（政）=530—590=2350亿的
22%，比现32%，减10%；其他支出：（1）还外债，（2）援外，
（3）物资贮备，（4）总预备费，（5）信贷资金，共计10%左右。

—

要把历史上最高年产量，1952年产量，1957年产量都列出绝对
数字来。

—

周总理：

有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五时

毛泽东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1]

(1956年9月)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民族	籍贯	入党时间	现任职务
毛泽东	男	1893	汉	湖南， 湘潭县	1920	党中央主席 国家主席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使出席“八大”的每个代表的籍贯、出生年、入党时间、现任职务等情况做到准确无误，于1956年9月2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代表登记表”，请各人自己填写。本篇收入的这张登记表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是毛泽东填写的。

关于修改和播发加强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的批语^[1]

(1956年9月5日、12日)

—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你看一下，并立即印发各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附上一个通知，请他们于九月八日以前于原件上批上修改意见，退还中央。意见收到后均交邓老^[4]负责修改，于九月十日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代拟稿的批语；二是写在最后改定的这一指示稿上的批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1956年9月4日送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代拟稿。陈正人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明，这个指示在起草过程中作过多次修改，现在送审的代拟稿，是根据前两天陈云主持召开的农业生产协作委员会会议的意见修改的，邓子恢、廖鲁言、王观澜、刘建勋等同志还没看，他们可能还有某些修改意见，但不会有大的修改。同日，邓子恢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进一步修改的指示稿。

[4] 邓老，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修改和播发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的批语

前退还中央，准备于九月十二日发表。

毛泽东

九月五日六时

此件我看了一遍，大体可用。拟在征集修改后，再看一遍。
同时请总理提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十二日以前）。

—

此件用。退周总理。

即刻送新华社，立即广播，明十三日必须见报。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

对陈绍禹^[1]不能参加 党的八大的电报的批语

(1956年9月10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可以印发各代表。

毛泽东
九月十日

[1] 陈绍禹，即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正在苏联养病。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指陈绍禹1956年9月8日给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自八月七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曾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专电请假。”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

(1956年9月10日)

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2]有相同的性质。那一次，为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一次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那一次的选举，达到了团结全党、使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一共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中间，我们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过大的损失，吃过很多苦头，死了多少人，牺牲了多少革命的人民，牺牲了多少党员和干部。犯错误，受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 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损失，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都觉悟，我们党内的人都觉悟，干部都觉悟，那个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但是作出一个结论来也还会犯错误。所以，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有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1]，有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还有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2]，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

[1] 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指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2] 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我想，我们应该避免而且可以避免走那么多弯曲道路，主观主义这个东西可以更多地肃清，宗派主义也可以更少一点。我们这个党，在最近若干年以来，就中央来说，就高级干部来说，是个宗派主义比较少的党，也是主观主义比较少的党。你说主观主义有那么多，你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革命搞胜利了，现在搞建设又有了成

绩。你说宗派主义有那么多，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陷于孤立？在革命时期没有陷于孤立，在建设时期也没有陷于孤立。可见我们的主观主义不是那么多，宗派主义也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有主观主义，还是有宗派主义，包括中央发布的文件中间也有。例如一长制^[1]，中央曾经批转过某些地区的经验，认为可以试行。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经验，就不能下一个断语，说一长制不好。一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断定一长制不好，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好。

现在讲党内的关系。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刚才陈云^[2]同志说了，几位同志也说了，这个名单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这个名单里头，工人少，上海工人差不多没有，天津工人也没有，武汉、重庆、广州、沈阳、鞍山、大连、青岛的工人也没有，北京工人也没有。那好，你这个中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中央？我们这个中央历来就是无产阶级成分很少。现在开八大，全国搞工业化建设，无产阶级成分还这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在农村先发展先胜利。许多同志在根据地搞了很久，二十多年，也有一部分同志是在白区奋斗，有的长期坐班房。这些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学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得

[1] 一长制，是当时苏联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生产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赋予各个企业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做出裁决的充分权力。

[2]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成熟了，有一部分便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后胜利的，到现在才有几年时间。所以现在，也许到九大、十大，都不可能有很多工人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头来。刚才陈云同志讲了，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了，那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要起变化。所以，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不能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中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你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帝国主义呀？为什么会搞社会主义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们的党按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关于一百七十个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犯得也比较少，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这一点陈云同志讲了，别

的同志也讲了，问题是这个名单如果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一扩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扩大到三百多。我们取得革命胜利还只有七年，如果照苏联那样算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那个时候，可能要搞个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

我还想起一个理由，应该再加以解释。别人的例子很多，我想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

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

一点。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些人去考试，

一个名叫孙山的人去看了榜回来，别人问他自己的儿子考上没有，他说“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意思是说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的儿子在我孙山后面，没有考取。这就是所谓“名落孙山”的典故。我说今天没有列上名单的同志，即名落孙山的同志，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当然这是说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也许是孙山以内的人将来起很大作用。这有两种可能。至于将来几十年以后怎么样，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我们可以不去管他。我们这个名单管不了。我们这个名单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纪。同志们，我并不是许愿，也不是说你们现在不选上更好一些，是说要斟酌，要各方面平衡。至于哪个起作用大一点，哪个起作用小一点，这里头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刚才讲的名单中上海工人、天津工人、大城市的工人很少，这就是一种偶然性。必然性是经过偶然性来表现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是在乡村里头先搞的，乡村里搞革命的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你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我看山上确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大家都上了山，有这么多根据地嘛！

刚才政治局跟各代表团的负责同志商量，觉得可以增加少数人，如果通不过，也可以减少几个人。七大就是这样，有两位同志，几次在候选名单上提了他们，最后就是没有选上。这次也可能有个别同志虽然在名单中提出了，但是选不上。我们可以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们，权利完全在代表们手里头。因此，代表们在预选时，这张一百七十人的名单里头可以调换某些人，可以减少某些人，就是不要超过这个总人数。为了开票的时候好计算，不混在一起，可以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上你认为可以增加的人选，增加几个也可以，增加十几个也可以，你爱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这样搞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提供一些情况让中央考虑正式名

单里头是否要增加若干同志。这样，中央可以根据得票数的多少，根据各方面情况，斟酌出一个正式的候选人名单，并且分出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出最后确定的名额。比如不是一百七十人，而是一百七十几，或者还是一百七十，或者如果划掉的多，就再减少几个。这些都请同志们考虑。

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 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

(1956年9月13日)

—

即送周总理：

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九时半

—

周总理：

你的报告^[1]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

[1] 指周恩来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改稿）。

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1]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十一时

三

在这里，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2]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改稿）中说：“不论是在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或者是在我们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我国都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苏联的巨大的和友好的援助，同时，也获得了各兄弟国家的援助。这种援助，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以比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



在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各方面建设都在飞速发展，新中国显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图为1956年建成的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丰满水电站。



1956年9月，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图为飞机制造厂的装配车间。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 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56年9月13日)

我们为中央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中央全会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大会的准备工作到今天可以说大体上搞好了。

关于政治报告，不晓得同志们看了最后一部分没有？那部分还要修改，今天晚上大体上可以修改好。我还没有看，你们看了没有？可以不可以？还过得去吗？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民主的。你的道理对，就写进文件，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报告恐怕有四万九千字的样子，由一百五十一页减到八十三页。

大会的第二个文件是关于党章和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已经根据代表们的提议加以修改了。

第三个文件是周恩来同志作的经济报告和建议^[2]。大家看了没有？我看过了。搞了两个稿子，前一个比较长，现在这个是十六条，简明扼要，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这样长远的计划，许多事情要做到，支票不可开得太多，采取谨慎的态度比较好，年度计划再去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2] 指将由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按照情况发展。报告我看写得也不坏，就是头一部分文字上要重新修改一下，后面写得很好。

这是关于文件方面。

再一个就是选举。现在已经预选^[1]过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个别同志还有意见，要减的只有个别同志，要增的也只有几个同志。这样，问题就好办了。七大那次的选举，根据代表们的意見，也是有增有减的。主席团也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提出新的意見。明天、后天、大后天是没有工夫了，有两天报告，但是到选举还有一个多礼拜，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分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个别同志的增减还可以调整。选举問題交给主席团。将来由主席团的常委跟各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来商量这件事情。我们这一千多同志，有意见，有议论。这些意見、议论很值得注意。但是整个说，大家是顾大局的。这是好现象。

关于主席团，上次谈过，这里有一个名单，六十三个人。这个名单是经过斟酌的，原来就是中央委员的在这一个名单里占绝大多数，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有十六个，各方面的人都有。文教方面有周扬、杨秀峰。民族方面有刘格平、乌兰夫。乌兰夫是老中央委员了，刘格平是做全国的民族工作的。再提別的人，牵扯就大了，所以还是提刘格平同志，他的资格也比较老。军队方面，就是黃克诚、譚政。各代表团的团长都在内，这样好商量事情。地区的是各大区领导，还有几位中央的部长。女同志有几位了，除了三位中央

[1] 预选，指八大正式召开前，对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推选。办法是：先由各代表团在与会代表个人提名基础上选举，产生各团候选人名单，然后集中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商定一个统一的预选名单，交各代表团预选，最后根据预选结果，由政治局向大会提出正式的候选人名单。

委员以外，还有钱瑛。（邓小平同志插话：现在加了一个帅孟奇。）此外，还有工、青。总之，主席团只调换一个人，以帅孟奇同志调换王鹤寿同志，其他都照样。这样一个名单你们看行不行？请你们在这两天有机会的时候向代表们传达一下。

大会增加几位副秘书长，有王稼祥同志、刘宁一同志、张际春同志。因为要发布文件，搞新闻、宣传。还有什么人？（邓小平同志插话：还有谭政。）谭政同志是军队的。秘书长我看还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插话：不要秘书长。）不要秘书长怎么行呀！要不要秘书长？（全场齐声说：要！）要秘书长毫无问题。

再一个问题发言。发言稿，大家尽量短一些，杂文形式的。发言内容，有人专讲我们的生产质量不好，有人讲一讲主观主义，有人讲一讲宗派主义。大汉族主义是宗派主义，大国主义也是宗派主义，什么老子打天下，人家坐天下，这是宗派主义。对少数民族包办代替，有职无权，对资本家也是以“三反”“五反”时那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这些都不好。我们要多团结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就是对反革命分子，我们要实行劳动改造，要搞人道主义。搞人道主义干什么呢？还不是要把他们改造为有用之人！要以教育为主，不要以赚钱为主，要使他们吃饱，赔一点钱也可以。我看不要去赚钱，在劳改犯人身上赚钱、捞一把，来进行积累，那就势必达不到改造犯人的目的。过去我们对俘虏是这种态度，对日本人也是这种态度，何况中国人呢！这样的政策是可以改造他们的，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这是讲改造反革命。那么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资产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剥削者、上层分子、贵族、头人，对这些人要多做一些工作，对好人及其他一些劳动出身的人，要使他们有职有权，真正是去帮他们的忙，不是去代替他们。我们党，你

说是宗派主义比较少，也是真的；你说是宗派主义比较多，也是真的。

现在的中心问题还是发言问题，请同志们注意。今天到会的同志，有中央委员，有各个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有各省的省委书记，有直辖市市委、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你们要与各方面的代表联系。现在要注意的方向变了，不是报告，不是文件，基本上也不是选举了，而是发言。当然，贯穿大会的骨干是文件，没有几个好的报告，开一次大会干什么呢？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要看我们发表什么样的报告。还有决议，这些都等会议开幕以后再去解决。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剩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有第三种写法，也可以有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也能有比较高的水平，那么，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报告是有相当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农业四十条、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还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大家通了，以后步伐比较整齐，就

团结统一了。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政治报告稿中“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句，以前都是讲“镇压和宽大”，是我改成“惩办”的。“镇压”那个事情吓人，不如改成“惩办”，以后这个提法想改一下。以前都是“镇压和宽大相结合”，人家一想，镇压就是杀人；以后杀人杀得极少了，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多了，问题就是一个惩办。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就是不要完全搞“惩办主义”。

“杀人”的问题，在政治局曾经谈过，开人代会的时候谈过两次，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徒刑的期间给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之后的“以求慎重”可以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这一句话，这一个支票是没有时限的，“逐步地达到”，也没有讲哪一年，总有一天会完全废除死刑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废除死刑的。这就是现在的的新政策。资本主义改造了，进一步公私合营了，农业社会化了，这样一来，反革命的阵地就大为缩小，阶级力量的对比大有变化，就是我们这一方面的势力更大了，剥削阶级那一方面的势力更小了，反革命的势力更小了，因此我们就更不怕，政权更巩固了。我们问了一些地方的同志，又问了一些群众，他们都感觉现在的政策的中心不是杀人，不需要杀那么多人。杀戒一开，势必造成恐怖。过去我们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为生产力被那些人束缚着。所谓旧社会，就是旧生产关

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那些反革命是旧生产关系的最集中的代表，如果不把他们杀掉一部分，群众就不能起来，不能得到解放。解放战争，解放运动，任务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有没有杀错的呢？也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也有，但是从根本上应该说，用死刑的方法破坏这一小部分人，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样，反革命就一年一年少了。极少数罪大恶极、造成人民公愤的，有一个乡的人民公愤，有一个区的人民公愤，有一县的人民公愤，有一国的人民公愤，在那种情形之下，就必须处死刑。我们保留了这一条就不怕。对于其余一些罪犯都不应该处死刑，并且给以人道主义的待遇。至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就是想改一改“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提法，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们国家根本上不杀人了，再杀人由中央批准，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央的范围内还没有谈过，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范围谈过。唐朝在全盛时候，一年只处十几个死刑，都是中央判决。宋朝在天下不乱的时候，处死刑的也极少，而且都是中央判决，皇帝批准。你们看怎么样，这样是不是有毛病？

中国历史上，要么就你灭掉我，要么就我灭掉你，没有第三种办法，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法。我们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把从前当权的、犯过错误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灭掉。在延安时我们立了这么一条，一个不杀，免得造成一种恐怖，杀错了就不可挽救。对于反革命采取一种完全保存的办法，我们已经惩办了他，他也不会为乱。至于犯思想错误，犯政治错误，那又当别论。这就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位置就要安稳得多。资产阶级的办法就是这样：我上台你就下台，但是我也不杀你。我们跟民主党派的关系叫做统一战线，长期共存，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所有的民主党派，既来之则安之，各得其所。党内也是这样，就是大家都

有一口饭吃，位置多安一点，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办法。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办法：民主党和共和党，工党和保守党，谁都不灭掉谁，但是通过竞选把你打下去；以后你再来竞选，人民赞成你，你又上台。我们现在不能用资产阶级这个方法，而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么一种办法。不论反革命，敌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给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这就是第三种办法。这个办法在我们这里，从七大到现在已经实行十一年了，还比较好，没有造成什么恐怖。并且，问题都是事先商量好再去作决议，不是突然袭击，不搞强加于人。所以我们这次会开了半个月，所有代表都到了，什么预选，什么修改文件，提意见，国外认为是新闻。

关于文件^[1]，今天就基本通过，同志们还可以看，还有时间。明天一天（十四号），十五号一天，十六号就不能再改了，十六号晚上八点钟以前新华社就要广播，十七号就登报（十五号作报告，十六号只登新闻不登报告）。因此还有两天半的时间可以提意见，请用书面交给文书处。今天基本通过好不好？这个修改委托书记处和起草委员会负责。

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

[1] 指将由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多几个人好。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不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

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同志：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

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6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